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38  
辑

#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

##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38辑

---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高原 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版次/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6月长沙第1次印刷

---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顾问 李炎巨 吴立民  
李 鳌 林增平  
刘晴波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丁 江 高 原

● 责任编辑 高 原 朴永子

# 湖南文史

19 2 90

## 目 录

( 总第38辑 )

### · 烽火忆往 ·

- 回忆与薄一波的一次接触……………熊宗继 (1)
- 碧吾和尚和他领导的僧侣抗日游击队……………戒 圆 (1)
-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始末  
……………文振亚 陈安贤 赵慨萍 (12)
- 司令部青工队长被通缉……………谭一天 (34)

### · 战时经济一瞥 ·

- 中国工合在邵阳……………陈 球 (44)
- 回忆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程起陆 (49)
- 设置的由来——组织概况——主要业务——勾心斗角与营  
私舞弊——撤销及归并
- 抗战时期的湖南民营工业……………杨锡贵 (54)

### · 回顾湖南解放 ·

- 奔袭永丰突破白崇禧的第一线防御……………温玉成 (62)

父辈教导——总队起义与组建暂五师前后……………张先正 (70)

## ·湘籍文化名人·

记父亲的忘年之交翦伯赞……………覃 琼 (79)

### 记著名历史地理家文焕然

……………文潭生 文泉生 文榕生 文仓生 (85)

投身史地——矢志不移——不倦教诲——诚恳待人——来自中  
国——献身中华——不畏艰险——敢于登攀——开拓进取——独  
行路

## ·三 湘 史 华·

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文士员 (117)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邹代钧与舆地学会——邹永煊邹  
广恒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冯玉祥将军在桃源帮助彭施涛先生办学……………彭秀伋 (131)

回顾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的历程……………罗桂良 刘冬松 (136)

见缝插针——艰苦办校——拾损补缺——按谱设班——赠钱也  
留银也教学——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

## ·仁 人 志 士·

记在延安保卫战中牺牲的周月南……………刘国安 (140)

## ·民族史料之窗·

**龙凤翔与湘西苗区公益事业**……………邱晓玲(143)

## ·民情风俗·

**长沙民间婚丧习俗琐闻**……………朱运鸿(151)

婚姻由陈腐趋向进步——丧葬习俗话旧——为婚丧服务的行业——建国后民间婚丧习俗的变革

**我所知道的湘潭烟业行业习俗**……………廖瑞星(162)

烟丝业的由来及产地——湘潭烟业商工两般合编条规——烟丝业的行帮与其他

## ·文史知识·

**黄埔军校有多少分校**……………王 玲(167)

潮州分校——长沙分校——南昌分校——洛阳分校暨第一分校——武昌分校暨第二分校——成都分校暨第三分校——广州分校暨第四分校——昆明分校暨第五分校——南宁分校暨第六分校——第七分校——第八分校——第九分校

**建西后湖南省直设置了哪些党政群机构**……………任连荣(182)

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1949年10月至1956年)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时期(1957年至1966年4月)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年10月至1989年12月)

## · 社 会 黑 幕 ·

**张本清龙溪口被刺内幕**……………杨世明(192)

张本清其人——当年背离蒋介石——晃县帮派之争——龙溪口刺杀案——处理经过

**湖南省银行支付两笔巨款内情**……………钱去飞(204)

## · 历 史 审 判 台 ·

**巨匪姚大榜其人其事**……………杨长光(207)

为匪起家——阴险狡诈——恩将仇报——可耻下场

## · 创 业 史 ·

**潇湘崛起电缆城**……………黄仲民(220)

## 订 正 · 补 充 · 质 疑

**对《湖南文史》第35辑的订正、补充、建议**……黎 丰(225)

## 回忆与薄一波的一次接触

熊宗继\*

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刘戡担任军长的国民党九十三军，在山西的洪（洞）屯（留）公路以南驻防。我当时担任该军新八师二十三团团长。九十三军拟以洪洞县为中心，建立太岳区抗日根据地。驻扎在洪、屯公路以北的，是八路军以薄一波任司令的决死队第三纵队。两军相距不过一公里之遥，双方小部队互有越路放哨的情况。因此，常常发生一些小磨擦。为了做到团结抗日，军长刘戡曾两次派员与决死队谈判，都没有达成协议。

1940年4月，九十三军准备在驻地召开一次军人运动会。会前，刘戡电邀决死队派员参观指导。他们欣然接受了邀请，如期派出以副总队长牛佩琮为首的运动员前来参加。运动会结束后，牛队长说：“决死队也计划在‘五四’纪念节时召开一次运动会，届时希望九十三军派代表前去参观指导”。后来薄一波还亲自打电话来邀请。于是，军部决定派我为团长、军政治部副主任林某为副团长的三十多人的参观团前往观光，团员都是从全军篮球爱好者中挑选的。出发前，刘戡吩咐我说：“你们这次前去，主要是慰问、参观学习，并找机会和薄纵队长谈谈两军驻地划界问题，以一星期为期限。”

5月3日，我们一行到达决死队驻地，薄纵队长亲自迎

\*熊宗继当时任第九十三军新八师二十三团团长。

接。经人介绍，我才知道他还是行署主任，纵队长只是兼职罢了。但使我感到异常奇怪的是，他们平日配戴的帽徽都摘下来了。在参观一所学校时，老师和学生一个都没有见到，连教材课本都不知藏到哪里去了，我好像藏在闷葫芦里一样，疑惑不解，又不好去打听，心想莫不是国共两党又发生了分裂？直到运动会结束后，薄主任谈到了“皖南事变”的事情。他说，事情的具体经过还不清楚，只知道国民党的军队与新四军打了一仗。但他愤怒地谴责说，挑起事变的罪魁祸首是何应钦。我暗想，蒋介石是头号人物，他为什么不骂他呢？大概是为了团结抗日，保持他统帅的面子吧。我打内心佩服共产党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薄主任的谈锋很健，从部队训练到作战经验，还谈到解放区的形势，范围十分广泛，我边听他谈话，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临走时，刘戡交待我要和共产党协商一下两军管辖的划界问题。我考虑在皖南事变发生，两党两军已经出现裂痕的时候，提出划界问题来，很不现实。因为我们打的招牌是参观、访问，而不是谈判，访问原为增强感情，搞好团结，缓解敌对气氛。如此时提出谈判，有失访问真意，且薄的抱负是不局限于微不足道的区区太岳地区，如果提出来，肯定会争得面红耳赤，徒伤和气，于事无补，且两军四周都是敌人，如果双方争斗起来，势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只能同舟共济，才能互相依存，想到这里，我就把原来准备说的话全部咽了下去。此时，薄主任似乎看出了我有什么心事，连忙打开抽屉拿出高级香烟给我抽，他说这是“百团大战”中的胜利品。接着他就眉飞色舞地谈起了“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来。说罢，他还交待警卫员说：“把所有的烟全拿给熊团长带回去抽。”并设宴招待我们。饭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我们就辞别了薄主任回到了驻地。

这次访问，从表面上看，是一次不成功的访问，但在两军

之间，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敌人发动夏季扫荡，日军调集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包括著名的坂垣师团在内），企图将九十三军一举歼灭。刘戡军长为了避其锋芒，决定作战略转移，但必须经过八路军的驻地。于是由刘军长给薄主任写了一封信，恳求他给予方便，事情出人意外的顺利。薄主任接到信后，马上决定派部队掩护我军进入他们的驻地，以摆脱敌人的包围。

当时日军的飞机整日在阵地上空盘旋轰炸，我军白天不能行动，便决定进入黄昏后开始转移。为了抓紧时间，选择捷径。八路军还派人为我军作向导。经过一夜的急行军，部队到达了安全地带。这时天还未亮，刘军长下令：部队进村后，不准打扰百姓，就在屋檐下宿营。可是一进村子，八路军就派出了许多服务员，热情地将我们引进已经收拾好的房间里，大家安顿好了之后，又带我们去食堂吃饭，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好睡好了，当吃着那香喷喷的饭菜时，心中感到无比的温暖与安慰，互相之间有如兄弟般的亲热。

第二天，在村里休息。八路军又派来文工团为我们慰问演出，节目精彩动人。刘戡军长提出要回后方整顿，八路军同意了他的意见。但回后方，必须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同蒲铁路和汾河。这一线敌人戒备森严，经常有铁军巡逻。经过薄主任的一番精心策划，选择了绵山附近为渡河点，并事先派人去那里作了周密侦查，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经过两天急行军，我们安全地抵达绵山。一路上，受到八路军的热情招待，每过一村庄，都有儿童团员送茶送水，到处都听到“叔叔们辛苦了！请喝茶”的招呼声。当我们喝到清凉的香茶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无形中消除了过去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在八路军的大力支持和掩护下，我们安全地越过铁路，涉过汾河，回到了后方。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但这次与薄一波将军的接触，始终留在美好的记忆中。

# 碧吾和尚和他领导的 僧侣抗日游击队

戒 圆\*

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湘潭县有一个和尚，名叫碧吾（1901—1979），曾经激于义愤，组织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湘潭、衡山一带，坚持武装抗日，英勇机智地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参加这一支游击队的出家僧侣，除碧吾和尚外，还有弘愿、悟本、义真、悟禅、修智等十人左右，其中弘愿当过班长，义真当过副班长，他们跟碧吾和尚一起，杀敌甚多，博得人民群众的赞美，也给湖南人民的抗日斗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游击队的首领碧吾和尚，原名马阳德，以抗日闻名，当地群众呼为马和尚。1901年生于湘潭县长岭铺，家庭贫困，十二岁时（1912年）正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年，他就跟人家学手工缝纫技术，干了几年，到十九岁时在湘潭龙岩寺出家。<sup>1</sup>1922年二十二岁在衡山县南岳上封寺受戒，一个劳动人民家庭里出身的青年人，从此做了和尚，住在龙岩寺。龙岩寺，这个庙宇建在乡村里，一般人出家以后就不再管家人的事情了，而马和尚不然，他看到一些人压迫人的事情，就喜欢出面主持正义。1935年当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以和尚的身份跟

\*戒圆，俗名王球，建国前后在南岳大善寺、长沙开福寺任书记，现任湖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那些地主恶霸讲道理，结果被控告到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和法院，先后把他逮捕起来，监禁数次，还被充当过兵役，但也初步学会了一般军事技术，经过两个月之久，回到湘潭。1936年夏，他自发地在湘潭长岭铺李凯公祠计划组织“湘鄂赣边区游击队”，约一百人，活动了两个月，被当地国民党的乡长罗家熙发觉，国民党当局立即派部队予以解散，马和尚只好逃到长沙，通过陶猛介绍，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伍敬芝，伍劝他“不要着急，等待机会”。1937年因在长沙无处安身，就自动投军，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了大队长（输送队长），团长陈蕩平劝他参加国民党，他拒绝了。师部开始不信任他，说要将他开除，他就自己请假回龙岩寺仍做和尚。这是1938年。过了一年多，1940年马和尚四十岁时，龙岩寺附近的地主豪绅们如罗庆生等扬言：“马和尚是共产党。”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又将马和尚逮捕起来，因无凭据马与湘潭县政府秘书长张铁僧力争，遂致互相殴打，于是把他拘留十个月。在牢狱里，马和尚结识了冯杰（后被日寇杀死）、周尧（被国民党杀害）、石步高、王致平（被国民党杀害）、郭义吾（被国民党杀害）、张彪、刘泽祺等人，在牢狱中进行了联络活动。拘留期满，马和尚被释放出来了，中共地下党员张中连同志派人与马联系，从此马和尚开始与革命组织发生了一定的关系，但仍住在龙岩寺内，做了两年和尚。

1943年，马和尚不愿再过出家人的戒律生活了。脱离寺院，回到谭家山王家湾地方居住。1944年，马和尚四十四岁。这一年5月下旬，日寇从临湘岳阳一带，发动了对湖南的大举进攻，而坚持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6月1日日寇占领了平江，6月16日占领株洲，6月17日湘潭沦陷，6月19日长沙失守，6月20日醴陵沦陷，湘乡、衡山等县亦相继沦陷，到8月7日衡阳失守时，先后只有两个

月零七天的时间，湖南大遍土地，略计有三十余县市，都沦陷于日寇之手，到1945年8月10日为止，沦陷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湖南广大人民遭受了敌人兽性般的蹂躏，日军奸掳烧杀，无所不为，人人恨之入骨，这时敌人的铁蹄已经踏到马和尚的家乡来了，马和尚心想：“日本鬼子来了，如果不抵抗，我们就有亡国的危险。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杀日本鬼子，人人杀敌，我们的国家才不会亡。我们出了家的人，还有杀敌的精神，其他人我想也会有同样的精神。”特别是当他听到和看到日本侵略军在我国抢劫财物强奸妇女的罪行时，他感到等于侵犯了他自己切身利益一样，于是，杀敌之心，象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因此在1944年6月间，日军刚侵占湘潭土地时，他就马上把与他同坐牢狱那些人如冯杰、周尧、石步高、王致平、郭义吾、张彪、刘泽祺等人召集起来，在谭家山庭子冲王家湾开会，共商杀敌大计。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武器，计划找谭家山唐满铁匠打小刀，唐铁匠怕惹祸始终坚持不打。马和尚想出一个办法，各人把竹子削尖尽力磨光，用“竹尖子”作为武器，从此马和尚及其伙伴开始英勇杀敌了。1944年6月间，日军由株洲过河到湘潭千公坝陈家桥，马和尚等七人，假装农民在田里踩田，日寇要他们送夫。四个日军，共有四条步枪，掳了十多个人，挑着子弹等物向前行走。马和尚等假装不会使用武器，日军给枪要他们代替背着。他们七人在田中已约定：以举左手搔头痒为暗号，走了两华里路远，七人一齐动手用竹尖子捅喉管的办法，把四个日军杀死。当时因为前后都有日军不能开枪，杀死日军后，要民夫把东西挑到莲塘，民夫全部被遣散回家。他们七人又回转身到千公坝陈家桥，准备去隐藏四个日军的尸首，但当地老百姓早已隐藏了，只好再到莲塘，请十五人把所获子弹等物挑到谭家山。第二天，又有几个日军在磨塘附近抢劫，他们七人又假装老百姓，有的背枪站远一些，有的不背枪

到日军面前走，马和尚、周尧、冯杰等三人，与四个日军面对面，冯杰夺轻机枪，马和尚夺步枪，其他同伴一齐来，当即开枪打死四个日军。这一次，共夺得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条。不久，马和尚“用竹尖子杀死日本鬼子”的英勇事迹，传播到湘潭各个地方去了，有些人听到马和尚抗日，都去会见马和尚，要求一起参加，马和尚就确定了“有多少枪，收多少人”的原则，扩大自己的队伍，以马和尚为首的抗日游击队开始发展了。麝塘杀敌以后，隔了几天，马和尚到了长岭铺石灰冲大坡里地方，郭家里有日军在那儿休息，老百姓把情况告诉马和尚，建议用绳子捆住，马和尚说：“不要，归我带去！”日军不知他是游击队，于是跟马和尚到谭家山，他的伙伴当即把这个日军杀了，尸首放在芋头岭，马和尚又得一支步枪两颗手榴弹。反转来，又到长岭铺下铺，有一个农民家里驻扎很多日军，放了很多枪弹，马和尚于是召集同伴开会，决定在晚上大家同去偷枪。深夜十一时左右，日军都睡熟了，马和尚自己带头，率领队伍，开始行动，首先爬到日军岗哨上，用一条湿的洗澡手巾，塞住日军卫兵的嘴巴，把枪一夺，派人把卫兵转走，当即刺死。于是他们游击队十多个人，偷偷地走到那个驻扎日军的农民家里，偷走步枪达二十条，还偷了一箱子弹，另一个和尚弘愿也来了，正在偷枪之际，日军醒了，开枪追赶，马和尚当即指挥同伴，各人背枪各走一方，分散目标，结果未伤一人，又胜利地完成了夺枪任务。这时，这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由开始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人了。这是马和尚初期的抗日活动，正是湘潭县城沦陷前后。

7月初，国民党政权，为了限制人民抗日斗争，薛岳命令陈德炎在湘潭县组织了所谓“湘潭县游击支队”，陈德炎为支队长，要马和尚接受改编，马和尚说：“我不要什么改编，我

不想当老爷，我不识字，我也没有当老爷的资格，我只杀敌就是。”但他的同伴都主张接受改编。于是编定马阳德（即马和尚）为第一大队，张彪为第二大队，周尧为第三大队，张鹏飞为第四大队，各队分开进行抗日活动。以张彪为首的 第二大队，经改编后，不再受马和尚领导了，在梅塘一带，大肆骚扰人民，陈德炎也让他去干，接着发生了一连串的内部斗争。后来马和尚建议调张彪同到湘潭河口抗日，四个大队都向日寇进攻，在这次战斗中，马和尚率领的第一大队，打死日军十多人，得步枪十多条，其余三队毫无战果。不久，张彪因不受调遣，就令其解散，逃到另一支土匪部队去了。解放后，张彪逃亡，不知去向。河口杀敌以后的 8 月间，马和尚又与张鹏飞一起共三百余人，在古塘桥文庙里与日军作战三天三夜，日军约有五百人，结果把日军赶走了并夺了几条枪。接着，马和尚的游击队开到枫水塘地方，当地群众留他们在那里过中秋节。10月向南岳方向开跋，驻花石许家铺，遇到国民党的另一游击队李建光等企图围住他们，陈德炎被捉，后释放。此后，开到南岳东山岭坡坳，一直住到12月。这时，马和尚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二百六十人左右了。他们准备与当时国民党湘潭县政府县长贺石生联系，把队伍开到湘潭朱亭九都湖，而贺石生为了消灭异己，把他们围住，马和尚主张打贺石生，突围出来，而支队长陈德炎不同意，马和尚知道这次结果一定不妙，一个人带一支手枪走了。这次被围的人共一百一十八人，都是马和尚所领导的游击队队员，仅冲出十一条人枪，由龙锡云保存。九都湖被围事件发生以后，马和尚独自一个人往家里走，首先由朱亭到汤图子坳龙桂生家，路途三十多华里，中途到处是日军，怎么过关？马和尚便买了一些糖果，与手枪放在口袋里，遇到日军站岗的搜查时，马和尚把衣一被，自己解衣给日本兵看，表示没有武器，并以口袋中所藏糖果给日兵看，日

兵让他过去了。他问老百姓：“前面还有日本鬼子吗？”老百姓说：“有”。马和尚又生出一个妙计，于是喊了一抬轿子，自己乘轿，要轿夫尽量避开日军岗哨，原来答应给轿费银洋四十元，到了目的地，只有二十元，轿夫不肯，马和尚答应以后送来，仍不肯。马和尚只得说：“我有一支手枪，可以放在这里作抵押，等几天再拿二十元来赎可以吗？”轿夫见了，原二十元也不要了，退给马和尚，马和尚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你替我抬了轿子，路很远，钱还是给你，我的确是没有钱了，并不是有意威胁你们。”轿夫还是把银洋二十元拿去了。这是1944年冬和1945年春的事情。到龙桂生家，马和尚因为受了九都湖被围的挫折，把手枪及冲出的十一条枪，统统交给龙锡云，准备从此再不干了的，与那个湘潭县游击支队队长陈德炎脱离了关系，回到旧居谭家山。这是马和尚中期的抗日活动。

1945年2月间，与马和尚相识的一些游击队人员，劝马和尚再出来领导抗日游击队活动，发枪支给他。马和尚心想：“拿别人的现枪抗日，那算不得好汉！”他说：“我准备牺牲生命，用假降的方式到日本鬼子那里去夺枪，只要你们具名盖章，证明我不是汉奸。”同伴们知道马和尚机智勇敢，真正替他证明，马和尚又去中共请示地下党员王春和同志（后被国民党杀害）是否可以去？王春和同志说：“可以。”马和尚于是找人写信给湘潭县维持会并取得联系，4月间马和尚率领他的同伴五人，到了日军所占领的湘潭县城，日军宪兵队以为是真降，乃设宴招待。这一天晚上，马和尚的同伴马杰（出家名弘愿）、周德信（出家名义真）、李桃生、何自由、李满饭桶五人就乘机在湘潭鸡公嘴打死日军两人，得枪两支。马和尚在假降中假意与日军宪兵订约，内容是：由日军给马和尚枪五百支及子弹若干，马和尚则可以“保护”日军行军时不受游击队攻击。日军半信半疑，仅给少部份枪弹给

他，于是他由湘潭县城回到乡下。途中经过石子脑，杀死两个日军，夺得重机枪一挺。以后，马和尚跟日军宪兵队一起驻在长岭铺，又把原寄存在龙锡云那里的枪支调来。有一次驻在马家堰，马和尚又假借“打游击队”名义，在河里打死一些日军，并到船上夺了大部份枪弹。这一真实情况，被汉奸戴华山知道，他无耻地密告日军。于是当天晚上日军计划把马和尚围在长岭铺锁龙桥，企图一举歼灭。马和尚早知形势不对，将队伍全部调走。马和尚走了，汉奸戴华山就带领日本鬼子搜索当地老百姓，凡是游击队人员的家属，都被抓去，共有十人以上，并掠走蚊帐三十床左右和不少被服。日军要逼迫被抓的人无论如何交出马和尚。马和尚也传出话：“如果不放被抓的人，我们就准备大打”。结果，日军宪兵队闻此消息，有些害怕，只好将他们一一释放，并迅速地撤回湘潭县城去了。这是马和尚假降夺枪的经过。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还是夺取了部份枪弹，可以继续杀敌了。

6至7月间，长岭铺刘家桥公路上，晚上有日军开动，马和尚与另一姓赵的同伴，跳过公路，乘月色朦胧，用梭标杀死了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日本兵，得手枪一支，步枪一支。这个时候，长岭铺一带潭衡公路上经常有日军过身，马和尚及其抗日游击队，就时常截断日军的尾子，拦日军的汽车，用重机枪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死不少日军，缴得不少枪弹，马和尚经常向人说：“我是用日本鬼子的枪弹，打日本鬼子。”这话完全符合事实。正当马和尚的游击队英勇杀敌时，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林支云部，强迫马和尚接受他的改编，马和尚坚决不肯，林支云生气了，派了一些部队，在竹冲等地围攻马和尚，马和尚与另一支较正派的游击队联合，幸而免被围歼。

这时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支队挺进湖南，后改番号为

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7月间，经宁乡至湘潭，中共地下党员张中连写信给马和尚，要马和尚与八路军王震、王首道同志取得联系，并在南桥某地会了面，歇宿一晚。后由高桥到马家堰，又在马家堰罗家坝歇宿，马和尚的游击队得到了中共支持，马和尚的队伍被编入湘赣鄂边区人民自卫军，嘱在地方坚持抗日斗争，并补助经费约五百元。这时中共党员张中连病后走了，留下王春和与马和尚联系。马和尚的游击队，共有一百多人，有重机枪一挺，步枪一百条以上，短枪二十条以上，继续抗日。到1945年8月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马和尚游击队的枪弹就被国民党晓忠乡公所收编了。马和尚本人则在光复后，被人密告他有共产党嫌疑，国民党湘潭县警察局将他逮捕，要他自首，马和尚说：“我是组织游击队抗日，与八路军有些联系，难道抗日也有罪吗？要办就办，要杀就杀。”当局无奈，只好让他回家生产，这是马和尚后期的抗日活动。

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马和尚又与地下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公开地或秘密地对国民党当局作不断的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和尚率领的这一支游击队在湘潭县是人所共知的。由于马和尚具有一定的爱国精神，坚持抗日斗争，并不是假借游击队为名，去骚扰人民群众，而是真正地在抗日杀敌，所以当地群众对他们是表示支持的。队伍开到一个地方，就有人民群众留住，希望保卫地方安全。参加马和尚游击队，一般只有饭吃，他坚决禁止他的同伴侵害人民的利益，纪律严明，队伍中规定了谁乱吃人民的鸡鸭，发现了就要枪毙。一次，他们队伍中有一个叫李应界的，曾经向农民强要草鞋钱，马和尚就给予他以严厉的惩处。马和尚说：“跟我走，莫想发财……总要以后名誉好。”其所以能够如此，应该说是在斗争过程中接受了革命组织的思想影响的缘故。

#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

## 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始末

文振亚 陈安贤 赵慨萍\*

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直接领导，寄生于国民党第七十军中的一个培养抗日干部的战斗群体。因该班名誉班主任，由七十军军长李觉兼，李是湖南长沙人，因出生于云南，故字云波，该军亦以“云”为代号，所以七十军步兵干训班又称“云干班”。

1937年9月中旬，属于湖南地方势力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十九师，受命调沪扼守上海郊区大场前线，出发前，七十军军长兼十九师师长李觉，勉励官兵誓死报国，各自写好家信遗嘱，各级干部，都按级报定代理人，以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他们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日寇虽以飞机、大炮、坦克配合进攻，但十九师将士在枪林弹雨中浴血苦战二十多天，使日军终不能前进寸步。

初，当十九师经浙赴沪驰报，集结待命之际。驻守沪郊填石桥的税警总团杨营的阵地被敌突破而溃退。十九师将士当机立断，从侧出击，击溃日军，始将失地收复交还税警总团，从而保住了阵地。“十九师将士自豪地说：过去我们参加江西围剿打内战，往往不战而溃，被老蒋斥为‘玻璃部队’，今天我们狠揍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生存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吐出这口

\*作者当时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战时步兵干部训练班学员。

长期憋在胸中的怨气！”

这时，慰问信、慰劳品，从全国四面八方雪片似的飞来，各地各界的慰问团，也冒着硝烟弹雨接踵而至。其中影响最大，决定七十军和李觉未来命运的是我党派去的潘汉年、周礼等同志为代表的湖南人民慰问团，潘、周在向十九师将士进行慰问之后，即与兼师长李觉叙谈。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抗战必胜的前途。并说淞沪抗战，仅仅是拉开了南方抗日战争的序幕，最艰苦的战斗，还在后头。同时还提醒李军长说：

“蒋先生利用非嫡系部队在第一线与日寇拼搏，其用心军座是明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要使你军成为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还必需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以充实全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潘、周的精辟见解，使李折服面大受启迪，遂说：“我的部下都是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头脑简单，只知在战场上拼杀，至于远见卓识之士，甚为缺乏。我早有心培养一批新的干部，但苦于无人担负此任……”李于是虚心诚恳地向潘、周两同志求助。潘、周为李写了一封致武汉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信，要李持信去找郭解决。

潘、周回武汉时，即将李觉要求派人帮他办干训班的事，向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汇报。经研究决定派曾经在广西百色起义中担任过红七军政治部主任的福建人陈豪人（后化名陈希周）同志与从海外归来的朱江户、许德媛、游敏楨等同志共同到七十军去创办干训班，并要湖南省委选派一批干练的党员到七十军干训班受训，以发展党的组织。

败月之后，十九师回湘休整，李觉专程持潘汉年介绍信找郭沫若同志，郭乃将陈希周等推荐给李。李逐一见面。洽谈之后，如获至宝，非常信赖。遂委托陈希周同志等全权处理筹备创办干训班事宜，同时备文申报蒋介石，备案得到批准。李觉自

兼七十军干训班名誉班主任，而委陈希周为主任，并在长沙、武汉两地设招生办事处。长沙招生处由陈希周委托杨东莼负责，设在都正街讲德里。武汉招生由朱江户主持，办事处设原日租界。

招生工作不是公开进行的，除个别是由七十军有关人士保送其子弟或亲友外，大部分都是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通过各地党组织介绍的。

这时，湖南省委决定派曾参加过广州暴动，在北伐军中搞过地下工作，又在国民党监狱关过几年，久经革命锻炼的岳阳人郭观梅，到七十军去负责党的工作。郭随省委巡视员唐木兰到省委住地时，省委同志对郭说：“现决定你到七十军干训班去受训。该军非蒋嫡系，军长李觉与蒋介石有矛盾，由你去担任支部书记，发展进步势力，吸收党员，争取李觉积极抗日，已经先去该军工作的有陈希周等人，他们和李觉的关系不错，会在上面掩护你，但不要与他们发生党的联系。你只展和省委直接接头。今后具体问题，可与省委杨第甫同志联系。等干训班开学，还有十一个同志来你处报到，他们都归你领导。”省委随即将这十一个同志的名单交郭，郭乃化名为郭超持省委介绍信到杨东莼处，为了掩人耳目，杨另写了封介绍信要郭前去武汉旧日租界找朱江户报到。

在湖南省委交给郭超的十一个人中，有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当时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化名杜非），有刚从延安陕北公学毕业返湘的刘东安（化名刘单炯）、康杰（化名康述），及在长沙一带搞抗日救亡活动的杨铁山（化名杨生）、左世俊、黄非丹、余天择、欧阳震东、龚曙生、韩旭翔、李德健等。

1938年7月间，在长沙报名的学生，聚集在长沙市都正街讲德里杨东莼寓所前，由杨介绍和佩有上校军衔的陈希周

见面，每人将发给的新军装穿上。为了防备日本飞机空袭，立即由七十军派来充当大队副的钟雄飞中校与区队长杜楚仙少校带领渡过湘江，到河西石佳冲一农民家中暂住。数日后，由朱江户率领在武汉招收的部分学生也来长沙与陈希周会合，一道前往宁乡腰铺子关帝庙开始训练。

七十军干训班开设课程的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政治课计有由许德瑗（留德）任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政治经济学》，朱江户（留学德日）任教的《大众哲学》和《日语》，李乃仁（现笔名荒芜，作家）任教的《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蒋宗文任教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民众运动》等。每周第一、二节课名义上排的是“国统区”其它学校那种“总理纪念周”，实际则由陈希周作时事报告和讲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党中央的文件和政策。并油印散发《反对自由主义》供同学学习。陈用那带着福建腔的普通话，运用逻辑推现对未来形势的发展判断，犹如未卜先知，使同学们特别钦服。从而提高了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坚定了对共产党的热爱。

军事方面。在大队长游毓楨未到以前，先由钟雄飞代理领导训练。军事学则开设有“国统区”一般军人必修的“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和防空防毒、救护常识、筑城教范以外，还有由程今吾任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每个同学发给一块绘图木板，课堂中将它搁在膝上写字看书，野外则用以测绘地图。

钟雄飞是湖南新化人，行伍出身。新任十九师师长唐伯寅之妻舅，一向就嫉妒和看不起读书人。而干训班领导多是留学生，又强调民主治军，训练不允许体罚，他内心抵触很大。所以他在第一次训话时，开口就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只知军人就要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即使指鹿为马，指黑为

白，也不能非议……”钟这种军阀作风，反动理论，加上满口道地的新化土腔，惹得全体同学很不高兴。只盼那位游大队长早日到职。

干训班虽未明确提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班风，但事实上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训练的。每天除按计划完成政治与军事的教学训练进度外，早餐前进行体育锻炼，以长跑、器械操为主，下午课余则是文体活动，如篮球、歌咏、排练剧目等。周末晚上，按班组过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星期天则三、五人一组到附近农村进行调查访问及宣传抗日。而留给当地群众印象最深刻、效果最佳的是在腰铺子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和1938年“双十节”军民联欢会上演反映东北人民游击抗日、爱国保家英勇行为的话剧《三江好》。

班内学习研讨理论之风也很浓厚，有时就政治课题或学习心得，进行大组或分组讨论以至个别辩论。如陈厚生、韩旭翔、韩绍武等同志经常为一些哲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在这里，不仅有省内外党的报刊如《观察日报》、《真理》、《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群众周刊》等。甚至连陕北延安发行的《新中华报》也能看到。一些在“国统区”被列为“禁书”的马列著作在这里也可以公开传阅。通过经常的讨论、学习，使大家对抗战的长期性，对“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认识更明确，读书空气更加浓厚了，有时看到叛徒叶青、张国焘在“国统区”报刊上散布的一些诱骗青年的言论，同学们无比愤恨。

在紧张的训练与学习的空隙中，先是由刚从延安陕北公学回湘的刘单炯（即刘东安）带领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不久，刘被组织派赴叶剑英同志任副教育长的南岳游干班去了，这任务便落在另一个同学左世俊同志的身上。唱这些慷慨悲壮的歌

曲。(如《再会吧，在前线上》、《打回老家去》、《延安颂》、《毕业上前线》等)，更激励了同学们的斗志。班上的活动是在陈希周主任的领导下进行的，党支部在各项活动中起着核心作用，通过经常的具体活动，也考察了同学们的思想情况。不久，一些同学便被秘密吸收入党，郭超同志特将此间党组织顺利发展的情况向省委杨第甫同志作了汇报。杨第甫同志除对郭的工作给予肯定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文件及省委指示外，还对党在七十军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强调要慎重而又积极地发展组织，以行动来实践《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干训班的抗大式的生活过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次，陈希周主任因公去长沙，委托许德瑗暂代。那天，许交代钟雄飞在晚自习时集合同学们进行政治讨论，钟素来不满干训班开设的政治课，故以不按时集合来消极抵制，因导致一场争吵。钟不服批评且反唇相讥：“你们这批留学生只能作纸上谈兵，作战时并不需要什么政治……”这是干训班两种势力的第一次交锋，在进步势力占优势的“云干班”，代表保守势力的钟雄飞当然掀不起什么风浪，而受到陈希周归来后的批评，只好记恨在心而俟机报复。

1938年约9月初，为了改造部队，李觉又从七十军前方各部，选调了一百多名士兵，参加干训班受训，还派一个由七十军保送到陆军大学受训回军的黄仁来当大队长。这样一来，无形中就把后方学生的地位降低为士兵了，同学们心里不快，憋着一肚子怨气。不料这位大老粗出身，不但无知而又刚愎自用的黄仁，在出操前集合训话时，又重复钟雄飞那一套绝对服从的理论。一个同学立即提出质疑：“如果你要去当汉奸也要我绝对服从吗？”驳得黄仁无辞以对恼羞成怒地说：“这里不是八路军，你们里面有共产党……”训话不欢而散。想不到

随同黄仁前来当区队长的梅继仁，妄图维护黄仁的威信，故意吹毛求疵地找同学们的岔子，在进行步兵基本训练时，看到陈厚生同学动作不符合要领，随即打了陈一记耳光。梅满以为可以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不想这一耳光却成了引起公愤的导火线。陈厚生遭此空前的侮辱，气得嚎啕大哭。同学们由于班里的变化，早已积忿在心，至此，更加气愤填膺，于是蜂拥上前，宣布罢操罢课，要求退学。不识时务的钟雄飞妄图以压力迫使同学就范，大声扬言：“谁要退学就先交清赔偿费再走！”这时，长沙同学陈之义立即从手指上摘下一只数克重的金戒指向钟递去，这意想不到的举动使钟呆住了。钟来干训班之前，李觉曾叮嘱他要好好地带好后方学生，他们是本军未来的骨干，否则要追究你们的责任……顶头上司的告诫，言犹在耳，现在弄成这般僵局如何向上司交代呢？

正在钟为难之际，几位政治教官出来从多方面做工作，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遭辱的同学陈厚生决心与陈主任和同学们挥泪而别了。黄仁见此地风头不顺，第二天也就溜回军部干别的工作去了。自这以后梅继仁在陈主任等的教育下，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有很大转变，第一期结束后，仍回部队当营长，后在七十军南昌突围战斗中，因掩护部队面率全营壮烈牺牲。

对前方来的这批同学先是和后方学生混合编队学习，但党支部考虑到军事知识、政治学习等各方面各有所长，进度难统一，生活上一下也合不来，经与陈希周主任研究后，决定挑选前方同学中部分优秀分子与后方同学混合编成两个区队。恰好，这时盼望已久的游毓楨大队长也已来到。还带来向实、李悦民、黄中强三人。乃由向实和先随许德瑗教官同来的赵集广任区队长，并挑选了几个前方同学与郭超、李德健两同志，分别任这两个区队的班长和副班长，仍住关帝庙。其余的前方同学，也编成三个区队，由杜楚仙、梅继仁、吴嵩云任区队长，

迁驻关帝庙后的九溪大屋，但上课和出操仍在一起。

当干训班实际开学一个多月之后，即前方同学来班之后，李觉才来补行开学典礼。他在大会上，阐述创办干训班的目的时说：“我军并非没有干部，但大多思想陈旧，不能适应今后抗战的环境，办干训班，就是为本军补充新鲜血液，培养有生机的干部……同学们要努力学习，前程无限……”

接着陈希周主任讲话。他手执一张蒋介石的委任状，在讲台上一晃说：“我来七十军办干训班，有人不高兴，但并非我自己要来，是军座请求蒋委员长派我来的，这是我的委任状……”因在开学典礼上，还有随李觉来的军参谋长以下的多人。陈这番话的目的，是当着这批人显示自己来头不小，名正言顺，因七十军一部分人害怕干训班培养的人将会取代他们，直接威胁着他们未来的官运。其实蒋介石的委任状，只是任命陈到南方巡视部队党务，这种移花接木的戏法，不过是为了吓唬这些人而已。

1938年10月10日是旧国庆节，这一天，干训班在关帝庙前搭台召开宁乡各界军民联欢大会。清晨，陈希周主任要文振亚乘陈的自行车，奔赴长沙，买回胶卷，在下午大会现场摄影。其中部分底片，一直珍藏在文振亚手中（解放后已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在宁乡腰铺子关帝庙这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地下党组织发展很快，后方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各地党组织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进步分子，所以党员已达半数以上。但仍坚持秘密工作的原则，只能单线联系。对前方同学，也加强了团结工作，学习空气又趋活跃。在政治学习方面，除学习了各位教官任教的课程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等文件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外，还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进行了各种讨论与积极的抗日宣传活动，更

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军事方面，完成了班攻防战斗教练和射击教育，许多同学的射击成绩都在10圈以上，还掌握了一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11月长沙大火后，形势紧张，为了安全地完成最后阶段的训练计划，干训班迁到益阳马迹塘（现属桃江）。这时政治学习基本结束，除政治教官朱江户继续留在干训班外，许德绥去江西泰和担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去了，蒋宗敬也去江西当了国民党的专员，彭济民也随同前往，李乃仁（后改名荒芜）则去了重庆《扫荡报》，程今吾也先行离去。这些知识丰富，循循善诱的教官们，使学生们难以忘怀。

1938年旧历年底，在益阳马迹塘举行结业测试。总分第一名为后方同学林荫（广东人）所夺。带前方同学来干训班的文翰，自恃其在前方同学中文化最高，内心不满，串连少数前方同学伺机闹事。趁结业聚餐前，鸣枪为号，受其利用者即大叫大闹，砸破席上的饭碗菜盆，扰乱食堂秩序，经后方同学中久经革命锻炼、在同学中威信很高的杜非（即杜修经）上前说服制止，一场风波，迅即平息。

翌日，前方同学提前返回部队，在列队惜别时，陈希周和朱江户语重心长地亲切叮咛，勉励大家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时，前后方同学齐唱陕北公学的毕业歌《毕业上前线》和《再会吧，在前线上》等歌曲。慷慨激昂的歌声，代表了我们依依惜别的革命情谊。这批前方同学，通过“云干班”数月的教育，提高了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认识，在以后抗日战争中，涌现了不少英勇战斗、坚决抗日的勇士，如谭昌元同学等都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前方同学离开后数日，后方同学也开赴赣北前线七十军防

地接受实战教育。游毓楨大队长因事离开。七十军派来一个自称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欧阳禧接替工作。这个人生活腐化，骄傲自大，又沾染一身性病，同学们对他敬而远之。干训班结束后，他下部队当了团长，听说在一次战斗中，被他自己贴身的勤务兵枪杀了。

在去赣北前线途中，从株洲乘火车，刚到距离南昌仅四十里的莲塘，即遭日机空袭，干训班同学紧急疏散，敌机反复进行扫射、轰炸，全体师生因隐蔽迅速，安然无恙，但友军和居民，有的中弹，有的被炸，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益增同学对日寇的仇恨。可算敌人给我们上了实战的第一课。

在南昌仅休息了一天。这时，日寇已陷九江，进逼修水河岸，距离南昌不远。我们也无心去浏览滕王高阁、洪都名胜。只在赣江大桥上听了郭超同志介绍南昌起义情况，同学们对这英雄城市产生了无比的敬仰。

经过几天的爬山越岭，走过无数的羊肠小道，才到达七十军军部所在地永修境内的西坑。陈希周和朱江户象伴送出嫁的闺女似的，携带着我们同来前方，在茅草搭成的临时营房中，进行临战前的预备教育。

在这期间，李觉的夫人何枚女士也随军住在这里，为了表示她对于训班学生的关怀和重视，特派人去浙江金华买来一批金星钢笔，上刻有“云干班毕业纪念”字样，分赠给全体后方同学。

因黄仁、钟雄飞等在军中到处散布干训班赤化了的言论，早在益阳马迹塘时，十九师师长唐伯寅就对人说过“干训班是红色的染中营”之类的话，因此，在一天下午自习时，十九师参谋长唐群衡，突然闯进同学们的教室到处翻阅，发现陈安贤的日记采用公元纪年，又在韩旭翔床上翻出几本进步书刊，如获至宝似地拿到李觉跟前说：“干训班有异党分子，您看这

就是证据。”同学们也立即向陈希周汇报，陈泰然自若地走到李觉那里说：“这几本书刊是我在行军前为了轻装而交韩旭翔带来的，如果说有这类书刊就是异党，那么我那里还有几本日文书籍，我岂不成了共产党和汉奸么！至于用公元纪年就有异党嫌疑，那么欧美所有国家都成了共产党国家了。”几句话驳得唐蔚衡无言以答。李觉也就顺水推舟将日记和书刊退还。

在西坑期间，郭超、黄中强、尹组湘、陈伟、唐楚雄等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七十军政治部的政工队，郭超、唐楚雄分别担任了正副队长，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抗日。一次郭超为政工队办的刊物写了一篇宣传材料。在送往军政治部审查时，政治部黄主任质问郭超说：“你的文章中有好几处提到‘委员长’，你这到底是指蒋委员长，还是指毛委员长，抑或是别的什么委员长呢？”郭答：“当然是蒋委员长！这还有什么疑问呢？难道你认为中国还有另一个什么委员长么？”这样答才使黄主任无疵可指了，这也是黄仁在宁乡被撵回军部以后，到处散布干训班赤化了言论所引起的。因此，新成立的军政治部对干训班同学的言行特别注意，尤其在胡兰畦率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战地服务第二团到七十军军部作慰问演出的那几天，监视干训班最为严密（战地服务第二团是归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主要成员多来自新安小学旅行团，是进步团体）。

七十军政治部的主要人员是陈诚派来的特工。蒋介石只求李觉为他作马前卒去打仗，可在装备补给上却多方克扣。对此，李觉非常不满，故对军政治部也不买帐。当黄主任向李觉提出郭超的思想有问题时，李觉说：“如果你认为他不适宜在政治部工作，就将他调回军部吧！”

1940年，陈诚为了拉拢利用李觉，除了给李一个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外，还补充了一些装备。随着又搭配一批“抗青”（特务组织）的成员渗入七十军，原先李觉部队只有国民

党和我们共产党，后又加进了“抗青”，至此，政治斗争就更复杂和激化了。

有一次，七十军政工队十几个同学外出搞宣传去了，仅郭超在家看书。钟雄飞来了，他趁郭到伙房打开水给泡茶之际，鬼鬼祟祟地连忙翻开几个同学的枕头，搜出许多进步书籍，然后交到军参谋处，陈希周恰于这时来到政工队，郭超将钟雄飞的行径向陈报告。陈说：“没关系，如果军长问你，就说是我因行李太重，行军不便而精简了的书籍被你们顺手拾来作参考的，并说当时我是知道的。”说完即去找李觉说：“刚才政工队长郭超报告说钟雄飞到政工队偷偷摸摸地抄去了不少队员的宣传材料，这事是不是军座的命令！”李觉说：“没有，我没有叫他去干什么！”说完，马上要传令兵将钟雄飞找来，当着陈希周的而质问：“是谁叫你到政工队去抄学生的书籍？学生们不看书谁看书？”钟雄飞无言以答，只得灰溜溜地退下来将书退还政工队。

1939年2月，干训班后方学生被分配到修河南岸七十军前沿阵地各连当见习兵，接受实战教育。事先李觉即向各连布置任务说干训班学生下到各连，既要让其参加战斗，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所以同学们在各连被称为“军长的学生兵”而受到照顾。

在实战教育期间，除参加经常的防御阻击战外，还多次随同部队夜袭敌岸，拔掉了敌人一个排哨，袭击了一座碉堡，并俘虏了两个日军。大家虽是第一次上前线，却都表现很好，从而改变了部队干部对干训班学生的看法。

实战教育还不到20天，各连突获军部紧急通知，要同学们立即快回军部集中，因南昌失守，我军和友邻部队共五个师已处在日寇包围之中，约经半月的日夜行军，最后在部队掩护之下，才突出敌人重围。

当我们干训班紧随军部突围，将过铁门坎时，日寇已快形成对我军的钳形包围，仅铁门坎这一高地尚在我军坚守中。而我们的队列却排在军部之后，有被敌人切断的可能，情况非常危急。李觉冒着危险，急攀上铁门坎顶峰，取下头上伪装的树枝挥舞，大声呼喊：“干训班的学生快上来呀！要不就被切断过不去了！”经李觉这一鼓动，我们便迅速地通过了险境。可是据守在铁门坎的梅继仁营，为了坚守阵地，继续掩护部队全部通过，全营官兵都壮烈牺牲了。烈士们的英勇行为，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七十军突围后，回湖南醴陵一带补充休整，这时已是1939年三四月了。李觉即选送二十个同学，分赴中央陆军步兵和工兵学校受训，去广西洛容步兵学校的有杜修经、韩绍武、王意竣、胡祝三、龚曙生、陈安贤、文振亚等十人；去零陵工兵学校的是左世俊、林荫、李贤杰、伍华清、余沛卿等十人。这二十位同学，在两校经过短期的培训后，各拿着一张中专陆军步兵学校或工兵学校的结业证书回到七十军来。两个军事学校都是蒋介石兼任校长，这都可名正言顺地算是蒋的学生了。同时，在地下党组织的同意下，在两校都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因此，同学们都称这两校之行，是“镀金”，是“下染缸”，为今后在七十军工作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李觉送学生到中央各军事学校受训的目的是想以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去下“染缸”，使上报军官花名册上有军校毕业学生的比例，作以后抵制蒋介石分配军校学生名额的借口，可说用心良苦矣。

去步、工两校的同学离开后，干训班其余同学于1939年三四月，在醴陵泗汾举行毕业典礼，进行毕业分配。除杨铁山年龄较大，秉性斯文，被留在军部参谋处充当见习参谋，李德健因擅长武功被安排在军部警卫营当连长外，其余同学则被

分配到七十军所属的十九师和一〇七师当上士见习排长。郭超则由政工队调到军部先任队列参谋，后去补充团当排长，在分配前，他号召同学们要坚持在士兵群众中开展工作，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并指出官兵是鱼水关系，爱护士兵，尊重士兵的人格，不能体罚，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官兵关系，一致抗战。郭并说：“从前一段的情况看，李军长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这是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大家应尽一切努力，把这支部队转变成为江南不佩八路军臂章的八路军。”

不久，补充团随军部迁驻攸县皇图岭附近。一个星期天，李觉到补充团和几个同学闲聊说：“郭超在补充团搞得不错，抗日宣传和官兵关系都搞得好，伙食也改善了，没有打骂士兵的现象，士兵也没有开小差的，我们军队就要有这种风气……”

1939年夏的湘北会战中，胡祝三、程景嵩、谭昌元等都在与日寇肉搏中英勇牺牲。这事给李觉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干训班学生素质很好，不但会作宣传工作，会训练新兵，且能英勇战斗，这样的学生如能更多一些就好了，于是决定把同学们全部调回后方来，为他训练新兵，并拟再办一期干训班，他找陈希周征求意见，陈与游毓楨、郭超研究。游毓楨认为干训班不必再办，他说：“只要把同学们都集中到一个团，由我来指挥，就能象北伐时期叶挺的独立团一样……”郭超认为要把七十军变成江南的八路军，光靠一个团不行，还应该有更多的抗日志士，充实到各师旅团去起核心作用，因此，干训班必须继续办下去。

陈希周把两种意见转告李觉，李乃决定举办第二期干训班，并指出这次招生，由第一期学生介绍进来，其言外之意，是要我们的同志介绍学生，隐示了李觉对我们的信任，也说明了我党在七十军的工作成绩卓著。

续办干训班的主意确定后，郭超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由

韩旭翔送交杨第甫同志，另一封给湘鄂赣特委杨乐如，信中除汇报党在七十军的情况外，并要求选派学生到七十军第二期干训班受训。

至此，七十军在后方招收的第一期干训班同学，除刘东安、康杰被组织派到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训班受训外，黄非丹去新四军，曹垣、李家兆、朱云鹤、余大猷、任鹤鸣、陈之义、陈厚生、史振宇、刘禄生等先后离开，杨铁山、李德健留军部，胡祝三、谭昌元、程景嵩在抗战中英勇牺牲外，还有郭超、杜修经、韩旭翔、韩绍武、左世俊、陈立权、余策安、周郁安、陈安贤、许振纲、许俊煜、言晓峰、陈伟、余沛卿、龚曙生、张守敬、吴乐邕、李云卫、李祥铎、李克玖、熊佳木、袁龙、匡南阳、伍华清、王意竣、沈锦成、李贤杰、林荫、刘日成、周光焱、张明睿、欧阳震东、黄克文、万佩珊、尹组湘、尹组环、陈慎言、魏汇川、唐楚雄、李悦民、黄中强、黄履祥、牟凤鸣、黄楚湘、文振亚等四十余人，都分派在七十军所属的十九师、一〇七师和军部干训班工作。

第二期干训班的工作人员及学生是1940年初在七十军军部所在地江西修水县的渣津集中的，正式开训则是同年4月迁到江西贵溪上清镇以后，上清镇是道教始祖汉天师张道陵故里，干训班班本部和大队部就驻在天师府旁一家大院内。

第二期干训班规模比第一期大得多，有军官、学生、士兵、儿童等五个连的编制。除名誉班主任仍由李觉自兼外，其余人员今天能记忆出来的有下列等人：少将班主任陈希周、上校大队长游毓楨、上校大队副何畏、中校大队副祝祖让、教育副官刘汉文、彭克凯，少尉庶务副官周郁安（共产党员）、吴越，上校政治教官朱江户、少校音乐教官张彤波，上尉宣传干事鲜于国风（朝鲜流亡青年）、中尉助教黄殿恺、少尉干事张守敬（共产党员）、军官连中校连长郑乃之、学生连上校连长何

畏（兼）、上尉副连长张寿乔，上尉排长向实、陆承恕、王碧云，少尉排长郭超（党总支部书记）、廖靖，少尉助教陈安贤（党员）、陈立权（党员）、刘日成、李贤杰、石瑾、郑衡、军士第一连的少校连长郑锡元，少尉排长刘明远、夏某、张俊诚、文振亚（党员），军士第二连少校连长林光、少尉排长黄中强（党员）、儿童连的中尉连长李悦民（党员）、少尉排长唐楚雄（党员）、熊佳木、李富文，少尉庶务郭观国（党员，郭超之弟），中尉政工队员王崇德、左玉娇。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当时地下党在七十军的组织原则，是单线联系，这些人员的政治情况，是笔者在解放后听到健在的同志说的。其中肯定还有不少人是党内同志未能记述和注记出来。

至于上层的陈希周、朱江户、游毓楨乃是与上级组织另有联系的同志。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希周主任于1940年初，应其好友李济深邀请，由桂林绕道去重庆，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弄到一个更象样的富衙——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委员，以视察三、九两战区的国民党党务的名义回到班内工作。

自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后，为了保存革命力量，1940年初，湘鄂赣特委将岳阳的十八个同志（全部是党员）由特委杨乐如送来贵溪，陈昂、刘美印、郑劳、郭云龙（郭美春的化名）、杨大明、刘荣生、万人杰、许益等八人安插在学生连受训，其余则分派在大队部和各连工作。如童年在军士第二连，赵勋伯在军士第一连。并由李觉、陈希周、游毓楨、朱江户等各凑一部分资金，在上清成立了一个消费合作社，以安排岳阳来的同志。由李西安任经理，名为合作社，实际上是党的地下交通站，一方面接待过往同志，一方面由李西安同志以采购货物为掩护，公开往来各地做党的交通工作。

这时，党在云干班的力量强大多了，党员也集中了，并可定期过组织生活，如笔者即与岳阳来的赵勋伯、杨依两同志为一组在上清镇郊外秘密集会多次。张守敬与周郁安及另一个安置在大队部以负责油印工作为掩护的岳阳同志编在一组过组织生活。

这时，郭超同志深感自己担子太重，为了更好的领导工作，派韩旭翔同志专程回湘向省委杨第甫同志联系，请求增强领导力量。湖南省委决定抽调刚从延安抗大毕业回湘，担任湘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刘柱中（化名刘慎之）同志来干训班协助郭超工作，刘行至中途，为某军哨卡扣留，得游毓桢去电话联系，才平安抵上清镇，被委任为军士第一连少校连长，以接替郑锡元职务。

学习期间，陈希周责成张守敬编写油印小报《七十旬刊》，报道分析当时形势，批判后方妥协空气，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出刊后，只在于训班内部传阅。

这时由政治部派来两名政工队员：一个王崇德是山东馆陶的流亡学生，经李悦民、唐楚雄两同志争取培养后，进步很快。另一个黄殿恺是江苏宜兴流亡学生，经陈希周与其他同志争取团结，思想进步成了倾向革命的同路人。

为了与当地人民欢度端午节，干训班举行龙舟比赛。不会泅水的郭超同志也带头参加，比赛中不料落水，幸被同学救起。

1940年7月7日，干训班和另一支友邻部队的训练班联合在上清举行纪念卢沟桥事变三周年大会。事前，总支决定郭超同志不发言。但大会上，朱江户和友邻部队训练班某主任讲话之后，同学们觉得某主任的讲话，只讲学习，不提抗战，只强调军人的绝对服从，不提军人对捍卫民族生存，救国救民的神圣职责，纷纷鼓动郭超讲话，郭超于是激动地走上台去，阐明

军人的神圣职责不比打内战时期，而应竭尽全力，牺牲一切，挽救在日寇铁蹄之下受煎熬的沦陷区同胞，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完成这一使命，必须联合各民族各党派，精诚团结，国共合作就胜利，分家则失败……郭超话未完，那位主任即写了一张纸条给朱江户，上写“把剿匪说成内战未免不妥”！朱忙把它递给郭超，郭看了看，因正讲在兴头上，并不理会，直至讲完为止。

当晚，总支召开紧急会议，对郭的讲话提出严厉批评：一、违背总支事前决议；二、暴露了自己，忘记了当前已处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环境。会议最后作出给予警告，并停止党总支书记职务一周的决定。这是因为党在七十军的组织工作，只有郭超了解全面，停止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工作。

这时，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仅七十军政治部的特工人员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还有从中央军校二分校分派到七十军的一批毕业生，也安排在干训班各连当排长。他们当中，有的也是负有特殊使命来的。他们配合政工人员向受训学生侈谈其“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之类的口号，贩卖法西斯绝对服从的奴才哲学。并经常对我们同志的一切活动进行监视和刺探。如军士第一连的排长，军校毕业生刘明远，见他在同当排长的军校同学张俊诚（醴陵人）与我党安插在该连以当传令兵作掩护的赵勋伯同志比较接近，就要张经常喊赵勋伯同志到他们住的房间去扯谈。妄想从赵的口中套出他所要了解的刘慎之同志的情况，但多次都被机灵的赵勋伯同志巧妙地应付了过去。

由于形势的恶化，1940年7月，湘鄂赣特委杨乐如赶到上清来传达江西省委（这时湘鄂赣特委已归江西省委领导）指示：“郭超必须立即撤离去延安；李西安转移去湘鄂赣特委工

作。”干训班总支书记经选举由李悦民接任，唐楚雄为副书记，刘慎之负总的责任。郭超即将此情详告陈希周。陈立即乘马去七十军军部取回一叠盖有七十军公章的空白证明，要郭以去武冈分校受训的名义迅速同杨乐如离开上清镇。其余证明，由郭超中途视需要填写，郭超在向刘慎之、李悦民、唐楚雄等同志交待了党总支工作和党员名单，并向朱江户、文振亚及干训班部分同志秘密道别后，就匆匆离开了。郭自7月下旬离上清，辗转赣州、攸县、桂林、重庆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与南汉宸同志一道于1940年底到达延安。

在此之前，党在七十军干训班的工作，一直是湖南省委派杨第甫同志直接领导的。在此期间，除郭超于1939年到湘潭亲自向杨第甫汇报工作之外，1940年第二期干训班开始后，郭超又要李悦民借去桂林购买书籍的机会，绕道湘潭与杨第甫联系。另外，韩旭翔也到湘潭与杨第甫联系过两次，不过第二期干训班因驻江西贵溪，所以和湘鄂赣特委及江西省委的接触就比较多些了。

1940年8月，七十军又保送杜修经、刘定贤、文振亚等去中央军校。以后还陆续保送了陈立权、黄中强、黄履祥等多人，以实现李觉派送自己的干部到中央军校去“镀金”的计划。

同年8月7日，陈希周经上饶回福建崇安原籍探亲。事先，早有人向陈透露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布置，说只要陈希周回福建，就要对他下毒手！这时，陈希周同志自恃是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委员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党务的，谁也不敢怎么样。不料8月13日从崇安返上饶途中，与其警卫员在长途汽车上惨遭“国特”杀害。噩耗传来，干训班学生无不失声痛哭。陈的胞妹陈良瑛女士曾为此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呼吁追捕凶手，当然毫无结果。李觉闻讯立即派陈的好友，七

十军上校参议管长埔到崇安悼念，并以三千块大洋作为抚恤。

陈希周同志牺牲之后，因其身份不明，一直未被作为烈士对待，直到1982年经福建省委查证落实是党的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才追认为烈士，将骨灰移葬烈士陵园，并举行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

在“崇安惨案”发生后不久，即农历中秋节第二天于训班开始向江西上高方向迁移。约10月初，正当学生连在罗坊进行下连队实习前的准备教育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三次密电李觉，说“岳阳有一批共产党潜伏在学生连……”李对两次电报都未作任何反应。当接第三次电报时，薛岳派了一个全副武装的副官长携一名便衣来七十军驻地逼迫李觉将学生连集合起来，四周严密布下警戒，然后那副官长按名册点名，随来的便衣——叛徒杨其春依名指定，当场抓了学生连支部书记陈昂和党员刘美印、郑芬、杨大明、刘荣生、万人杰、许益等七个同志。这七个同志虽经敌人严刑拷问，始终未泄露组织机密和牵连其他同志。其中，许益因年龄最小（仅十六、七岁），又得其所属区队长陆承恕（是军法处刑讯科长的堂弟）的鼎力担保，学生连长何畏的说情而保释外，其余六个同志都在上富镇惨遭杀害。这是继“平江惨案”之后，蒋介石集团制造的又一血腥暴行——“上富惨案”。

出事之前，朱江户曾秘密告诉陈昂说：“军长说薛岳来电，说岳阳有一批共产党潜伏在学生连，明天军长要与学生个别谈话，意在考察，你们要作好应付准备，不能露馅（其意是不能承认是共产党），李觉一贯是站在同情的立场，绝不会用刑拷问的。”

第二天清晨，朱江户又骑马来学生连，借口集合学生作简短训话之后，趁陈昂牵马之际暗中交给陈一个纸团。陈昂等人在朱离去之后，背地拆开纸团一看，里面包着十元纸币，纸

上写着“速向上高方向逃走”。可陈昂等同志还未及逃走，就遭了难。

与此同时，朱江户又要郭超三弟郭观国暗中通知干训班其他党员紧急转移。三天之后，朱从军部回大队部时，见这些同志还在，急得直跺脚说：“他们怎么还不走？！”大家说没有钱，也不知向哪里走？朱立即要大队部给每人预支十二元钱，加之牺牲的同志未牵扯他人，这些同志才得以从容地分头逃离险境。童年、陈清溪等同志逃出上高后，听说湖北崇阳一带有我党组织的游击队，遂投奔崇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同游击队领导人李中礼、李平等同志一道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伍，扰乱敌后，给敌人不少的打击，不料一天夜里在一座高山破庙宿营时，被和尚告密，遭到当地地主武装和日寇十倍兵力的重重包围。韩冰生、陈绍藩、毛国苏三同志壮烈牺牲。其余突围脱险。

“上富惨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来自岳阳的杨大明向其父母写了一封家信，当深夜陈大明的妹妹低声念信给其父母听时，波叛徒杨其春窃听了去。并于翌日将信窃到手后，向国民党岳阳县党部告密，当九战区薛岳获岳阳急电后派员携叛徒杨其春到上高罗坊学生连现场指认。遂使党在七十军的组织受到重大破坏。

朱江户同志等学生连其余学生分配到部队见习以后，乃携张守敬到泰和江西保安司令部政训处找到了许德瑗，托许为张守敬安置了工作，然后自己去了桂林。

至此，只有游毓楨等一些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继续留在七十军工作，但党在七十军的组织已被国民党摧毁，散处在各部的党的无数优秀儿女，失去了党的联系，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如党总支负责人刘慎之、李悦民逃长沙，转桂林，找党无着。无可依托的赵勋伯同志，不胜感慨，因改名赵慨萍以抒

其怀。党在七十军的活动，虽然没有谱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但它仍是当时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一环。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一、二期干训班中，迅速建立了党的组织，培养了革命干部，考验了革命队伍。干训班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有与士兵同甘共苦，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能民主治军而为部队长官赞扬的一批好干部，且有英勇抗日，壮烈捐躯的战斗英雄和“上富惨案”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党组织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做到了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在上层，把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女婿李觉，由只是对蒋介石的歧视心怀不满，逐步转变到同情革命，掩护我党同志工作的立场上来。解放前夕，他和程潜、陈明仁、唐生智、马子谷、宋英仲等积极为湖南和平解放而奔走，并促其实现。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全国政协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在下层，我们团结了前方同学，为部队干部作出表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队素质。

经验教训主要是：不少同志警惕性不够，往往过于激进，过于暴露，一经出现叛徒，党的组织就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就遭受惨痛的损失。

其次是党在干训班发展组织的对象，偏重于后方招收的学生，对前方同学侧重于团结，党组织发展的范围受到局限。

还有，“上富惨案”发生后，上级党没有及时作好善后处理和恢复组织工作，致使分散在七十军各部的不少党员断了党的关系，失去了党的领导，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以致争取、转化七十军的工作功败垂成，深为可惜！

## 司令部青工队长被通缉

谭一天

1944年4月，日寇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国民政府军队节节败退，湖南眼看就要成为沦陷区，我和谭鸿钧、谭承谋（梅）、谭汲等草市青年学子不愿做亡国奴，打算逃出去，或继续学习，或投笔从戎。不料，衡山县已于6月25日沦陷，县长被俘，县政府也被打散，没有地方打难民证，没有难民证去哪里也不成，我们一筹莫展。这时，陈瓚等劝我们留下来，和他一道打游击，共同保卫家乡，并说：“你们年青又有文化，如果参加游击队，一定是游击队的精英，不但有作为，而且会大有作为。”于是我们改变主意，决定留乡抗日。陈瓚很高兴，派我担任衡山县自卫队河东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年工作队队长，谭汲为副队长，并交给我们发动青年，组织青年的任务。

我们接受任务后，即回草市发动组织知识青年。当时，草市高小以上的学生起码有两三百人，和我们同过学的至少也有五六十人，要在往常，不消三天，便可聚集三四十人，而这时，聚集二三十人也困难万分。当时，各家纷纷逃难，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地，要寻找一个人，原来的住址是寻不着的，就算打听了他家逃到了那条山冲，也常常扑空。我们只得分头寻找。

●即本文中的谭瓚，当时在衡山县任自卫队河东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工队长。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青年工作队成立的那天总算邀集了20余人。

青年工作队的建队大会，在源头玉壶岩前举行。建队会上，许多同学慷慨陈辞，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志愿，复兴中华的重任已落在我们的双肩，我们生逢其时，责无旁贷，还表示要与我同生死共患难。会议还通过了我提出的我们今后行动的共同准则，即：1、坚决真心抗日，风雨同舟；2、不骚扰百姓，不欺压百姓；3、借老百姓的东西要还，损坏了照价赔偿；4、勤奋学习，努力工作；5、团结互助，亲如手足。

建队后，我们在源头垅驻下来，和睦相处，每天走乡串村，进行抗日宣传。

7月，忽然接到司令部的命令，上四峰山集中集训。

## 二

我们奉命开拔到四峰山后，被安排住在桑梓岭的一座坐北朝南的民房里。房子比较大，住我们二十多个人绰绰有余。房子前面有片平地，长约20米。

住下的第二天早餐后，全体在前面坪里集合，我重读了建队会上的五条誓词，然后说“我们昨天是学生，今天是游击战士，就得有纪律，希望大家认真自觉地执行五条誓词。”并根据大家的意见，制订了训练计划。

每天清晨，由我带队长跑、爬山，从桑梓岭的民房，跑到凤仙庙，再从凤仙庙跑回住地。早饭之后，三操两讲，有时由司令部派人来讲授，主要还是由队内能者为师，教立正稍息，齐步正步，队列变换。这些基本的东西，大家一学就会，因为我们在初中，都受过童子军训练。

在桑梓岭期间，我们的军事训练主要是学习劈刺、瞄准、投弹。我们只有一条真枪，不够用，没有真手榴弹，山上有的

是木材，我们就自己动手，做了好几条木枪，好些木手榴弹，作为训练之用。

其次是加强野外训练，如匍匐前进、阵地转移、地形地物的利用等等，大家每天弄得一身汗、一身泥，从没有谁叫苦叫累，总是快快活活的。

在课堂上听讲，大家专心致致，不管是司令部来的老师，还是队友讲课，都极认真，恨不得将该学的军事知识一古脑儿学到手。下了课，还要互相切磋，加深理解。

尤其是教唱抗日歌曲时，山冲里更呈现出一种特殊气氛。宋晨曦教大家唱“八百壮士”歌时，村里的青少年也跟着吼了起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战士孤军奋守东战场！……”不到几天，桑梓岭的青年男女，少年儿童，都会唱不少抗战歌曲，《大刀进行曲》更是人人皆会。

我们的同学，不仅努力学武，而且有空就学文化，读诗文、学算术、看历史，那种发奋求学、努力向上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

下午散操之后，便三五成群，有的上山寻野果，有的下溪洗澡。有一次上山寻果的人遇到两只小獐从他们裤下穿出，竖起耳朵回头望了他们很久，才突然向灌木丛中窜去，等他们意识到这是什么时，已无影无踪，回来向大家一说，掀起一股捕獐热。第二天下午上山寻獐，一无所获，却发现不少的干老虎屎，这才断了捕獐念头。下溪洗澡的在卵石下翻出许多螃蟹来，还只铜板大一个，不过为数不少，于是大喊拿水桶来，好几个人一齐动手，居然捉了两三斤，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每隔三五天，自发捉一次螃蟹，改善生活。

桑梓岭受训近二十天，生活是紧张而又活泼的。在这段时间，深入山村宣传三次，教附近青少年唱抗日歌曲无数次，编

出墙报一张，书写张贴标语数次。我们的纪律严，军风好，可以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深得群众好评。副司令员陈瓚来看我们，也称赞我们军风好，肯定了全队的训练成绩和工作，勉力大家继续努力，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 三

桑梓岭对门是一座楠竹山，山上的楠竹长得密密麻麻。

一天清晨跑步，我们在半山腰碰到了陈瓚。他招呼我们一起来跑步的十多个人进了他的住房，把我们介绍给新来的县党部执行委员、政治部的副主任王文，说：“我想把你们青工队划归政治部领导，他就是你们的上司。”

王文个子瘦高，绿眼睛、高额骨、鹰勾鼻子。我们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他堆着笑脸问我：“谭队长，你是哪个大学毕业？”

“我没有进大学！”我冷冷地回答。

“是哪个高中毕业？”他收住笑容进一步问我。

“没有进过高中，只在县师院读了一年！”我又冷冷地回答了他。

他脸一变，板起面孔继续追问：“他们呢？”

“都是初中生，有的还是高小生呢！”我不高兴地回答。

他听了我的回话，转身对陈瓚说：“副司令，这些娃娃，做得什么？我看……”陈瓚截住他的话说：“王副主任，他们住在桑梓岭，老百姓反映可好啦。他们的壁报，我也看过，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画画得好。版也排得好。我看，高中生，甚至大学生，不一定比他们强！”

王文不信。

这时，我们的同学都气跑了。我便说：“王副主任瞧不起我们，不愿要，我们还不愿去呢！我希望青工队依然由司令部

领导！”

陈瓚见我生气，便对我说：“谭队长，莫生气，你们的工作与能力，我不是作了评价吗？至于划不划归政治部，以后再说。”

我听了陈瓚的话，气虽平了些，但一句客气话也未讲，就冲下山去了。

我回到营地桑梓岭时，队里只剩下谭鸿钧，谭承梅，单德林三人了，其余的同学，都卷起行李走了。我知道他们走的不远，于是便留下单德林看家，其余两个跟我一起去追，一口气跑了四五里，终于在翻龟寨亭子追上了他们。

我们坐在亭子里，一边休息，一边谈。谭汲说：“勾鼻头当面侮辱我们，谁受得住！”其他人也说“要划归政治部，我们便回家，谁受勾鼻头的白眼？”我说：“我和你们一样感到气愤，恨不得马上走。不过陈瓚对我们的评价还是公道的。而且他答应以后再商量。因此，我决定等最后定了再说，那时，我们要走一同走，要留一起留。怎么样？”大家觉得有道理，便又回到了桑梓岭。然而，同学们思想深处，却从此起了新的变化。

#### 四

7月初，司令部还是决定把青工队划归政治部领导，让我们移驻蕉园。他们做了不少工作，一再劝我们。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最后商定：试试看。但谭汲、宋晨曦、苏美德、单德林不愿试，在移师蕉园前就回家去了。

蕉园四而环山，山上茂林修竹，高耸入云，人们以竹木为生。有条小石板路，东通杨林，西通将军庙。蕉园大屋，九进十八厅，古色古香，一面依山，三面傍水。政治部就住在这里，后来司令部、县政府都搬这里来了。青工队没有住在蕉园

大屋，而是住在大屋前面，与大屋隔溪相望。

到蕉园后，黄志雄、旷署初两位同学先后来了，一些逃难进山的青年，如栗木坪的秦振铎（大学生，爱写古诗）、家住长沙的俞六生（高中毕业，是秦的好友），还有李刚、罗耀和（女）、郭杏初和郭起素（她们是两姊妹）等都先后参加了青工队。青工队虽然进了这些人，但因为回去了几个，所以我在的时候，最多也是二十来人。

在蕉园，我们是在王文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由于他手下只有我们这班人马，开始几天，彼此相处还算平静。但我和王文由于有初见的龃龉，彼此没有好感，矛盾的激化是难免的。

一天，我们正在吃饭，王文板着脸，指着旷署初同学问我：“谭队长，他是哪里来的？怎么在这里吃饭？”我听他的口气，看他的脸色，心里很不高兴，便没好气地说：“他从草市来，是新队员，不到这里吃饭，难道到老百姓家去吃？他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吃饭的，他家有饭吃。”

王文见我不买他的账，眼睛一鼓，勃然大怒说：“旷来队，经过谁批准的？”我冷冷地说：“我批准的。”他吼着道：“未经政治部批准，为什么随便吸收队员？”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只要是抗日的青年，谁来都行，所有的队员都是经我同意、经我批准的！”他知道，除新来的六个队员，其余都是草市人，他也知道，青工队是我们几个人组织起来的，这样闹下去，他占不到便宜。因此，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一边恨恨地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一边却悻悻然走了。

我见王文走了，马上对署初同学说：“你别听他那么多，抗日无罪，先来后来都一样，只要我当队长，你就不要怕他，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不干再走，他撵你走，你越不走，那才是好汉。”旷说：“谭队长，我听你的！”

我们估计王文不会善罢甘休。果然，下午上课，他把“三

民主义”改为“总裁言行”，跟我们讲什么“绝对服从”，想以此来压服我们。我们心里虽然明白，但谁也没有吭声，看他讲什么。

他拿腔作调地说：“什么叫绝对服从呢？怎样绝对服从呢？就是必须服从一个领袖，即总裁。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政府，即中央政府。总裁怎么说，上级怎么说，我们军人就怎么行，不能有半点越轨行为，半点犹豫态度，这就叫绝对服从，更形象地说，这块黑板，本来是黑的，但总裁说是白的，上司说是白的，你们就应该跟着说：是！是白的！……”

他讲到这里，同学们再也听不下去了。黄志雄首先打断他的话：“王副主任，你讲的话是总裁说的吗？是他说的，我也不赞成。不论是谁，他的话对，我就听，他的话不对，我就不听，领袖不是自封的，一个领袖，如果强迫别人服从自己，那就可悲了！”谭鸿钧接着说“王副主任，总裁说攘外必先安内，难道叫我们听他的话，又去打内战么？”谭承谋嘲讽道：

“王副主任，总裁要军人绝对服从，我想他也会要求所有的国民党员绝对服从。那么，汪精卫到南京去当汉奸，也当是听从总裁的命令，总裁的指挥喽？”

王文气得粗筋暴凸，大声吼道：“你们想造反！”谁也没有理睬他的吼叫，大家一个接一个发言，对他的谬论进行严正驳斥。最后我站起来说：“王副主任，你不要生气，有理走遍天下，我们是通情达理的。黑板是黑的，上司、总裁说是白的，就让他们去颠倒黑白，但要说黑是白，做不到，我们得尊重事实。‘绝对服从’也不是无条件的，今天你要我去打日本鬼子，不管条件多么困难，我都应该去，如果你要我去当汉奸，我不会去，你用绝对服从是压不服我的，而且，我还会认为你们是国家民族的奸臣，是秦桧一类的民族败类！……”

王文辩不过我们，气得脸色青一阵紫一阵，不断地说：

“反了！反了！这还了得！这还了得！”课没有上完就走了。

我们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怎么想就怎么说，只知捍卫真理，捍卫国家民族利益，不晓得什么强权与阴谋。

王文被气走以后很难消，第二天我便接到了他下的撤职通知，任命秦振铎为队长，俞六生为副队长。

说良心话，秦、俞当正副队长，我没有意见，因为他们的学历、学问、年龄都是我的大哥，并可做我的老师。但王文如此欺人，如此阴险，如此横蛮，实难同他共事。因此，撤职后的第二天，我就下山回家了。

## 五

我因被撤职愤然下山回家之后，虽深感抗日无门，对王文恨之入骨，但深信将来尚有为国效力的机会，因而立志读书，常与先离队下山的好友在一起，切磋学问，过着平静的生活，也还怡然自得。

这种平静的生活过了约五六天，从山上带回的一切不愉快快要被流逝的时光冲淡的时候，我的一位亲戚（在第六大队宋南华队长身边做事）告诉我说，河东司令部密令第六大队通缉我，说我是异党分子且进行异党活动有据。

我暗吃一惊，且气愤至极。我只是一心抗日，想多发动青年加入抗日行列，批准了一个旷署初，和王文争辩了几句，谈得上什么“异党活动？”

我的亲戚提醒我：“现在宋队长的态度不明，你得提防一下，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接受了他的忠告。从此，我的平静的生活便被东躲西藏所代替。

过了好几天，谭鸿钧回来，我这才明白，所谓“异党活动”指的是什么，才知道密令逮捕的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我被撤职离队回家以后，王文拔了眼中

钉，本该轻舒一口气了。不料，就在我离开蕉园的当天，谭鸿钧、谭承谋、黄志雄等同学从外面回来知道我已经走了，心里不服，更感不安。他们一开始就表示要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现在，我被勾鼻头撵走了，他们也不想干了。为了显示大家的团结，表示他们的不平，草市同学便打报告集体离队。报告说：“政治部王副主任大鉴：我们虽然抗日杀敌，保卫祖宗坟墓，为国效劳，无奈学历低，年纪轻，知识浅，做起来，事与愿违。因此，恳请你批准我们离队。……”

王文收到这个报告，大发雷霆，立刻把他们喊到政治部，严加训斥。说是要挟他，一个都不准回去。

谭鸿钧、谭承谋、黄志雄三同学知道王文不会善罢甘休，回到队部之后，卷起行李，不辞而别。随后，董琬、董维德、旷署初，也都先后离队回了家，宋亮也离开了青工队。8月下旬董友松、秦振铎、俞六生也离队了。

青工队的骨干全是草市人，从外面逃来的只有六个，其中三个是女的，草市同学全走了青工队也就维持不下去了。王文认为这是拆他的台，而且认为是我操纵的。他恨死了我，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于是，他给司令部写了一个报告，说：“青工队前队长谭琬，在队时，公开反对总裁，攻击党国，进行赤化宣传；离队后，竟暗中煽动队员，集体离队，破坏抗日救亡工作。经我部调查，确系异党分子。恳请，钧座，速派人将其逮捕归案，严加惩处，以禁其余。”王文到了司令部，将报告送给了蒋达司令员。王惟恐蒋司令不放在心上，不肯下毒手，又添油加醋捏造了许多罪行，才告辞回部。蒋达将这件事交给参谋部办。参谋长罗宝林认为，确定我为共产党证据不充足，认为我是陈副司令留下来并委任的，蒋司令不了解，须请示陈副司令再办才好。蒋达也说“暂时不办吧。”

谁知，王文不肯罢手。几天之后，他不见把我抓回，又找

蒋司令了。深恐陈副司令回来，不肯抓我，要挟蒋司令说：“肃清异党，限制异党活动，是关系党国存亡的大事，总裁有密令，如果司令部不相信我，不肯支持，我这个副主任干不了，只好请司令另请高明。”说罢转身就走。蒋司令深怕他甩手不干，只好拉住他，好言抚慰：“王主任，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何必这样，我怎么会不相信你，不支持你呢？好吧，我要草市的第六大队派人去抓拿就是了！”就这样，一份通缉密令，便下达到了第六大队。

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不敢掉以轻心，天天担心着第六大队的人来逮捕我，但竟然太平无事。

9月下旬，秦振铎、俞六生也离了队，在化龙桥秦怀德家办了个补习班。我非常敬佩他们，和他们合得来，是好友，便去化龙桥补习。从闲谈中，我才知道第六大队的宋南华队长曾到司令部了解青工队发生的情况，他在参谋部了解情况时，恰好他的房弟宋亮也在此时准备离队，宋亮便把青工队发生的种种情况，告诉了南华，宋队长才把通缉的密令压下的。

那时，我哪里是共产党，又何曾进行过“异党活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爱国的、追求真理并愿为保卫祖国、捍卫真理而献身的青年而已。

11月初，化龙桥的补习结束，回家后不久的一天，一位二十多岁的不速之客来到我家，不修边幅的文弱书生模样，落落大方，进屋便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谭璜同学。我是你的同学陈利贞的叔叔（陈绍夫）。你的官司已没有事了。家兄陈瓚从河西回来，方知你被撤职，被王文撵走，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立即收回通缉密令，不让他再胡闹了，家兄曾多次赞扬你，说你是个有志的爱国青年，还说草市有一群非凡的爱国青年呢。”

## 中国工合在邵阳

陈 球\*

1938年7月，由宋庆龄出面，沙千里等积极活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新西兰人）、斯诺等积极赞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和指导，“工合”召开筹备会，中共代表王炳南参加，路易·艾黎还三次赴延安，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毛主席表示欢迎并作指示。由于宋庆龄出面，“工合”也获得了宋氏姊妹兄弟的支持，蒋介石与孔祥熙也表同意，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奔走于延安与武汉之间，对国共合作抗日，也起了促进作用。

经过一个时期的筹备，1938年8月5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口号是“发展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孔祥熙答应由行政院财政部开支“中国工合”的行政经费，它是行政院管辖的民间战时经济开发的互助协作社会团体，又是以工代赈的利用国际援华、发展生产的战时救灾团体。为了解决行政经费问题，工合总会推举孔祥熙为理事长，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路易·艾黎、沙千里、千家驹、邓颖超、林伯渠、董必武为理事。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工合总部”暂迁长沙。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工合”再迁宝庆（邵阳），后辗转迁重庆，以后成立西南、西北、东南、晋豫、川康等五个办事处。1939年又在解放区成立晋东南办事处，主任孟用潜，专门从事

\* 陈球当时在邵阳从事新闻工作。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开发工作。

工合西南办事处设邵阳东门外保宁街103号第一精棉生产合作社内。1939年，路易·艾黎与卡尔逊曾来邵阳视察，艾黎用流利的中国话与工人讲话。这年，西南办事处迁往广西桂林，工作区域为湖南广西，故又称“湘桂办事处”，主任林福裕是有名的工程师，他随“战时服务团”转到内地，他把先科学技术贡献给中国工合事业。

西南办事处设邵阳事务所（后改称“湖南事务所”），主任柳林，安徽凤阳人，是负伤的飞机师，改习工业，他也是参与“战时服务团”转入内地的。之后，张蕴良担任主任，张又是“华洋义赈灾委员会”农利股股长。因张蕴良的关系，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华洋义赈灾会”参加了工合活动，在当下刘家办了信用合作社，由农利股派共产党员罗崇灏亲自蹲点，选刘道萌为理事主任，并开办织袜和用土法染袜，后又发展手工织布，在刘道萌家集十多部织布机，组织老织匠带徒弟，培养新手，并恢复旧染坊、土靛制造业。由于洞庭湖滨被日军侵占，被花无法运邵，只能由商贩从资江上游运送宝庆地区的山花，经沙塘湾、麻溪等地，或转蓝田，或船运宝庆转口，因此当时的当下刘家成为抗战期间花、纱、布、袜、毛巾的产、供、销大协作的中心，为蓝田和宝庆的工合生产社，提供大量土纱、土布。当时坪上、两市塘一带的花纱布小贩与当下刘家的往来不绝，从坪上到麻溪的农村土靛制造业也因而大发展，从而带动了农村广大妇女因洋货倾销而被迫废置的“纱车”重新用起来，邵阳农村土纱土布就又发展起来，工合还改造了织布机，幅度加宽，并采用手扯梭，大大提高织布工效。农村纺织生产大发展，使得城乡集体个体大协作，有力地供应了战时的军需民用，支援了长期被战。

1944年8月，衡阳沦陷，邵阳紧急疏散，中国工合总部派

孟用潜到邵阳，在白仓司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组织安全转移，湖南事务所（亦即邵阳事务所）迁安江（后再迁泸溪），10月2日邵阳沦陷后，工合所属各生产社，有的迁往大山区，有的被日寇把厂坊夷为废墟，幸存的力争生存，把原材料搬往新化，不久日寇又从邵阳来了，一切打算，皆成泡影。

战后，工合湖南事务所从泸溪迁回邵阳，由总会派梁有昭为主任，在废墟上重建。1946年，又遇邵阳大旱成灾，总会派王毓麟来邵，与梁有昭商议，请总会名誉主席宋庆龄拨款开展恢复工合业务，建造纸、制革等生产社。

1949年10月邵阳解放后，工合所属生产合作社由邵阳专署财委接管，下设碾米、制革、织布、营业四部，由赵福全任社长，陈元龙任社长，梁有昭为工程师，把三个生产社办成邵阳市第一批社会主义合作企业。

碾米社由尹桂初、罗志超、汤正祥等九人在工合湖南事务所指导下，在邵阳田家湾37号建房，由湖南事务所贷款3000元，又向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邵阳办事处申请拨一部份救济面粉，并按社章每人入了股金，开办了机器碾米。社员大都是20多岁的穷孩子。

1950年5月碾米社由邵阳专署财委接管完毕，12月，工合撤销时，邵阳碾米部曾拨出稻谷6000斤，奖励邵阳解放时护社有功和坚持正常生产的人员。1951年7月，碾米部改办碾米厂，由姚彬接任厂长，属邵阳专署财委领导。1952年“五反”运动后，该厂在1953年全部合并到邵阳大米厂。

工合制革社，在1950年12月由邵阳专署财委接管后，原制革社的人员70余名，连人带资参加邵阳制革厂的兴建。1952年行业归口时，又并入邵阳工人鞋厂185人。制革厂曾从山东雇请30名制猪革工人来邵阳开始生产猪革，为国家补充牛皮资源的不足，满足当时的军需民用。从牛皮制革发展猪皮制革，生

产规模越来越大，如1951年生产猪皮革6600张，1952年即增加为25100张，皮件皮带如腰带、枪带、子弹袋供军用，品种繁多，花样翻新，还能制造人造革。该厂产品曾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工业品展览会”上受国际称誉。该厂还为尼泊尔培训大批的制革专家，名扬国外。

中国工合在邵阳的精棉生产合作社在抗战期间办得更具特色。早在1938年12月，就由该社经理兼总工程师筹办，生产药棉、消毒纱布、绷带、救急包，医疗救护品，对抗战贡献大。当时，邵阳城乡工合组织的织布社及家庭手工业所收纱、布，都为精棉社加工精制品。还从长沙、湘乡、新化、邵阳本地招收了一批工人，参加精棉社工作。要求保证责任，即保证贷款总额为社员集股资金的20倍，就是说，要有贷款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的社员股金，才能取得工合总会的20倍的贷款。股金只有社员入社时才能交纳入股，每人一股，不准多入。

社员大会是精棉社社员行使权力的主要机构，如选举理、监事会，年终分配制皮等。其分配方案按纯利的20%提为公积金，把纯利的10%用作公益金，10%为职员酬劳金，60%为社员分配金，分配金的一半，按股分红，另一半，按劳分红，按每人全年工资多少进行分配。

社员工余还学时事，唱《工合社员歌》，歌词如下：

“我们是工合的社员，固守在经济的防线，战士们在流血，我们在出汗。我们要用万能的手，加紧后方的生产，建设成自由幸福的国家，支持长期的抗战。”

“我们是劳工，我们要做工，不受人剥削，不做人雇工。加入合作社，大家如弟兄。我们是弟兄，团结不放松，大家手拉手，前进光明中。”

社员识字读报，还学习总会出版刊物《工合之友》，内容是：介绍工合在全国的发展形势；介绍山丹培黎半工半读学校

的大好形势，（培黎技校是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主办的），介绍各地工合的动向，如：西北工合“赶制十万件棉大衣，要换回日本鬼子的十万头颅。”

有一年，精棉社年终分红开大会时，照了一次相，相片上题词写道：

“一年辛苦事，劳力又劳心。年终总结算，净利六万零。一部为公益，三万各平均。同乐开大会，谈笑喜盈盈。谁说劳动者，事业不神圣？！”

工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组合的。当时为了避免当局的猜疑，彼此见面，不喊“同志”，而称呼为“同工”，只要一谈到是工合同工，便亲如一家。

# 回忆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

程起陆\*

## 设置的由来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委会）是依据国民党行政院所颁布的战区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组织成立的。1937年抗日战争事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敌人来侵方向、地区形势和所负担的任务，把全国各地先后划分为若干战区，成立战区司令长官部，对来侵日军进行抵抗。第九战区的划分：由于日寇占据武汉后逐步向长沙方面进展，为侵坚守长沙，所以把湖南全省和江西赣江以西的地区三十六县划为第九战区，并任命薛岳为该战区司令长官。适至1940年春行政院又指定几个战区需要设置经济委员会，当设置战区经济委员会时，它的指示是：“发展战区工、农、矿各种生产，配合军事，与敌长期抗战。”并在第二、第四、第五、第九四个战区设置四个委员会，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是于1940年6月1日，在湖南衡阳组织成立的。

## 组织概况

根据行政院战区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应设置某某战区经济委员会。我被派在第九战区担任这项工作。故定名为

\*程起陆当时任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受行政院直接领导，并受战区司令长官部指导。经委会的组织是由行政院所属之财政部调派，考试院所属之铨叙部甄核司长程起陆为代表，经济部派某某（姓名忘记）为代表，交通部派湘桂铁路管理局长石志仁为代表，国家动员委员会派邹某（名字忘记）为代表，第九战区司令部派陈大榕（先派兵站监营某后改陈）为代表，国家银行派长沙交通银行经理魏云千为代表，湖南省政府派财政厅长胡善恒为代表，江西省政府派建设厅长杨綽庵为代表，合组为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并由行政院令派财政部代表程起陆为主任委员，战区司令长官部代表陈大榕和国家银行代表魏云千为副主任委员。经委会下设秘书、会计及专门委员各室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组；第一组主管人事、文书、庶务、出纳和不属于其他各组的事项。第二组主管战区所属各金融机构如银行业务的经营、账册的稽核等事项。第三组主管战区所属各省市和各县乡工农矿生产的调查设计和生产开发等事项。第四组主管战区所属各交通运输和交通管制等事项，专门委员室负责财政、金融和工农矿各种生产及交通运输管制的调查、研究、设计、审核等任务，因湘西地区农矿产品较丰，旋在常德设置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常德办事处。

## 主 要 业 务

该经委会的业务有主办事业、合办事业与协办事业，兹分述于下：

### 1、主办事业。

（1）机械厂：当1938年冬长沙大火后，所有工商企业以及一般居民的生命财产（据闻被烧死的伤兵居民约计三千余人，公私财产损失无算）都遭到极惨重的毁灭，为使被烧毁机器的修复和小型机械的制造，于1941年春在衡阳设置第九战区

经济委员会机械厂(简称九经机械厂)，以长沙大火后撤退来衡的部分机器为基干，并配合其他各地的机械组成九经机械厂。

(2) 放纱收布厂：为了适应当时军需民用迫切需要布匹，于1941年夏在衡阳设置放纱收布厂，即放棉花出去收棉纱进来或放纱出去收棉布进来，每一加工阶段都给以合理的加工费。

(3) 麻袋制造厂：为了装运军粮和民间土特产的互相交流，当时急切需要麻袋，因此于1940年冬季在长沙设置麻袋制造厂。

(4) 制糖厂：在抗战时期，台湾、广东各产糖地区都被日寇封锁，食糖极为缺乏，于1941年夏和同年冬先后在江西南康和赣州两地分设制糖厂。

(5) 造船厂：在抗战时期水上交通工具极感困难，而湖南又系江湖纵横地区，为使湖南洞庭及湘资沅澧四河上游的土特产得以下运到人烟稠密地带供应人民需要，于1941年春季在湖南邵阳设置造船厂。在第一期即造成大木船一百余艘，运出物资颇多，能解决部分民食问题。

## 2、合办事业。

(1) 煤业运输社：抗战时期，交通运输极为困难，民用燃料至感缺乏。1941年夏与湘南矿物局合办煤业运销社，设总社于衡阳，并在株洲渌口、湘潭各地设立分社。

(2) 物资平价供销处：当抗战时期，一般奸商多有投机倒把，高抬物价，藉国难发财，1941年春会同湖南省政府贸易局在衡阳设置物资平价供销处，藉以抵制奸商，压低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3) 对敌物资抢购处：在抗战时期，敌伪经常侵入我沦陷区边缘，掠夺我粮棉等物资。1940年秋和1941年夏会同湖南江西两省政府，在长沙及赣北两地，合办湘北鄂西及赣北战区

物资抢购处。

(4) 开办煤矿及膏盐矿：在抗战时期，燃煤缺乏，产盐地区多被敌人封锁，为供应人民需要，于1941年间，先后会同湖南省政府开发醴陵、石门煤矿及湘潭膏盐矿。

(5) 发展手工染织业：抗战时期沿海和沿长江较大的手工染织业大都沦陷，民间日用必需品极感缺乏，1941年春会同江西省建设厅就其染织业原有基础，增资发展手工染织业。

3、除上述外，曾贷款给衡阳《大刚报》，开办衡阳造纸厂；贷款给湖南大学在邵阳开办小型冶炼厂，贷款给长沙民营航运业，修理轮船，以利军民交通运输，是为协办事业。

### 勾心斗角与营私舞弊

第九战区经济委员会，从1940年6月1日组织成立至1942年1月底结束，合计一年半的光景，行政院在它所颁布的战区经济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虽然明文规定，它是为了“发展战时经济，配合军事，与敌作长期抗战”。但是实际上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战区经济委员会的设置，只是为了摆出抗战的形式，由中央有关各部会及战区所在的地方政府中临时拼凑一些代表，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该经委会拼凑拢来的一些委员经常散在重庆及湘赣各地，力量不集中，各推荐一两人安排在会内较重要的地位，以便为自己通风报讯。例如副主任委员陈大榕推荐向大庭为专门委员，魏云千推荐谭某（名字忘记）为秘书，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委员会生产事业的设计、执行、考核等工作不仅不能充分发挥力量，而用人行事还须受到各方面的掣肘。

湘南矿物局始而要求同经济委员会合作设置煤业运输机构，经委会鉴于当时交通运输困难，民间燃料缺乏，设置煤业运输社可以压低煤价适应人民需要，而该矿物局因煤价定得稍

低不能达到他们以营利为目的的要求，因而又要求撤销合作。

经委会有对战区各地做交通运输管制的责任，故决议通知各机关单位应利用回空车辆运输国家物资，而执行机关根本不照决议执行，反而利用回头空车作为贩运私货和私带黄鱼的牟利工具。

江西省政府为了获得经委会的事业费，要求合办民生工厂，副主任委员魏云千便营私舞弊，借饱私囊，在沅陵设置棉花收购处大发其财。

以上事实说明该经委会不仅是有名无实的机构，而且内部还勾心斗角，营私舞弊。

### 撤 销 及 归 并

国民党行政院设置战区经济委员会时，提出“发展战时经济，配合军事与敌作长期抗战”的金字招牌以后，为时仅一年半，忽然奉令归并，改称战区经济作战处，隶属战区司令长官部而成为战区内部的一个处。

# 抗战时期的湖南民营工业

杨 锡 贵

## 一

抗战前，湖南的工业同内地其他省份一样极其落后。根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工厂登记统计，抗战前夕，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即有动力或工人三十名以上的工厂共有3935家，其中湖南仅有55家，约占1.39%；从产业结构上看，多为纺织工业，日用品化学工业和供照明用的电气工业。这些工业，当时在全国工业中无足轻重，对本省的影响也很微小。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湖南的政局不稳，统治者争权夺利，横征暴敛；另一方面是由于外货和沿海各省工业品倾销湖南市场，特别是外国商品的倾销，余籍传在《湖南工业状况及其改进》一文中说：

“湖南日用所需，触目多为舶来的机制品，即非来自重洋，亦为外人在我国投资厂所制造。”严重地限制了湖南工业的发展，民营工业多难以维持，如长沙宝华玻璃公司在1936年倒闭，湖南电灯公司也有不可终日之势，要求“让渡”。

## 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湖南是后方省份，沦陷区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银行内迁的第一站；在抗战中期（1938年11月至1944年4月），湖南虽然成了抗战的前沿省份，并进行过三次长沙会战和一次常德会战，

但由于湖南人民积极参加反侵略战争，日军被抑止在新墙河北岸，湖南大部分地方暂称稳定。在这期间，湖南也深感战争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但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形势，湖南民营工业一度得到畸形发展，具体表现为：

（一）民族工业厂家大量增加，发展迅速。

湖南民营工厂在1937年以前开工者总计74家，而抗战爆发后至湖南为日寇所陷之前（1944年4月以前），历年都有不少新开工的厂家，其中1939年开工的有85家，1940年开工的有79家，1941年开工的有88家，这几年每年开工的厂家都超过了1937年以前开工厂家的总和。

据国民党有关部门的统计，战时湖南民营工厂达870家，占国统区战时工厂总数的16.52%，仅少于重庆（1461家，占27.74%），超过四川（813家，占15.44%）及后方其它各省。

同时，湖南手工业也一度获得较大的发展，其中主要为染织和卷烟手工业。1943年长沙卷烟厂达56家，整个手工卷烟工人达万人以上，日产卷烟达40箱（每箱100条）；至于染织业，长沙一市即达176家，日产土布4.5万码。

（二）疏散地区民营工业崛起。

有些地区，由于较好的地理环境，加上优厚的资源，便成为战时疏散的要地，如辰溪、祁阳、衡阳等地。民营工业便在这些地方崛起。

辰溪地处湘西中枢，为通往川、黔、滇之通衢，公路四通八达，水运有沅江、辰水之便，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加以能源充足，煤质优良，成为接受内迁工厂的良好基础。民营工厂，如华中水泥厂，利生纱厂、宝华玻璃厂、制革厂等均先后迁来此地。加上官营的汉阳兵工厂与巩县兵工厂迁来辰溪（后合并改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和资源委员会的湘西电厂等，辰溪一时成为战时湖南的重要工业城镇之一。

1938年，支秉渊的新中机器厂由武汉经长沙再迁至祁阳。新中以拓荒者姿态从事开发工作，经四、五年的惨淡经营，发展成为一个采煤、炼钢、发电到制造机床、蒸汽机、发电机、轧钢机及至炭精工夹具的联合性企业，工人由2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而且还从祁阳及外地招收、培训了200多名学徒。随后，胡厥文的新民分厂也移来此处。还先后招来资源委员会的湘江电厂（即由新中接办的电厂）与湖南省营机械厂等，祁阳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城镇。

衡阳原是有点工业基础的城市，在抗战期发展成为国统区仅次于重庆、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据1934年出版的《中国实业志》记载，当时衡阳东西两岸共有工商业（包括工业、手工业，后者为主）91个行业2177户，总资金为251万余元，但近代工业不多。抗战爆发后，沿海沿江的大中小城市相继陷落，大量金融资本和工厂设备涌入衡阳，各地难民亦蜂涌而至，衡阳人口最高峰逾50万，促进了衡阳工商业的发展。1939年9月，粤汉、湘桂、浙赣铁路线相继通车，同时公路、航运亦颇发达，东联浙赣、西达川滇，衡阳成为西南各省交通枢纽和大后方物质集散中心，故有很多工厂内迁衡阳。当时衡阳设有内迁工厂联合会，初由上海内迁祁阳的新民机械厂厂长胡厥文负责，胡老去渝后，由周锦水负责联络。内迁厂的佼佼者，有周锦水的华成电器厂，谈家骏、吴士薰的立达工厂，叶佑阶的民生铁工厂，祝燮臣的机器厂，陈馥歆的新华搪瓷厂，董之英的金钱牌热水瓶厂，邵鸿舜的福泰铁工厂，石庆福的固华电机修理厂等等。此外，尚有长沙等地迁来的工厂数十家，如杨子霖的中州毛巾厂，童秉薰的裕华染布厂，童国忠的国泰锯木厂，江仁归的永生化工厂及一批大中型卷烟厂。城郊的白沙洲、黄茶岭、合江套等处烟囱林立，工厂遍布，机声隆隆，蔚为建国前衡阳工业的鼎盛时期。

另外，象常德、邵阳、沅陵、大庸、津市、芷江亦成为沿海工业内迁和当地新开工厂的集中地点，成为工商业旺盛的新兴城市，民营工业随之兴起。

### （三）机械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以衡阳为例，早在1939年至1940年间，衡阳就有民营机械工厂约50家，较大者28家。所产成品，种类繁多，有电动机、车床、刨床、钻床、纺织机、织袜机、印刷机以及各种筑铁工具、通讯器材等，畅销湘赣桂及西南大后方，华成所产电动机更是闻名全国。这一时期，湖南民营机械工厂就其规模和生产能力而言，也是相当可观的。如衡阳谭元琳的湘衡机械厂，1936年只有职工40余人，资金2万余银元，到1941年已发展成为拥有职工130余人，资金达35万元，设备比较齐全，规模比较宏大的有名的企业，年产压面机300多台，各种老虎钳250台，锅炉及配套泵年销量达10余套。由此可窥机器工业发展的一般概况。

## 三

以上事实说明，湖南为日寇完全沦陷前，战时湖南民营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一）沦陷区工厂大量内迁湖南，增强了湖南民营工业的实力。

为了免资敌用和支持长期抗战，沿海一带的爱国民族资本家发起了一场悲壮的工厂内迁运动，老化工专家湘阴范旭东曾几次到湖南株洲一带考察。1937年3月至1940年6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沿江沿海内迁到大后方的民营厂矿（闽浙两省不包括在内），共有452家，物资达12万吨，迁入湖南的即达12家，占总数的26.7%，仅次于四川（250家，55.3%）。其中迁湘南的有44家，物资4000余吨，迁湘西的有77家，物资6000

余吨。内迁湖南的厂矿以纺织（占该业内迁总数的51.5%）、机械（占27.6%）、电器（占24%）所占比重较大，其次为化学和矿业，它们都是湖南极为薄弱的部门，其内迁对湖南工业的发展，起了输血打气的作用。

伴随工厂内迁的还有大批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和熟练生产人员，自1938年至1940年先后来大后方的熟练工人达12164名，其中湖南占29%，只比四川少（占55%）。他们来湖南传播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对推动湖南工业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

湖南有水陆交通的便利，水路得长江、洞庭湖及湘、资、沅、澧四水之便，抗战初期公路修筑已达3000余公里，在全国居前茅，1938年9月，粤汉、浙赣、湘桂三大铁路相继通车，湖南已成为大后方交通最发达的省份。粮食和农产资源丰富，1938年湖南全省积谷达400万石，居全国第一，棉花、苧麻、烟草、桐油等的种植也有较大发展。加以湘西、湘南峻岭崇山，地形险要，日军难以达到，因而湖南成为抗战初期沿海工厂内迁的良好基地。

（二）战时军需民用的激增，为湖南民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最佳的销售市场。

战时由于军用品的急需，后方大多数工厂，无论是原有的、内迁的或新建的，都或多或少的、直接或间接的接受军需订货，承担军需生产。如内迁衡阳邵鸿舜的福泰铁工厂，就是由于粤汉、湘桂铁路的各种筑路工具和零配件的大批订货，业务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大批的军需订货是湖南民营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民用品工业，一方面由于战争和日寇对中国的封锁政策，舶来品和沿海工业品来源断绝；另一方面，由于沦陷区人口大量内迁，使湖南城市人口激增，抗战期间长沙人口最多时达51万，衡阳最多时达60万，津市达13万，辰溪达10余

万，因此，民用需要也随之激增，也是刺激湖南民营工业发展的一个原因。

（三）湘省当局在发展战时经济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1943年薛岳即将九战区1939年、1940年两年结余经费及省粮政局1940年结余经费1380万元，拨省建设厅和教育厅，用于发展生产和教育事业。为了招徕熟练工人（包括科技人员），在省建设厅设立产业工人登记处，各县设立分处，介绍工人至国营、省营和民营工厂工作。1941年湖南省政府在南岳设立农、工、商三专科学校，培养训练农工商专门人材。另外，还欢迎华侨来湘设厂，利用湘产，制造物品。

（四）爱国热情是战时湖南民营工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抛弃了以前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在大后方克服种种困难，因陋就简，使内迁的工厂迅速复工，并有所发展。产业工人在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情况下，任劳任怨，一心生产，因为他们都有着爱国之心，因而有救国之行。

（五）湖南官营工业对民族工业的压迫相对较小。

国民政府出于国防的需要，把官营工业的重点放在大后方的腹地，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其它临近战区的省份，官营工业比重相对缩小，如湖南，战时民营工厂为870家，资本占国统区总额的4.85%，工人占13.46%，而战时官营工厂只有65家，资本只占国统区总额的2.3%，工人只占2.55%，因而湖南民营工业受官营工业的压迫和排挤相对小些。

#### 四

湖南民营工业在抗战前期的畸形发展，后来由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占领湘中、湘南、湘西南铁路沿线地带，湖南的

民营工厂不是迁往黔川，就是毁于战火，但它对抗口贡献却是无可否认的。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1939年上半年工作进展报告称：“民营机械工业，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复工之厂……着重兵工器材之制造，目前承接此项工作者，每周可制手榴弹30万，迫击炮弹7万，各式炸弹引信7万，飞机炸弹6000余，机枪零件1000套，子弹机30部，大小圆锹30余万，大小十字镐20余万，鱼雷引信1000余个……质量均较去年大为增进，现仍设法扩充”，可见内迁之民营机械工厂，生产了相当可观的军需产品，支援了抗战。内迁湖南的民营机械工厂占全部内迁民营机械工厂的27.6%，湖南民营工厂提供的军工产品数目就可推想而知了。

关于消费品的生产，据当时的中小工厂联合会称：“以言织布业，我们动员了近6万台的铁木织机，织成了将近300万匹的大小布匹……军服民布的问题，是完全依靠中小织布厂解决的。”当然也依靠了湖南的中小织布厂。

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1944年3月在省行政会议上亦称：“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每年除供军棉7万担，军布300余万匹，军粮1000万石外，尚须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需求。”长沙市自1940至1944年财政部卷烟专卖局所征收的卷烟专卖税，居全国第一。

因此，战时湖南民营工业的发展在支援前线，安定后方，满足军需民用方面是它最主要的贡献。

战前，近代工业分布畸形，偏集于东南沿海地区。1937年全国合乎工厂法规定标准的3935家工厂中，分布于冀、鲁、苏、浙、闽、粤六省及天津、威海卫、青岛、上海四市者即达2998家，占总数的76%，内地工业很可怜。但是，随着西南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内地工业发展起来，1943年后方工厂已达5266家，其中民营工业厂家为4764家，占90.47%，可见其对改

变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的重大意义。湖南民营工业厂家占总额的16.52%，资本总额的8.65%，工人数的13.46%，仅次于四川（包括重庆），因此，湖南民营工业亦为内地工业布局的改变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战前湖南民营工厂只有55家，战时却达870家，不仅在湘中、湘东，而且遍布湘西、湘南偏远山区。工业门类也比较齐全，有机械、电器、五金、化学、纺织、服装、食品、印刷……湖南落后的工业面貌也因此改观。

## 奔袭永丰突破白崇禧的第一线防御

温 玉 成\*

1949年秋天，我军继横渡长江以后，接连解放了长沙、兰州、西宁等城市和广大地区。中央军委及时下达了“向华中南进军，围歼白崇禧集团”的作战命令。这个命令，使我们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老战士特别振奋。同志们深深感到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不仅解放华中南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当时，我任第四十一军副军长。我们军由北平（现北京）南下，横渡黄河、长江，于8月初进入湖南。由于气候炎热，长途行军，指战员体力普遍下降，病号猛增，造成大量的非战斗减员，马匹也大量死亡。部队到达长沙县金井地区后，开展以突击治疗病号为主要内容的兵强马壮活动。经过一个月的休整，部队体力加强，百分之八十的病员病愈归队，总结南方山地、水网稻田地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提高了干部的战术指挥能力，进行由下而上的评功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部队气象一新，战斗情绪很高，求战心切，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为解放全中国贡献自己的一切。

白崇禧集团在当时华中南地区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中，是一支建制、装备比较完整，具有南方山地、水网地带作战经验的部队。白崇禧是桂系军阀头目之一，素有“小诸葛”之称。

\*温玉成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建国后曾任副总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过去，他和我军作战，往往把非嫡系部队摆在第一线，而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后方，力求避免与我正面决战，以求保存实力。因此，在武汉、湘赣诸战役中，他的主力部队均未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后，白崇禧率领十一个军二十六个师，约20万人，被迫退踞以衡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资水，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阻止我军进军两广，并计划在衡阳、宝庆（现邵阳）间寻机向我出击。如防线被我突破，则撤至广西，继续负隅顽抗。白崇禧集团于9月中旬完成了下列部署：第四十六军（缺第一七四师）防守乐昌，第九十七军驻防郴州、汝城，第四十八军（缺第一七六师）守耒阳，第七军及第一七四师驻守衡阳，第五十八军防守衡山，第一二六军守备白果、东湖，第七十一军防守永丰（现双峰），第一七六师守新桥，第一兵团（黄杰兵团）及第十四军防守宝庆，第一〇三军防守怀化、花桥，第一〇〇军驻守芷江，第一二二军守大庸。

遵照中央军委9月9日关于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法，进军华中南，围歼白崇禧集团的指示，第四野战军决定以第十三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百色、南宁，实行断敌西退滇、黔的战略迂回任务，第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夺取广州，尔后第四兵团继续西进，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大的钳形包围，由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率领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九、第十八军，共26万人为中路军，首先在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牵制和歼灭白崇禧部部分主力，尔后尾敌进入广西，协同第四、第十三兵团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根据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与我主力一触即退的作战特点，要在湘南地区歼灭他的部分主力，当时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我第十二兵团主力部队怎样由湘江以东迅速而隐蔽地开进湘江以西战役集结地域，出敌不意发起突击。二是迅速切断敌人退路，关门打狗，分割围歼。肖劲光审时度势，在我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向芷江挺进，吸引白崇禧的注意力于西线作战时，组织第四十一、第四十五、第四十军分三路隐蔽地开进战役集结地域，要求10月1日前集结完毕。以第四十一军为右翼，伪装成地方支队，从长沙西渡湘江，经宁乡、如意亭进至娄底、杨家滩地区集结，尔后向界岭、黑田铺攻击前进；第四十五军为中路，利用第二野战军过境部队作掩护，由湘潭横渡湘江，进至洲乡地区集结，尔后直趋湘桂线，占领祁阳，切断敌向广西逃窜的退路；第四十军为左翼，则由攸县折向西北，从三门、淦田西渡湘江，进至花石、中路铺地区集结，尔后向新桥、小岭口攻击前进。原先就在湘乡的第四十九军对敌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保障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在湘江东侧的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在永乐江、洙水北岸实施佯攻，牵制敌人，并迅速占领耒阳，切断敌南逃退路。

我第四十一军接受参加衡（阳）宝（庆）战役任务后，于9月10日召开军党委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首长的有关作战指示，结合我们军的实际，研究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1）切实做好战役动员工作。通过动员教育，进一步克服怕苦怕累、幻想和平的思想情绪，牢固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心协力打响南征头一炮，歼灭白崇禧集团。（2）深入开展爱兵尊干活动。要求干部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政治上、生活上爱护战士，增强内部团结，提高战斗力。（3）及时评功记功，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并结合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访贫忆苦

教育、阶级气节教育，进行遵守政策纪律教育，增强部队的战斗意志和政策观念，团结新区人民，共同完成作战任务。

（4）行军中，各部队要派得力干部，组成渡江指挥组、设营队、收容队。设营队依据工作性质，分别组成设营指挥、粮秣筹备、卫生防疫、通讯联络等组，负责调查行军路线、划分防区、筹备粮草、架设电话、调查病情等工作。

9月15日，我第四十一军按预定计划，由金井出发，经长沙西渡湘江后，分两路向战役集结地域平行开进；我随第一二一师、第一五四师沿廖家铺、如意亭前进；第一二二师、第一二三师、军直沿宁乡、横市前进。沿途河川纵横，山峦重叠，崎岖小道，部队时而曲折地通过田畴，时而涉水渡河，时而蜿蜒地爬上山坡。因为连日阴雨，道路泥泞，上坡走得很吃力，下坡时常滑跌。由于途中组织工作得力，宣传鼓动工作灵活、多样，及时表彰好人好事，干部战士互助活动蔚然成风，部队精神抖擞，日夜兼程，向娄底挺进。一连几天的行军，部队有时食、宿也顾不上，十分疲劳。但长途跋涉的健儿，只有一个心愿，加快行军速度，抓住敌人，彻底歼灭。面对各种行军困苦，所向披靡，于9月30日按计划到达集结地域。10月1日前，兄弟部队也分别到达集结地域，并完成了攻击准备。

兵贵神速。我军到达战役集结地域后，白崇禧尚未发现我军的企图，其主力仍部署在湘东安仁、耒阳一带。正如被俘的敌第七军参谋长邓达芝所供称的，“我们开始认为，你们的主攻是在湘东安仁方面，并部署了夹击阵势，不料你们主攻方向却转到衡（阳）宝（庆）线。直到从狮子山所俘虏你们的几个士兵口供中，才知道你们主攻方向的转移，致使我们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当时，要歼灭湘南守敌，关键的问题是抓住敌人，分割包围，造成聚歼的条件。就地形而言，永丰是湘（潭）宝（庆）

公路的要点，白崇禧集团在衡阳、宝庆地区第一线防御的中心。白崇禧以第七十一军一个军的主力驻守永丰要地。我军进攻永丰，很有可能吸引敌人北援，造成聚歼守敌的战机。因此，奔袭永丰战斗，既是衡（阳）宝（庆）战役的前哨战，又是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的重要一着。9月30日，肖劲光部署了当前的作战任务：在主攻方向上，先集中主力奔袭永丰，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求吸引敌人增援，尔后视敌情变化机动作战。中路第四十五军奔袭永丰，尔后向演陂桥、小岭口攻击前进；右翼第四十一军先进攻青树坪、界岭，切断永丰、青树坪守敌的联系，尔后向黑田铺、宋家塘攻击前进；左翼第四十军先奔袭白果、新桥，切断永丰、新桥守敌的联系，尔后向渣江、赤水铺攻击前进。第四十九军（缺第一四七师）为预备队，紧随第四十五军跟进。第一四七师由安化，牵制敌第十四军，以保障右翼侧背的安全。在助攻方向上，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分别向衡山、安仁和耒阳进击，钳制敌人。各部于10月2日下午开始总攻。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消息传来，人人欣喜若狂。我们军当时即用电话、电报、骑兵等通信工具向部队传达，号召全体指战员用战斗的胜利作为向新中国诞生的献礼。

助攻方向。为迷惑敌人，我第四十六军第一三七师之第四一一团于1日在洙水北岸向敌进击，渡过洙水，续向敌第二二六师侧翼平田圩攻击。同日，第四十六军第一三六师向永乐江南岸攻击，守敌顽强抵抗，两军形成胶着对峙状态。3日，该师攻占羊际，歼敌第五十八军一部。

主攻方向。2日13时，我各路指战员不顾山峦纵横、滂沱大雨、道路泥泞等困难，个个如同猛虎下山，按原定部署，对敌展开猛烈攻击。17时，右翼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袭占杨柳

井，逼近青树坪。青树坪守敌向南逃窜，该师警卫营追歼逃敌时，在架工桥遭敌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一部伏击，营长李应仕带领全营指战员抢占架工山要点，顽强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敌军将我警卫营团团包围，并强行攻击。李应仕组织全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控制制高点，采取短兵相接的战法，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进攻。师主力赶到后，歼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余敌向南逃窜。23时，我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之第三六五团逼近十字路时，与敌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团遭遇。为掩护师主力向南插，第三六五团在炮火支援下，向十字路东北高地发起攻击，由于步炮协同密切，敌人阵地工事大部被毁，我步兵强行冲击，迅速全歼敌第二五九团第八连，占领该高地，保证师主力安全通过该地区。2日24时，左翼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占领贯塘，逼近新桥。2日17时，中路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三师之第三九九、第三九七团向永丰左侧迂回急进，第三九八团沿湘（潭）宝（庆）公路及其左侧山地从正面奔袭永丰。3日2时第三九九团占领月安桥。5时，第三九七团占领金田桥，第三九八团占领梓门桥，进逼永丰。防守永丰的敌第七十一军如惊弓之鸟，弃城而逃。肖劲光获悉这一情况后，即令第四十九军守备永丰，各路主力不受敌小部队阻击的迷惑，继续向南猛插，追歼逃敌。敌军退出永丰城后，城内和公路上，敌人抛弃的弹药、粮食、衣服，狼藉满地，报纸、公文随风飞散。但谁也没有理睬这些，指战员只有一个信念，敌人跑到那里，我们就追到那里，把他们消灭干净。

3日，根据肖劲光的指示，各路部队按原定作战目标，攻击前进，猛追逃敌。6时，中路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三师之第三九九、第三九七团由金田桥向丛山殿追击途中，与由永丰城向西南逃窜的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团遭遇。敌人依托山地，顽强抵抗，经两小时反复肉搏，敌人不支，夺路而逃。我第三九

九、第三九七团穷追不舍，歼俘敌450余人于黑田铺地区。11时，我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之第四〇四团在穿眼井设伏，歼俘由永丰城南逃的敌第八十八师200余人，缴获汽车5辆，并断了永（丰）宝（庆）公路。第四〇三团向新泽桥追击途中，又歼南逃的敌第八十八师200人。4日14时，我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之第四〇一团向洪乐庙追击中，与敌第七军第五一六团遭遇。第四〇一团抢占洪乐庙以北高地，与敌激战。第四〇二团闻枪声后，驰骋增援，当即抢占洪乐庙东北制高点，协同第四〇一团夹击敌军，激战三小时，歼敌一部。20时，第一三五师避开正面敌人，沿崎岖山路，直插衡（阳）宝（庆）公路，占领水东江，歼敌100余人，缴获汽车10辆。

3日9时，右翼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之第三六一团攻占狮子山，敌第一七六师组织反扑，战斗异常激烈，该阵地得而复失。后我第三六一团组织强攻，指战员英勇奋战，重新夺回狮子山，歼敌一部。接着，该团第三营攻击雪祖山，守敌顽抗。我占领制高点后，连续组织冲击，敌人溃退，第三营遂占领雪祖山阵地。后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该阵地反扑，我第三六一团在炮火支援下，将敌击退，歼敌一七六师500余人。18时，我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占领甘棠铺、南冲带后，以第三六六、第二六四团直插和公岭，迂回包围界岭守敌。敌发觉我企图后，即向长塘铺撤退。第三六六团第一营直插长塘铺西北的500高地，歼敌一部。4日，我第一二二师沿湘（潭）宝（庆）公路，续向朱家铺追击，19时，在金仙铺歼敌第八十八师一部。

3日6时，左翼第四十军第一一九师奔袭新桥，因敌主力南逃，仅歼敌第八十八师第二六四团一部。接着，该师向水口、醒狮、渣江追击，又歼逃敌一部。4日6时，第四十军第一二〇师攻击东湖，歼敌第三〇四师一个连，残敌败走盐田。

此时，白崇禧为挽回败局，急令第七军及第一七六师由黑田铺向界岭攻击前进；第四十六、第四十八军分别由乐昌、耒阳北调西渡、演陂桥；第九十七、第七十一军移至衡（阳）宝（庆）公路，企图对我实施反击。肖劲光根据第四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命令各军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主力原地待命，做好与敌决战的准备。5日拂晓，我各路部队占领界岭、渣江一线，与敌对峙。至此，永丰战斗胜利结束。此次战斗，不仅拉开了衡（阳）宝（庆）战役的序幕，牵制了敌人，获得了歼敌2000余人的战果，而且调动敌人主力于邵东地区，创造了在灵官殿歼灭白崇禧四个精锐师的有利条件，促进了湖南全省的解放。

# 交警教导一总队起义与组建 暂五师前后

张 先 正\*

在大革命时代，我父张振斌，表兄弟邹仁、邹清泉皆系中共党员，马日事变后，我父被陷害致死，表兄弟先后为革命壮烈牺牲。1931年重阳节，我被迫背井离乡到八十九师补充团李铎团长处任上尉军需，1934年李铎升旅长，我被保送考入北平军需学校特别学员班三期，学习一年，回八十九师二六五旅五三〇团任军需主任。

当时团部有一位青年学生，姓邓(忘记名字)，四川万县人，当军需上士，主管小厨房伙食，我俩因接触频繁，谈今论古，畅所欲言，久而久之，成为知心好友。邓告我：“在家乡读中学时已加入中共。”我也告知邓父亲和表兄弟等遭国民党杀害，自己被迫从军的情况，彼此心照不宣。邓再三规劝我说：“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你要千方百计搞带兵工作，不要长期当军佐。”当时我认为邓讲得很的道理。可惜邓于1942年在河南镇平县任汤恩伯部某团连长时，因策反一个团投共，邓和团长等三人均被杀害，铁的事实证明邓是一位兵运地下革命者。

1941年我在重庆任刘戡的九十三军驻渝办事处上校处长，因受家庭影响和不辜负邓君对我的殷切期望，朝思暮想坚决要

\* 张先正当时任国民党交警部队教导一总队少将总队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五师代师长。

带兵，遂向好友谢齐家（兵站总监）谈了我的决心，他立即带我去见别动军总司令周伟龙，周同意我的请求，拟伺机解决。恰好刘戡从山西奉召来渝，我便中向刘陈述了我要带兵的意图，刘说：“你要带兵，先得进军校受训。”因此辞去办事处处长让蔡定波代理，考入成都军校高教班九期，苦攻一年毕业，以获取了带兵资格。

1944年秋刘戡升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来电要我担任该部驻渝少将办事处处长，我未接受这次任命，遂将家小安排在成都友人皮宗敏家后，直奔陕西洛南总部当面向刘请求要带兵打仗，恰好一战区组建晋豫边区挺进军，以刘的旧部李谊谊任指挥官，保荐我任该部少将副指挥官，因早向刘说明，三十六集团军的正规部队，我无法立足，请安排在游杂部队，所请照准，于1944年12月发表任命。抗战胜利，偕结拜兄弟黄子华师长抵达卫辉县，并兼第五纵队司令，以卫辉、滑县、新乡等三县地方武装组成三个支队，归驻新乡王仲廉总司令指挥，后移防修武县大韩村，其中以新乡支队长刘吉岑，实力最雄厚，地方情况最熟悉，他捉来一批地下革命同志，关押在我司令部特务连，听候甄别处理，我未让部下审讯，而是经我个别谈话了解，统统予以释放。不久王仲廉命令我部到修武县大小高庄一带清乡，刘部又捉来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是我在刑场将他释放的，因此引起王总对我的怀疑，遂于1946年2月1日，特派四十九师师长李守正率部将五纵队全部包围缴械，我因老同事同乡谭嘉范旅长的关系，才免入狱法办。此时我只能回湖南入军官总队，挂少将衔候差。不久调中训团，相继入兵役研究班受训一个月，派充湖南湘西师管区少将副司令。三个月后，又发表我为国防部少将部员，派到蒋经国预干局候差，适周伟龙出任交通部交警总局局长，此时周有钱有枪，就是没有兵，乃派我到湖南接替喻勋衡的招兵任务，当时谁能招到兵谁就吃得

开。1948年4月下旬抵湘，我得到小同乡民政厅长刘公武、老友省务处处长谷炳奎的多方协助，很快招足八千多名三湘子弟兵，集中湘潭城乡，伺机举事。

为严防泄密作了周密部署，故召几位亲信中队长以上干部密商起义问题，我在会上宣布：“以湘潭两个中队的兵力，解除地方团警枪枝。”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妻弟聂先坤中队长为首自告奋勇，夺取接兵部队的枪枝。由于平江中队长罗建认为时机未成熟，拟从长计议而产生动摇。总结起来，主要是缺乏党的坚强领导，故严守秘密而作罢。于是将部队拨交接兵部队外，交警总局在罗建中队和湘潭两个中队的 基础上 又新成立了以邓季云为首的八总队。开到上饶，罗建中队等起义。邓季云被国民党杀害了。

同年8月我到南京向周伟龙述职，周仍要我回湘招兵。我说：“兵贩子不能再干。”但周认为我在湖南招兵很有办法，硬要下手令派为交警教导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但人事室查我非军统成员，迟迟不予发表。待周从外地视察归来，追问我为何未去湖南？我说：“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周立即批评了主管人事的干部“拖泥带水跟不上形势”，才被迫发表了我的任命。我当即保荐高教班同学严文瑞为上校大队长。同时周又任命邓震模为交警第二教导总队长。并与邓一道由京飞汉口转湘。10月1日在长沙邮局旧址，正式成立办公机构。先到省军管区交涉，开始不让我们在湘招兵，当即找大权在握的秘书长邓介松说明情况，求他大力支持：“我们两个总队长都是湖南人，只要颂公让我们在湘招兵，决以颂公马首是瞻。”果然解除了禁令，这是不公开的秘密。我们两个总队从湖南四十个县迅速地招足兵源，相继派邓部开到郴州看守库存美械。我部开赴衡阳茶市集训，并配发部份美械装备及一辆十轮大卡车。

为了扩充实力配合形势发展，1948年冬，通过我总队军法主任夏殖华把他堂兄夏步云（原益沅边区抗日自卫大队长）请到我家结拜为兄弟，宣誓决心起义。同时交警九总队毛羽芳大队长随带全大队美械装备（小同乡、军校同学）来湘招兵。我们过往甚密，对时局看法一致，于是同到城隍庙砍香结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同年3月中旬我从防地到长沙，据毛密报：

“醴陵车站，停有美械列车，行将运往台湾。”

1949年2月8日，周伟龙局长在上海国际饭店被捕，消息传到我的小同乡省参议员王凤山耳里，便告知了邓介松，邓立即交代王凤山，嘱我前去会晤。3月17日我迳往省政府会见邓秘书长，邓立即引我去见颂公，并下手令派我为湖南保安第四旅旅长，下辖三个团，嘱我物色三个得力的团长，还指示有关醴陵车站美械问题明天到绥署解决。翌日我按时到绥署杨继荣办公室等候颂公，程到后即指我对杨说：“有人要危害他。”杨默不作声。我知道杨是监视颂公的大特务，也不便说什么，只好告辞。回家后将颂公手令给毛羽芳看，并派为团长，在毛部提取了一部份美械装备，组成一个加强警卫排，以高兴胜为排长。

周伟龙被捕后，交警总局立即将我撤职，由于考虑到我这个部队是我一手招募组成的，故收回撤职成命，改派总局秘书长钟贡勋（高教班同学）飞湘。一方面做我的工作，要我与邓震模两个教导总队同时开往台湾，另一方面向我了解程潜的意图。我说：“颂公回湘后，以家长自居，有些事情不按中央的意图办，那是事实，至于说他同情中共，企图搞局部和平运动，那是绝对没有的事，不要庸人自扰，自撤藩篱。”致使钟无话可说。

1949年1月某日我由喻勋衡介绍与汤翰中认识，一至三月多次密谈，并经他介绍认识了中共湖南省、市联络站负责人

汤子声女同志，乃将我的叔姨姐夏钧（自治女校毕业）介绍与汤子声联系，进一步与省工委交通员汤健民同志、军事策反组组长王平同志取得联系，经过密商决定：部队借故拖延，不开往台湾。并在防地召集大队长严文瑞、中校总队附郭长沛和中队长夏先坤、严振世、刘杞荣、曹青云、徐玉龙等十八位中队长会议，一致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另请已卸任的交警衡阳办事处处长黄克虎亲自去郴州策反邓总队长与我一道同心协力扣留库存郴州的美械装备。黄到郴州去了，没有成功，乃派专人到茶市送信给我说：“合伙营业不可能，兄单独营业可也。”于是我由防地赶到长沙请示地下党员王平同志（后任郴州专署专员，死在任上，统战部干部处派员向我了解，我据实为王写过证明材料），经与汤菊中同志研究决定，我立刻带随身警卫部队去扣留军火列车。

同年3月19日我率领中队长黄威韩（后随我打游击，被敌人活捉挖眼砍足，壮烈牺牲，现已追认为革命烈士）、羊参谋（被交警特务暗杀）和卫士张河清、军械室主任傅海泉，加上警卫排排长高兴胜等一行人，火速地赶到醴陵车站，当晚派员摸清了军械车厢停车轨道。翌日拂晓，一举夺取了两个装满美式武器的车厢，勒令司机将列车返驶株洲，20日晚深夜抵达，由于大雨倾盆，洪水泛滥，桥梁冲毁，困在株洲。绥署得知情报后，即令第二处处长谭诤会同当地驻军于22日拂晓向我部猛攻，捣毁房舍多间，车站秩序大乱，铁路交通中断，迫使白崇禧改变死守武汉的计划，引军后退。造成武汉重镇真空，给河南张轸军长以起义机会。当时因寡不敌众，我们边打边退，死伤十余人。我仅带一兵脱险。一时全国报纸鼓噪（见1949年3月23日《中央日报》报道《张先正率部叛变》，《国民日报》报道《株洲一场混战》，解放区内也有相应的报道，这时宋美龄正在白宫请援派兵舰封锁长江，而白宫认为核心部

队都叛变，再援无益使宋美龄碰一鼻子灰。同时我家被抄洗一空，妻儿亡命他乡，将我家包车伙吊打，拷问妻儿何去，坚不吐实。又带行动军警到我内兄夏殖民（原是军统湖南站军法官）家，搜出我寄存的箱子，内有我名字的戒指，将住在我家外甥刘尖（考武汉大学未取正在补习）捉去，说他是共产党，扬言要杀他。于是夏殖民给谭讷的老婆送了四百银元，才挽救刘这条命。我化装潜往与我有联系的贺锄坤部，4月1日行至武冈竹篙塘被曾祥斌部截获，押解陈明仁兵团，随即上解长沙绥署，脚镣手拷入狱，请人给颂公写信，才解除了镣铐。

我入狱后，中队长曹青云除送一枝汤姆逊给湘乡人军法官外，并通过宋希濂的大哥宋仁楚告诉军法官：“张先正的问题你要尽力保护。”曹与仇鳌是小同乡，因请仇向颂公说情，乞求释放，仇转告颂公的意见说：“张先正在狱中还安全些，如在外面特务一定要刺杀他。”所以我6月1日被开释后，不敢住在家里，而是住在程潜主席的警卫团卫兵连夏伐夷排长处（军校二十一期毕业，我妻侄儿）。藏身此处后，即秘密开展活动，头一次涂子声通知我与涂西畴见面，谈了联络符号，他为黎明旭我为白金典。其次谈了交警四总队长李穰和黄毅夫之事，均系我小同乡，于是涂指示我策反交警四总队，这样我宴请了李黄二人，并请守南京唐生智的运输司令周鳌山作陪，我与黄私下谈了李穰起义的问题，但黄欲与地下负责同志见面。二次是向涂请示见面的问题，涂面有难色，我以身家性命担保，涂始允让我第二天带见。三次是带黄去见涂，涂黄谈话很长，我在外面放哨，见何际元参谋曹博来，我与曹闲扯，不让曹入内室，以免打扰涂黄的谈话，已到中午还不见黄出来，我乃入内室，将黄引出，我问黄怎样？黄答：“老资格。”于是李部即向零陵地区转移。起义公开后，少将监军曹铁身，副总队长夏晨阳二人，指使政训室主任刘英，煽动中队

长严振世部开往台湾，严中队长立即向大队长严文瑞汇报，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刘英活埋了。马上率部登山打游击，曹夏等派人将刘英尸体挖出，拍照上报，蒋介石阅后，怒杀了总局长周伟龙。尔后严文瑞代总队长所部由地下党派刘人奎去接收，刘为司令员，严文瑞副之，所以涂要我去，掌握这个部队，但涂要我先去信征求刘的意见，往返费时，我在长沙深怕特务刺杀，恰好毛羽芳会同何际元、汤菊中派人来接，我就商请程元团长，派妻侄夏伐夷排长，率领一排人枪，护送我到碑头市何际元部联络站站长周正彪（后被敌人杀害，现已追认为烈士）家住一晚，翌日破雨抵部的当晚，即遭敌人袭击，我们立即转移，敌人扑了空。一次从宁乡煤矿出发，长途行军，刚宿营，据报后面敌人大部队追来，我们立即上山。夜间我们派出一小部队去扰敌，而敌军却对我隘口猛攻，我们马上从后山撤离，翌早刚出发，突发遭遇战，因汤菊中年岁较大，行动迟缓，我命警卫队死力抵抗，才得脱险。这时我只是个副司令员，并介绍王凤山、徐玉龙为高级参谋。他俩并没有随部队行动，只是拿了高参的任命，回到长沙迎解。

三一四师在宁乡县组成，没收了何际元弟弟的枪枝，并将其弟杀害，我去何部时，还为何的弟弟举行了追悼会。不久3130组织负责人化名维贞，派人给三一四师送一密信，通过我防地将送信人捉获，在其竹筒内搜出此信，随即将送信人释放了。但我们并未与三一四师联系，随即白崇禧派广西部队，消灭三一四师，我们绕道敌后，长沙河西有一个保安中队在当地催粮，我们命令部队，向其猛攻，缴获敌人枪枝三十余，随即释放俘虏，马上转移了阵地。回到烧汤河停下歇脚，这时党组织派汤健民、郭仁诚二同志来我部视察并指导工作。以前党组织给我的指示，是由地下交通员夏钧藏在月经带下，安全送给我的。碑头市联络站我去过二次，后派人使查知道碑头

市大部队开走了。我们去联络站了解情况，实际上大部队开走后，留下少数侦查人员潜伏未动，所以尔后敌军复来，把站长周正彪杀害了。时值三一四师被白崇禧部包围打散，黄威韩、曾庆吾带溃散的一个排，尚有轻机枪一挺，步枪20余枝，参加了我们游击队，并派黄威韩为毛羽芳支队的团长，曾庆吾为副团长（只知道曾是望城县人，与黄庆吾一道壮烈牺牲，已恢复为起义人员）。另一名四川人排长，说他爱人生活成问题，于是毛要我给家里写了一张条子，让她住在我家里生活，直至湖南和平解放为止，临走时还给她一定的川资。这个部队随毛羽芳支队渡湖转战华容，到我老家吃了一餐饭，解放后我家兄对我说：“这样多的人一下拥来开餐，颇不简单。”带点怨气。我说：“为革命毁家纾难，何止我一家呢？”毛率部去华容后，经汤子声同志介绍3130组织负责人，任命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第四军暂五师代师长。我率部转战益阳八字哨后，调整部队，发表人事命令，即委派夏步云为十一旅旅长，郭长沛为副师长（原任交警中校总队附，在他家乡麻阳组建部队），同时策反驻防沅江的张青年（葛伯赞的亲戚）委派为十二旅旅长，他部下有一个团团长甘镜溪，在沅江就地整编，张调益阳军政干校学习（后被镇压已平反），李穰为十三旅旅长（根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申字（1988）第24号判决：“被告黄毅夫于1949年6月上旬受中共湖南地下党人黎明旭委托，秘密策动湖南交警四总队李穰部起义”），夏识时为四十二团团长，夏晃为该团政工室主任，毛羽芳为四十三团团长（他的部队在华容整编），周柏林为四十四团团长，彭近飞为副团长，夏先坤（原是交警安乡中队长，打入一〇三军独立团任营长，其人枪并入夏识时团）调任师部人事科长，原长春起义的团长姚凤翔为参谋长，文觉为参谋处处长，原湘衡支队第四总队副总队长龚桂林为师部参谋，夏权森为副官处处长，营级干事为曾广荣，

警卫队队长为王名希，军械室主任为傅海泉，排级管理员为张作君（原沅江中队分队附）。湖南局势由于程陈两将军的策划，获得和平解放，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战祸。我回到长沙与肖劲光兵团联系，原高教班同学小同乡陈行中送我卡宾枪、马牌手枪各一枝，他入革大学习，向党交代了与孙立人的亲密关系，所以党派陈去台做孙的工作，孙迄仍在软禁中，陈可能被杀害。我部在中共统一整编下，始于1949年10月15日分区就地整编，干部入益阳军政干校学习，我调益阳专署任参议。

## 记父亲的忘年之交翦伯赞

章 琼\*

翦伯赞是我父亲覃振的好朋友，他们都是湖南桃源县人，翦比我父亲小十多岁，可谓忘年之交。当我还在孩提时代，就经常听母亲念叨父亲与翦的交往和友谊，至今在我脑海中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

翦伯赞，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维吾尔族人，1898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农村。他的远祖本姓哈，世居新疆塔里木盆地。十四世纪明王朝兴起时，哈氏后裔八士从朱元璋部将征伐，平伏西南少数民族的反抗，因“翦除寇盗”有功，被赐姓为翦，封镇南定国将军。后来他的子孙承袭官爵，随军南迁，世代定居桃源县。他祖父是个农民，家道已经中落，父奎午勤学苦读，县试中秀才，长于数学，毕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这对翦伯赞青少年时期的学习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他在常德商专毕业后，回到常德教了四年书，于1924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经济学。他怀着救国济世的抱负出国深造，到美国后，有机会直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开阔了眼界。不久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对他以后所走的道路，有着重大的启发作用。当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在这里我看见了光明，看见了真理，看见了人类的希望。”这时期中国正兴起革命风暴，翦

\* 章琼系覃振之女。翦伯赞与覃振同乡，并任过他的秘书。

伯赞再也不能安于留美生活，于1925年冬毅然回国。1926年春由上海到北京谋求职业，他参加了北京3月18日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主权，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的群众示威游行，险些在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中丧命。血的教训使他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醒悟过来，转寄希望于南方的革命运动。是年冬天他回到湖南，这时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政府成立，经同乡董维键的介绍到武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特派员身份奉命北上，利用在北京时期结识的进步人士关系在晋绥策动山西阎锡山响应北伐。“四·一二”事变后，阎锡山令商震逮捕翦伯赞，翦被迫亡命上海，又辗转奔波于京、津之间，他在这段极不安定的流亡生活中，仍设法购买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从事理论研究。大革命失败后，翦从1930年起参加了吕振羽、谭丕模、杨刚等在北京创办的青年出版社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活动。

1933年，翦伯赞移住南京，此时我父亲覃振正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并兼领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父亲特邀翦任秘书，主要为父亲处理私人函件。1934年5月翦以秘书的名义随我父亲赴意、德、法、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考察。在这段日子里，他对我父亲有了进一步认识 and 了解，认为我父亲不仅是资历颇深的老同盟会员，而且为人富于正义感，故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董维键共同研究决定争取我父亲转向进步。1935年，他们从欧洲访问回国后，就从事历史研究。经过一段曲折道路，翦伯赞终于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并接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于1938年5月由吕振羽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中共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他仍利用为父亲作秘书工作的身份，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进步活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与王昆仑、侯外庐

主编《中苏文化月刊》，自己住在该会在乡间的藏书处歇马场，利用该处藏书进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中国史纲》的撰写。每天晚上在桐油灯下写作到深夜，他以惊人的毅力，写出了史纲第一、二卷，分别于1943年、1948年出版。这部著作出版后，受到进步史学界的高度评价。郭沫若在得知《中国史纲》脱稿的消息后致书翦伯赞说：“这断然是1942年的一件大事，为兄贺，亦为同仁贺。”在这时期他还发表六十多篇论文，如《桃花扇底看南朝》《杜甫研究》《论甲午中日之战》《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世界的大转变——从法西斯的反动到新民主主义时代》，论古论今，深刻揭露批评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腐朽及其搞分裂、倒退，对敌妥协投降的阴谋。他在党的领导下，顶住了一切压力，坚持斗争，宣传我党坚持团结、进步抗战方针政策，1944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全线溃退，而对爱国军民，则横加迫害打击，翦伯赞写诗以抒愤。

喋血常桃血未干，又传胡马渡衡山。  
焚书到处纵秦火，杀敌何人出汉关。  
南渡君臣怜晋定，北征豪杰遍幽燕。  
莫倚巫巴能阻险，从来王业不偏安。

当时这首诗在重庆是无法公开发表的，但在进步文化界人士中竟相传抄，广为流传。

翦积极从事统战工作，从1940年起又受周恩来的安排，为冯玉祥将军讲授中国历史课，在他们相处一年的时间中，翦伯赞的精辟讲学使冯玉祥衷心敬佩，他认为中国如果有更多象华罗庚、翦伯赞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民族的科学和文化就能够大大发展，国家才有希望。冯玉祥富于爱国正义感，追求进步，老而弥笃的求知精神也使翦伯赞深为感佩，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当1948年9月冯玉祥将军由美国回国，途经黑海

不幸罹难时，翦伯赞沉痛地悼念说：“这是中国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

再说我父亲覃振因与翦伯赞等人的长期交往接触，思想上确实逐步倾向了中共和人民一边，他不顾个人安危，以一个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争取民主、团结、进步的斗争中，积极发挥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父亲扶病亲赴机场迎接，并积极参加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各界人士欢迎毛泽东的盛大宴会。毛泽东会后由周总理陪同来到小会议室特地看望了参加会议的覃振、冯玉祥、谭平山三位老朋友，并亲切和他们交谈，共叙大革命时代的旧情，父亲握着毛主席的双手，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会后，父亲两次在家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翦伯赞作为我父亲的好朋友也应邀陪同。翦伯赞就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随后覃振宴请共产党领袖的消息传开了，此举轰动了重庆国民党阵营，在整个山城也引起很大反响。

翦伯赞还同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建立了亲密友谊，经常参加他们争取团结抗战和民主宪政的活动。1946年5月接受党的指示，同张志让、周谷城等参与领导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活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

1947年，党安排他由上海转往香港，在南方局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民主运动，与茅盾、侯外庐、千家驹等分别主编《文汇报》的文艺、史地、新思潮、经济等副刊，同祖国大陆上正激烈开展的解放战争相配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为摧毁旧世界、解放全中国而战斗。因他没有社会职业，继续靠著作所得稿费同夫人戴淑范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每天写作到深夜，由于营养不良，长期劳累，使他患上了贫血症。建国后，他在

回忆那段的生活情况时，风趣地说：“我在那时的生活比起佃农来，还不能说苦，因为我在最苦的时候，也没有吃过树皮和野草。”

全国解放后，他曾两次来华东地区高校作学术报告，都要抽时间来上海看望父亲和我们，问寒问暖，关心备至，在政治上帮助我们认真对待家庭问题。1954年，肃反运动开始，我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由于父亲的历史和海外关系，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我立即写信将情况告诉了他，没想到几天后他在处理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之余，亲笔给我回了一封长信，他以精辟的语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一个历史人物作了客观历史的论述和评价，从而使组织上弄清了我的社会关系和家庭情况。在“文革”期间，这封信再一次帮助我渡过了审查难关。从此我丢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北大历史系主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他在参加繁重的社会活动同时，依然以主要精力从事高等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

1955年到1956年间，他曾三次出国，两次以团长身份参加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在史学领域里辛勤劳动近四十年，写出近五百万字的著作，对史学领域中的左倾思潮，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批判，因而遭到陈伯达、戚本禹等一伙人的陷害，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制造一个所谓史学界的“保皇党”罪案，在红旗杂志1967年9月刊上戚本禹发表文章《翦伯赞是反共老手》，其“事实”根据就是三十年代初做过覃振的秘书，随覃出国游历等

等。从此，覃振的“臭名”就随翦伯赞的受屈而远扬国内外，企图一棍子把翦伯赞打死。

但是，翦伯赞是一个不受“黄金与权势所诱惑”，不受暴力所屈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面对陈伯达一伙的卑鄙攻击，他坚持党的原则，严正表示“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并抗议说：“整吴晗同志将使所有进步学者寒心。”他据理驳斥姚文元对吴晗的诬蔑，充分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长期革命道路上铸成的崇高品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机采取残酷手段对他施加凌辱、迫害，将他和夫人从居住了二十年的燕东园赶出，关押在街坊上一间小黑屋内，进行审讯，无休止地批斗，拳打脚踢，百般折磨，那时翦伯赞已年近七旬，长期患有肺气肿病，不给医治，把他推上了绝路。196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示要解放翦伯赞，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翦伯赞夫妇才迁回校园。就在这时，专案组却以继续调查刘少奇同志1936年“阴谋”为名，连续多次闯入翦家，对他大搞逼、供、讯，以逮捕、坐牢相威胁。最后，逼得翦伯赞夫妇于是年12月双双含恨离开了人间。

## 记著名历史地理家文焕然

文潭生 文泉生 文榕生 文仓生\*

1986年12月12日临晨3时45分，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地理所研究员，我们敬爱的父亲——文焕然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68岁。噩耗传出，学术界为失去一位一贯认真负责，工作踏实，严肃朴实，成绩卓著的勤奋耕耘者而感到万分惋惜，我们更为失去自己的慈父与良师感到无比悲痛。父亲的逝世是我国科技界无可挽回的一大损失，我们在悲痛之余，谨根据组织上所作的悼词，有关的书信、文章，父亲与我们朝夕相处，父亲的亲朋友好们回忆等材料，简略地回顾父亲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试图从中探索他的治学实践，治学经验，治学方法，这对继续父亲未竟事业，对尽快培养和造就科学技术人才，促进和繁荣我国的科技事业或许有些裨益。

### 投身大地 矢志不移

父亲别名端喜，字慕尧，1919年10月9日（农历8月16）诞生在湖南益阳县城对河的一个古庙里。

父亲幼年时代，家境贫寒，祖父教书，祖母种菜养猪赖以糊口。我们祖上是从湘乡移居到益阳的。曾曾祖父是给人家看守竹山的雇农，曾祖父做正当店员，在父亲出世前就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而离开了人世，不久曾祖母又亡，家中债台高

• 作者均系文焕然子女。

筑。祖父的兄弟们分家时，没有遗产可继承，却要分担长辈留下的债务。祖父是长兄，分得的债务也最多。由于家庭经济贫困，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家庭成员都能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三叔祖父文化欧是手工业工人。四叔祖父文士桢更是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二十年代中就参加了共产党，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祖父文士员、外祖父田士清都曾与毛泽东同窗，都是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的学生，他们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仍同毛泽东、徐特立等有往来。老一辈现都已病逝。祖父最初教小学，后来边教书，边学习，念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即今武汉大学前身），成为湖南省著名的中学地理教师兼武昌亚新地学社编辑。建国后，祖父在省文史馆工作，并主持《湖南省志·地理志》的编辑工作，他的学生中不乏周立波（现代作家）、陈述彭（中科院学部委员、遥感、地图学家）、左大康（中科院地理所所长，研究员）等著名的文学、科技、教育界人士。

自幼的贫困生活，使父亲始终保持着简朴生活的本色，同贫苦善良的劳动人民长期接触，培养了他为人诚恳，正直的品格；与贫穷的搏斗中，锻炼了他能在逆境中不动摇，奋发向上的精神；从小受家庭的耳濡目染，使他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业上也朝着这一目标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更加坚定了为祖国的历史地理作贡献的决心。

1939年，父亲在著名的湖南蓝田长郡中学（当时任校长的是著名教育家王季范先生，他对祖父很器重，常到祖父家，对父亲也很关心。李立三、任弼时、李富春、郭亮、陈赓、欧阳钦、曾山等都是该校学生）高中部毕业后，为投名师，千里迢迢考取了竺可桢教授任校长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修完大学课程，父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史地大师谭其骧教授初期的研究生。

1946年，父亲研究生一毕业，即被破格聘为副教授。

《国立海疆学校史略》记载道：“梁龙光校长又从各地延聘了一批较知名的教授来校担任教职，如黄寿祺、包树棠、杨山光、徐君藩、梁天詠、严永晃、文焕然、刘独峰、庄为玘等。”从此，父亲先后正式在福建晋江国立海疆学校（大专，今泉州师专前身）、福州大学和福建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执教15个春秋。

1962年，正当全国普遍进行城市人口压缩精简的时候，父亲在历史气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得到竺可桢副院长等人的重视，在他们的关怀下，父亲携全家迁往北京，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转为副研究员，与孙承烈先生同为历史地理组仅有的高级研究人员，并被聘为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开始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不久即有成果付梓。

早在中学生时代，父亲即有时代替祖父去讲地理课，此后他在外求学期间，屡次在外兼课，这既减轻了家庭的生活负担，又对学业有所促进，更锻炼了他讲课的水平。当年的老学生对此还记忆犹新，他们以崇敬的心情向我们讲述听我父亲所授课程的得益。父亲从浙大研究生毕业时，江西省立农学院、（湖南）国立师范学院、西北大学、国立海疆学院等院校竞相聘他去讲授气象学、地理学等课程，并非偶然。若从代课时计算，父亲在地理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奋斗了近半个世纪。

### 不倦教诲 诚恳待人

涉入地理学界，父亲即是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园丁。记得在孩时，夜晚，每当我们一觉醒来，总见灯还亮着，父亲仍在伏案工作，认真备课，批改作业，编写讲义。他像春蚕把桑叶化作蚕丝那样，自己不断地吸收新知识，然后将经过理解消

化的见解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一起介绍给学生，让他们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他既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也不是貌似公允地将各种观点罗列出来却不敢谈己见，更不是照本宣科。他的讲义年年讲，却年年要修改，增加新内容，新动态，删除繁琐的、过时的部分。对于学习、研究的方法，他向来重视，并贯穿于讲课之中。无论外出考察，参加学术讨论会，多么繁忙而劳累，他仍然要挤出时间认真备课，他从不无准备地仓促上讲台应付学生。他说如果那样做了，自己心里会不安的。

当年的学生回忆：“每年一度的野外实习，他（指父亲）不辞劳苦地带领我们同学翻山越岭，他那肥胖而笨重的身子曾不止一次地征服过龙腰山（福建长乐最高山之一）和踩上鼓山的顶峰。举起了望远镜，顺着他指向远方的手，我们认识了福州盆地的全貌，了解了闽江的习性，在那火热无情的太阳之下，使他变成了‘非洲的黑人’。跌倒了被同学们扶起来，爬不动了休息一下再爬，当我们看到他那双手被太阳晒得起泡的时候（他穿短袖的衣服），每一个同学都感动得眼眶里充满着热泪。只有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才懂得，每时每刻，一举一动都可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他就是这样和我们在野外一道，咽下了不生不熟、不冷不热的饭菜，渡过了漫长而不平凡的日子。”

一位地理学教授说：“文老师治学严谨，工作勤勤恳恳，在我做学生时他就是学生们尊敬的一位老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父亲的工作态度确是无可指责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灌注在教学与科研事业上，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调材料上将他写得一无是处，但却不得不写上他“能完成交给的工作”。

别人请父亲审看的文章，他总是不惮其烦地认真评点修改，连标点错误都不放过。加注上自己的意见供人家参考。他

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但从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虽然他的结论是严肃的，观点却是用大量的数据、资料为基础的。对子女们的意见，他往往也是以商谈的口气提出。

父亲对由他参加审评的科研成果、科学基金等，无论申请对象是著名学者，还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或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都一视同仁。他总是抱着对国家，对科学事业，对申请人负责的态度认真考虑，精心测算，签注自己的详细意见，尽快地送出。

我们信中的错别字、不当的用词、病句等，父亲复信时都要一一指出，这使我们的文字功夫得到了提高。我们幼年时，父亲送给我们最多的礼物不是玩具，而是书刊和学习用品。闲暇空隙，父亲利用散步的机会教我们辨认植物，察看天气，讲述物候学、气候变化等科学知识，培养我们善于观察、思考、认识事物的能力；茶余饭后，他往往讲述一些历史掌故，地理知识，诗文词赋等，使我们在娱乐中获得知识，在帮助父亲工作中，他更是悉心加以指导。恢复高考后，父亲以内疚之心（“文化大革命”中子女们受株连被迫四散远方，被夺去上学深造的权利，这哪里是他的责任），挤出时间为我们抄录过辅导材料，使我们得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在既无课本，又缺课多年，时间紧张的困难条件下，凭以往的基础，父亲的指导，取得较好成绩，迈进大学校门。父亲的良苦用心，我们怎能报答得了？

其实父亲待人一贯忠实厚道，为人诚恳，谦虚谨慎，与他有过交往的人是深有感受的。

父亲早年的学生现在不少都是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高级人材，成为国家的栋梁，我们不必一一列举姓名，用他们的成功来增加父亲的光彩。父亲对自己的辛劳有所收获感到欣慰，他们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今天依然如故。请看他们的由衷之

言：“文教授是我们最热爱的教师，与他相聚三年，留给我们深刻而鲜明的印象：他是积极的、耐心的、负责的、和蔼的。”

“文老师，我尊敬的文老师，我有今天的日子，时刻都感谢您过去对我的教育，只要一想到当年在福州的黄金时代，您对我们学生是多么爱护啊！”

一位业余时间也不虚度，勇于探索，初涉人口问题研究领域的年轻人，经人介绍，带着自己厚厚的处女作登门求访。父亲热情地接待他，逐字看过他的文章后，肯定了年轻人的一些创见（尽管当时还只是一些苗头），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对文章认真评点，还对该文论点的阐述，论据的选择，段落的设置等加以指导。最后，对他进一步研究的选题也提出建议，使他深受鼓舞，继续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一位在六十年代曾报考过父亲研究生的有为青年，仅因家庭的历史问题牵连而落榜。父亲虽多方奔走终无力回天，深感惋惜。但他对这个青年抱着很大的希望，鼓励他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动摇，献身科学事业的人是不怕挫折的，只有不懈的奋斗，才有可能成功。这个青年对此刻骨铭心，继续发奋努力，粉碎“四人帮”后，他再次考取了研究生。由于他的出类拔萃，现已成为某著名学府的学术带头人。

一位园林技术员在与父亲协作中感受颇深，他谈道：“这篇文章（父亲与他的协作文）本是文先生研究亦有文在先，而又发现我的一篇拙作后而提议合作的，当时我就觉得不敢当，后来见文先生十分坦诚热心，就将当时收集的一些资料卡片和实地调查结果一并送交先生，以后经几次反复写成文稿。”他认为：自己在与父亲的协作中学到了许多知识，更学习到严谨的治学态度，确实得益匪浅。

当一位博士研究生的数万字毕业论文送请父亲审评时，他已沉痾在身，仍强支持着戴上极高度近视镜，并借助高倍放大

镜认真阅读，最后实在力不从心，才请人代读看完全文。由于父亲对该课题深有研究，又曾亲自调查过，情况熟悉，经过认真思考，父亲谈了自己的体会，并认为再加以修改充实，将是一本有价值的专著。我们笔录下他口授的详细意见后，他用颤抖不已的手签下了“文焕然”三字以示负责，不料这竟是他留下的最后字迹。

在父亲负责历史地理组工作时，所领导曾准备将一位当时成绩不显著的同志调离地理所，是父亲看到他的才华，理解他当时的实际困难，多次耐心向领导解释，才使他得以留下。如今，这位同志已是较著名的高级研究人员，而这段往事可能他本人至今还不知晓。

一位曾与父亲协作过的老教授感慨地说：“饮水思源，我的点滴成绩与兄的长期帮助是分不开的。”

父亲重视科研成果，认为这是大家劳动的结晶，社会的财富，它将促进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而对名誉并不去斤斤计较。但对做了工作的协作者，甚至提供过资料的人，他从不埋没人家的劳动。有时为了照顾协作者的实际困难，有些文章让人家署名，有的自己则屈居于第二位或第三位。一位名教授曾谦虚地说：“……可是我并未参与劳动，却把贱名列入，非常惭愧，可否在正式发表时删去贱名，以名实际。”然而父亲认为他还是出了一份力，坚持在文章上署上他的名。父亲为别人代查资料，将自己掌握的资料无私地提供给他人，更是习以为常。

父亲的文章要反复推敲才投稿，而为了节省时间，给我们几个在外地子女回信往往是复写而成，以致我们看信时曾被别人误认为在看什么材料。他工作上的信件，认为有一定份值的，有时也采用复写留底，这样的信曾引起过个别收信人的误解。现在父亲去世了，我们在清理他的资料时才理解到他是为

后继人工作方便而准备的，别无他意。

对“四人帮”横行时犯过错误，后来认识到并有所改正的人，父亲虽然曾深受过其害，还是不计旧恶以诚相待，使他们深受感动。

许多这类事，父亲做了却从未向我们吐露过，我们辗转了解，才略知一、二。但别人给予他的关心帮助，哪怕点滴，他却常挂在嘴边。

对自己早年的导师——谭其骧教授，父亲更是没齿不忘。自他踏上科研大门，谭老即精心指导，师生间四十余年的交往淡如水，却情谊极深。我们从记事起即知道“谭先生”。父亲多次向我们说：“我在科研上的每个成绩，几乎都灌注了谭教授的心血。”

### 来自中华 献身中华

父亲是我们这块古老而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他并无时下一些人常常可以炫耀的留洋经历，对此他没有丝毫的自卑之感。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曾领先于世，但是近代落后了，国外确有不少先进的技术、经验，留学不无必要，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就是片面的认识，妄自尊大与夜郎自大的作法都不应取。作为龙的传人，他是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父亲长期从事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教学科研工作，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的山川河流牢牢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国外的科研动态，采用的新方法，研究中国的有关论著，他都非常注重，但他认为研究历史自然地理，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文明史，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匹敌的。

仅《四库全书》中的地理纪书就有517部8446卷，这还不包括纪外部分的有关地理的内容。此外，还有地方志8500种，10万卷以上。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丰富的资料在中国，不是中国人应该出去，而是外国人应该来中国，否则正是本末倒置。

在历史地理这块沃土上耕耘，不需花费巨额钱财，只要勤奋，肯下功夫，就会有收获。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是前人的经验总结，我们正是借助于此进行深入研究的。中国的许多史地研究成果，往往是世界瞩目的，已故的我国气象学、地理学界老前辈竺可桢教授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曾引起轰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得到举世赞誉，父亲的一些论著也在国外引起反响。

父亲认为研究中国历史自然地理，首先应立足于中国，从历史文献中广泛搜集资料，辅以野外考察，结合孢粉分析，C<sup>14</sup>断代法，考古、文物等研究方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比较、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若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设备，成效将会更为显著，为此他曾积极主张引进计算机技术，派人进修操作计算机。

在动乱的年代，父亲自然难逃厄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多次被当作批斗重点，有人据理为父亲鸣不平竟被迫害致死，别有用心的还借机专打他的头部（是想让他失去思维能力吧？）。据初步统计，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论文、著作稿丢失二十余篇，断送了他从事科研的黄金时光，他在精神上与肉体上遭受的摧残更是笔墨难书。

父亲自幼的家境贫寒，大革命浪潮的熏陶，叔父参加革命工作的教育、影响，自己亲身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等，使他从一个不愿意涉及政治，一心搞学问的文人，逐渐转变为民主战士，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可喜的成果。“文化大革命”中批斗他时，我们曾亲自听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有缺点，有错误，但从没有反党！我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正是争取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身！”当时却遭到嘲弄和训斥，自然又成一“罪状”。后来我们虽未听父亲谈起这方面的事，但他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一直抱病拼搏，认识他的人谁人不知晓？他是重行动而轻言辞的人。

### 不畏艰险 敢于登攀

父亲在攀登科学高峰上是无所畏惧的勇士，他不断解剖自己，时时总结自己的不足与教训，并常将这些告诉我们引以为戒。而对治学经验与成果很不愿多谈，他认为有些共性的东西，人所共晓，无需重复；有些自己摸索出的，总觉得不成熟，需要完善，生怕贻误后学；况他晚年身体更为衰弱，为完成一些国家重点科研课题而拼搏，未等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离开我们而去，不能不令人遗憾。从他生前与我们的交谈接触，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以及一些老专家的回忆、总结，我们认为父亲在治学方面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研究方向明确。父亲自幼受祖父的影响对地理学即有兴趣；从大学选择专业到接受谭其骧教授的亲自指导，他就明确树立了终生以中国历史地理为研究方向。建国以后，看到自己的教学科研对祖国的发展、建设起到一些作用，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的选择。他的一生也就是围绕着中国历史地理进行深入研究的，并取得成果。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还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得到发展。”

（学部委员侯仁之教授语）在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发展趋势下，一方面，“知识骤增”造成了隔行如隔山

的局面；另一方面，学科和专业的交叉、渗透、转移，使得许多边缘科学和横断科学异军突起，生机勃勃。一些新学科是很难用传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框架来划定，历史地理即是这样。从事历史地理研究需要有多种学科的丰富知识，难度较大，目前我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数不多，而父亲却知难而进，矢志不移。

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研究历史地理并非泛泛论古，他在科研工作中能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与国家的建设需要结合起来，注重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从他完成的《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分布及利用改良》、《历史时期河南博爱竹林的分布和变化初探》、《我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食管癌记载初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历史时期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历史时期“三北”防护林地区森林的变迁》、《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封丘县旱涝史》等著作，都可以看出他是将自己的学术专长与生产实践，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结合起来的。

（二）重视资料积累。资料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基础，没有广泛、深积、坚实的资料，难以达到认识完美的顶峰。父亲在搜集资料时做到方面全面重大不遗漏，要最原始而准确的所谓第一手材料，并且持之以恒，逐步扩大选题，待资料充分再着手研究。他曾感慨地说过：“手中有资料，心里不着慌。”“文革”中断了他从事的研究课题，他不得不从事自己所不熟悉的工作，但他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可能有用的资料。在一些人忙于文争武斗之时，他的业务水平又有所提高，资料更加充实。当科学的春天重新来到时，父亲的各种类型文章大量出现，如烂漫的报春花。

父亲的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他循着目录学，文献检索的途径，从古代文献中搜集资料；按照文史相通，文学作品中包含有对自然描写的原理，从纪实性文学作品中查找有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的生动描述；由考古发掘，历史文物发现的成果中找寻实证；通过现代科学的新方法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从现存的遗迹中推测、发现历史上的旧貌……

父亲常说：搞历史地理的人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他自己读过的书岂止万卷，行过的路岂止万里？首都的各大图书馆，上海、南京、杭州、湖北、湖南、兰州、广州、福州等地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都遍布他的足迹。中午闭馆时，父亲常常是面包、开水当午餐，台阶、屋檐、树荫是他的休息场所（后来感动得一些图书馆员为他安排午休的地方，请他到内部食堂就餐）。他查找有关的图书资料甚至比一般的图书馆员还熟练，可惜他未来得及将此总结成文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看书报、期刊随时摘录所需的资料是他的嗜好，笔、纸条、卡片、剪刀他不离身。自订的报刊时有他动过刀剪的痕迹，面借阅的书刊他倍加爱护，连折页都舍不得，总是用纸条做记号，再一一抄写（晚年，普及了复印机才减轻了他大段抄写之苦）。每次除了在图书馆查阅不能外借的书籍外，携带的大包小包里都是他借回的书。图书馆有上下班，他却夜以继日工作，没有节假日之分。长期的站立讲课，带领学生爬山涉水野外实习，挤车跑图书馆，使父亲两腿静脉曲张严重，看书、睡觉都不得不垫高双腿，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要迈开自己的双脚去进行实地考察。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海南的天涯海角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踏过祖国的多少山川，涉过多少江河湖泊，真是屈指难数。

浩如烟海的书籍使得父亲的知识不断由约而博，又由博而约；大好的河山使他的眼界不断开阔，他研究课题也由比较狭

小的一个主题扩展到较为宏大的多个主题，不断创新，不断深入，另辟蹊径。

（三）不断汲取新知识。研究地理学需要广博而专深的多学科知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尤其是这样。

父亲早年从师受业于著名学者竺可桢、谭其骧、黄秉维、卢鉴、任美锷、叶良辅等教授，后来还时常求教于他们。随着他对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环境变迁的深入研究，更深深地感到进行这样涉及面极为广泛的研究工作，不仅需要专深的历史、古汉语、文物考古、甲骨文、金文、人口、政治、经济、文献检索、目录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知识，而且需要广泛的水文、气象、气候、物候、动物、植物、生态、生理、孢粉分析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唯物史观、辩证法指导科研。只有这样，才能如鱼得水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气候、植被、动植物分布情况和生态变迁情况，从而把地质时代的自然地理情况和现在的情况衔接起来，研究地球发展规律，人类活动的影响，预测未来，为现代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父亲的学生时代，由于当时还比较注重沿革地理与考据、考证，因而他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的学科基础打得较扎实，但有些学科知识却比较薄弱。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广泛的交叉、渗透、转移，新学科的出现，原有的知识远远不够，有些学科还需从头学起。面对重重困难，我们父亲——这个有志于为祖国史地科学作出贡献的人没有退缩，他不会就学，不懂就问。几十年来，他边干边学，以极大的毅力先后学习了文物考古、植物、森林、生态、生理、动物、古生物，孢粉分析、C<sup>14</sup>断代法等方面的知识。

起初，一些著名学者，如：竺可桢、马世骏、吴中伦、侯学煜、徐仁、周明镇、贾兰坡、夏鼐、胡厚宣等教授都曾在学

术上给过父亲有益的指导，到后来，在有些学术问题上他们就能够彼此合作了。

在向内行请教中，父亲常常不远数十里登门求教，写专函请教，即使是素昧平生的人也常常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然而他也碰到过个别除非搞协作不答问询的人，为了科学事业，父亲作过这样的让步——同意他以协作名义署名。

（四）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历史地理学界，父亲以作风严谨，资料工作踏实为同行所称道。

父亲一向重视资料的长期积累，敢于逐渐掌握兼跨多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从古今中外的学海中“沙里淘金”。有时为了查找一条资料，就要翻阅几种或几十种书籍，需要几天甚至几十天时间。他积累的资料，仅历史气候方面的卡片就有三万张以上，动植物变迁的资料远不止此。同时，他还抓紧各种机会观察各地环境特色，并通过调查访问，验证补充文献资料。他一心扑在科研上，祖国的山山水水尽在他心中，他最后完成历史动物图时，由于双目失明，只好凭口授，由别人代笔而成，不仅精确异常，而且非常详细。

父亲一贯以个人钻研为主，辅以广泛请教和短暂协作。在巨量资料的基础上，他总是先搞资料汇编或长编，接着经过缜密考证，提高为变迁年表，再浓缩为图表，建立动物变迁等序列，使文献资料数量化，通过定量定性分析，不断提出有力据的新观点。他的文章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付出多少辛劳才水到渠成地产生。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父亲正是这样，没有自己的新观点、新看法，他不成文；引用的资料没有核对过原文，他不采用；文章没有经过字斟句酌反复考虑，他不投稿，惜墨如金。有时他已躺下，突然对某一问题有了“灵感”，便翻身起床，奋笔疾书。因而他的文章虽然不多，却很 有 份

量。

他的文章完稿以后往往要放置一段时间，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他有一部分历史气候专著稿，已故著名历史气候学家徐近之教授看过曾评价道：“（指该文）参考文献之多，可以说古今皆备，辑写过程中洽谈磋商的人士至三十余人，可谓虚怀若谷了……如此广博的文章，不是容易概括出来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该稿曾多次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讨论，历十余年，多次修改，他还觉得不成熟。

有篇约稿，几经修改、重写，已交付印。这时父亲收到一位并非权威人士提的意见，认为文中将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写得落后了。这种情况本是历史事实，连该文的合作者都认为这条意见是片面的，不必考虑。父亲却认为所提的意见确实偏颇，但不无考虑的余地。于是他又追回原稿，再次修改才交出。

父亲呕心沥血四十余年，撰写了专著、论文、专题报告、资料汇编、年表等百余份，但由于他从谭其骧教授那里继承的严谨学风，不轻易投稿，以及在政治动乱中造成的丢失，不便公开等原因，这些论著并没有尽数发表。但从他已发表的论著看，不仅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较高的评价，显露出他的学术造诣之深。

（五）注意野外调查。研究历史地理一般偏于室内阅读，较多忽略野外工作，而父亲则不然。他认为在室内查阅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从中可以借助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解当时的情况，将它们系统化是一条捷径，然而这只是资料的一个来源。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前人的认识难免存在局部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方面，如果通过辗转查证其他文献也有可能搞清真象，但通过野外调查往往可以解决更多疑难问题。野外实地调查，可以更直观地通过现存的遗迹了解和推断历史上的旧

貌，印证文献的记载，补充文献中不够全面的部分，查明文献中的谬误根源……这些都是在室内难以得到的收获，也是另一个一手资料的来源。

父亲在研究中国野生亚洲象变迁时，对史料中所提到的“福建武平象洞”有不少疑惑之处，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而释疑的。这样的“洞”根本不是岩洞，明代洪武《临汀志》所称：“紫紆怀（环）抱之地”，既指四周高而中间低的山窝窝，还兼指马蹄形山窝窝，而象洞的地形即属后者。它们是未开发时或开发初期对“村落”的通称，取其“乐土”（洞天福地，洞府里）之意。又如：明代万州（今海南省万宁县）举人王世亨歌：“……撒盐飞絮随风度，纷纷着树应无数。严威寒透黑貂裘，霎时白遍东山路……”这一纪实性文学作品中的“东山”的地貌，高度究竟如何？经过实地考察，才知它并非山地丘陵，而只是该县治东海滨的一级阶地，海拔略超过200米，可视为平地。这是我国近八千年来平地积雪纬度最低之地，而地处中热带的万州出现飞雪，证明当时气候的极端寒冷，实属罕见。再如：1955年1月的寒潮是建国3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当时父亲尚在福州。寒潮侵袭后，他即到寒潮首冲的福州西北郊一带观察访问，见龙眼树迎风面的枝叶受了冻害，荔枝却安然无恙，事后据气象台同志称当时地面极端最低温度为 $-4^{\circ}\text{C}$ 。据此，父亲可以胸有成竹地认为：公元1111年1月31日至2月4日在福州、莆田、泉州一带十多个县遭大风、降雪、低温等，“荔枝木皆冻死”，“经一、二年，始于旧根复生”等记载看，当时温度应在 $-10^{\circ}\text{C}$ 以下，使遭寒害荔枝“又数年始复繁茂”。

为此，他在研究某一地区的环境变迁时，总要亲自到那里调查访问。为了研究“三北”防护林的历史状况，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亲自到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林区考察；为了攻

变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他到过黄淮海平原的盐碱涝洼处，写出有关治理盐碱旱涝及南竹北移的专文；两广南部，海南的一些穷乡僻壤，灾害严重地区，他都专程前往了解情况，实地观察。

调查之前，他总要做好充分准备，拟定询问项目，所要去的部门，要看的地方等。到达该地后，找人详谈，随做笔记，请他们提供材料，实地认真观察，返回后再进行分析研究。这样，他写的论文自当符合实际。

（六）突出重点，综合研究。历史地理是介于古代地理与现代地理之间，是研究原始农业兴起（距今约一万年左右）以来地球表面环境变迁及人类活动对于地球表面环境变迁的影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近三随四千年，以往的历史地理研究多局限于晚近的这一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地理的研究也突破了传统的模式。父亲的研究情况正是这样。

父亲中后期的文章多采用考古、文物、孢粉分析， $C^{14}$ 断代法等涌现出的新成果，使历史地理研究不仅仅以文字记载为依据，在时间上也更上溯到地质时代的全新世，使古地理与历史地理更加紧密地衔接起来。探讨问题也多从自然的、人文的角度，即通过事物本身，环境的影响，人类活动的影响等多方面综合作用，这样唯物的、辩证的、系统的观点来正确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

父亲对近八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的研究，就是学习参考了国内外不同观点的气候学家名作，汲取有关学科的新成果，在自己旧作的基础上，采取以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分析为主，结合考古、文物、气候、物候、孢粉分析、 $C^{14}$ 断代法、甲骨文、古生物、现代动植物等方面的有关资料（查阅中外文献万种以上），并辅以相当多的地区调查访问；

从历史时期动植物的分布变迁，对近八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的大势进行研究；同时以北半球的亚、欧、北美洲一些具有代表性国家的历史气候变迁为对照写成的。其中既包含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又从多种角度说明问题；既有中国气候变迁的纵向变化，又有世界一些代表性国家同期气候的横向比较；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突出说明气候冷暖变化这一举世关注的一个疑难问题。

从他的一系列历史时期中国动物变迁、植物变迁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特点：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事物本来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人们为了便于研究，将它们分解开了，以便集中精力逐个突破难关；但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永久割裂开”，以致遗忘了它们相互作用。

（七）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多头展开，相互促进。

从父亲的论作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是逐渐深入的，研究的范围由较小的某一地区逐渐扩展到较大的地区；由较小的一个主题逐渐扩大到较大的主题。在四十年代，他即有竹类、盐碱土、气候等方面的专论问世；六十年代，他又有这些方面的文章付梓；八十年代，他还有气候专论出现。他的气候论述从较简单的《从季风现象揣测古代河域之气候》（1948年），到《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1959年），再到《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1987年）就比较深入了；《近八千年中国气候冷暖变迁》的研究，在时间的延续上，在涉及的地域上，都超出一般的研究。

他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多专题展开，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环境变迁时，从气候的冷暖、旱涝，植被的竹类、森林，珍稀动物的亚洲象、马来鳄、孔雀、长臂猿、犀牛、扬子鳄、大熊猫、鸕鹚、猕猴、猩猩、野马、

野驴、野骆驼到盐碱土等先后展开了这些专题的研究工作。有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东鳞西爪没有重点，他却不同意这种看法。

基于自然界万物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统一状态。试看，气候的冷暖难道不是通过降水、旱涝情况，植被的盛衰，野生动物的迁移，盐碱土范围的缩小或扩大等反映出来吗？野生动物的进退难道与气候的冷暖、旱涝变化、植被分布改变没有关系吗？亚洲象与犀牛，野马、野驴与野骆驼的分布变迁难道没有存在着由北向南的迁移，或由东部、南部向西北内陆缩小的共同点与各种类间变迁的特点吗？

围绕一个较大的主题，在搜集资料时可以统筹兼顾，某一方面的资料先积累得较多，就可以先行研究；待另一方面的条件成熟，可再做考虑。这样，从各个较小的专题研究入手，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它们的共同规律与各自的特点，为研究较大的主题打下基础，达到殊途同归。在研究其他专题时，由于资料的继续积累，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以往的研究成果的认识也将深化，起到促进作用。

他对野生亚洲象的研究是1979年初见成果的，此后他继续展开多种动植物变迁、气候变迁的研究，而这些工作促进了他对野象变迁的再认识，近十年后，他所作的再探野象变迁文章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大的提高。

（八）尊重名家，独立见解。对于权威，父亲认为是由于他们的勤奋努力，有独特的创新，高瞻远瞩，自然形成的。父亲对他们始终怀着敬意，对他们给予过的帮助、教诲铭记在心。但是他认为，在科学问题上丝毫不能含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人的认识是不会永远滞留于某一水平上，权威所作的定论并非皆为永恒真理；对遇到的问题要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做出判断，切不可迷信，不可赶时髦，更不可随风倒。

在研究气候变迁问题上，曾有两种权威们的看法：一种是以蒙文通、胡厚宣教授为代表的“干寒说”，另一种则是以竺可桢、吕炯教授为代表的“脉动说”。父亲既没有根据哪方面的影响更大而站在哪一边，也没有简单地附和哪一方，而是经过自己的不懈研究，别开生面。“文焕然根据大量古代文献资料，研究汉代黄河中下游气候情况，证明黄河中下游的降水，古今虽有差别，但差异不大，既与日趋干寒说不同，也与脉动说有别。”（李长傅、彭芳草《略论历史时期气候研究的观点与方法问题》）竺可桢教授在1961年指出：“到近代这一问题（指历史时期气候变迁）虽曾有人研究过，但发表的文章是寥寥可数的。三十年前，现在四川大学执教的蒙文通教授曾经在《史学杂志》和《禹贡半月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试图证明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如现代长江流域。同时，现在北京考古研究所的胡厚宣教授用殷墟的材料作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企图证明安阳在三千年以前的气候要比现在为温和。最近福州师范学院文焕然教授著的《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一书，从他搜集的事实来证明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并无与今不同之处。只要知道气候变动的规律是作波浪的起伏，在地质时代如此，在历史时代也是如此，那么秦汉时代黄河流域气候与今相似，而殷周时代却比现在为温和，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且与上述欧洲的气候变动相比，也是大致符合的。”（《竺可桢文集》416—417页）父亲虽与竺老、胡老等在气候变迁上的观点大相径庭，并各执己见（父亲还曾为此遭致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们的交往却很密切，相互切磋，共同探讨，只为真理，不含杂念，成为忘年之交，真是难能可贵。

（九）另辟蹊径。父亲早期的科研工作除了气候、土壤、动物、植物之外，还进行了一些沿革、交通、河道、人口等方

面的研究。也就是先继承师业，随着科研方向的明确，研究工作的深入，逐步发展，自成独特的体系，在中国历史生物地理——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和中国历史植物地理方面领先一步。他着重研究了近八千年来中国动物、植物分布变迁的特点及其原因，并不断深入，侧重探讨了动植物环境（包括自然的与社会的）及人类三者相互联系。这有别于当今世界其他研究者一般限于地质时代，或只搞近、现代，或局限于有文字记载以来，时间较短；又有别于分析原因比较单纯的情况。

父亲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无先例可缘，研究涉及的学科多，时间绵亘数千年，地域往往是较大范围，确实难以独立进行全部的科研工作。实际上这正是现代化科学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表现。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除了许多人的无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杨振宁也深有体会：“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与别人的合作与交值，只是自己埋头钻研，视野不开阔，在科学研究上就难免有局限性，容易发生偏差。”在知识骤增，更新加快的今天，只有靠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因而靠协作成果获诺贝尔奖也呈上升趋势。父亲以己为主，辅以向有关人请教或值期协作本无可非议，与一些权威人士的某些观点不同本是正常现象，然而，长期以来持偏见的人的责难、讥讽之声时而有之。父亲对此置若罔闻，长期的冷遇没有动摇他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他认为：个人的学术造诣深浅，水平高低，学术界自有公论，时间将是最好的见证，无需将自己的精力耗费在虚名上面，他坚定地走自己认准的道路，锲而不舍。“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敢于攀登不畏险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的教导是他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李时珍、徐霞客、伽利略、琴纳、拉马克、孟德尔等中外杰出大师的境遇更是他常引以自勉的，当他们生前做出巨大贡献时，人们并没有立刻意识到，等人们认

识到他的作为时，他们却早已离开了人世。谭其骧、吴中伦、侯仁之、胡厚宣等教授的一贯支持、鼓励，也给父亲以力量。父亲得以宽慰的是：在他生前就已看到人们对他所从事的工作逐渐有所认识，看到它的重要性。侯仁之教授明确指出：“文焕然先生在部门历史自然地理学方面，是开辟我国历史植物地理和历史动物地理专题研究新领域的先驱。”学术界对于父亲的工作是予以肯定的。

### 开拓进取 独辟蹊径

父亲生前发表了百多万字的论著，这些是结合国家的生产、建设需要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完成的多项科研成果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领导机关的重视与好评，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的声誉。

父亲在中国历史地理这一领域中进行了多种课题的研究，所出的成果限于篇幅及我们的学识浅薄，能力不足，难以一一评述，仅做粗略的分类，简介如下：

（一）历史动物地理。我国的陆地面积才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5%，而我国的野生动物资源却十分丰富，仅陆栖脊椎动物就有2091种，占世界种类总数的10%；鸟类1186种，约占世界鸟类总数13.5%；兽类420多种，占世界总数的20%。现今的珍稀动物在历史时期并非珍稀，不仅数量远较今天多，分布地区也十分广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过去生存的动物，目前有些已灭绝，有些濒危，有些虽仍存在，但分布地区、种群数量都已大大缩小、减少。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珍稀动物，研究它们的分布、演变及其原因，对于探讨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及“人与生物圈”的关系等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后合理利用野生动物，保护珍稀以及保持生态平衡都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中国野生犀牛的灭绝》、《近五千年来豫、鄂、湘、川间的大熊猫》等一系列动物变迁的文章探讨了历史时期我国野生亚洲象、犀牛、野马、野驴、野骆驼、长臂猿、猕猴、金丝猴、大熊猫、孔雀、鹦鹉、扬子鳄、马来鳄等珍稀动物的变迁情况，从初步的综合来贯穿古今（上溯到全新世、更新世，历几千年直到现在）研究全国性的动物变迁，明确了许多问题。

通过对野生亚洲象（野象）的分布变迁研究，提出我国野象变迁的趋势主要是分布北界的南移，而不是过去人们多主张的野象南迁。野象分布的北界七千多年前在河北省阳原县（北纬 $40^{\circ}$ 多，与北京市相当），逐步南移到今云南省西南的盈江县（北纬 $24^{\circ}$ 多）以南，其变迁幅度约达16个纬度，这是历史时期我国野生动物分布变迁较大的一个。野象分布北界并非直线式地南移，从野象七千多年的变迁过程看，可以分为7个阶段，其中至少有3次野象北返现象，这与中国近八千年来气候冷暖变迁的大势相吻合。

初步探明了我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由河南安阳殷墟一带逐渐南移，到二十世纪初，在云南西双版纳最后灭绝；野犀分布北界的南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冬季温度逐渐降低的变化，野犀遇到气候的突然变化，尤其是寒潮骤然降临时容易招致死亡；春秋末期，特别是战国初期以后，黄河中下游一带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山林日益垦辟为农田城镇，使野犀动物生存地丧失，逐渐趋于灭绝。解决了过去人们对中国野犀的这些情况不清楚，有些外国专家为此专程来华访问也收获甚微的疑案。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它现在仅残存于四川盆地

西北缘山地及其相邻的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的部分地区。但在更新世中、晚期，熊猫曾经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并且向北延伸到陕西、山西和北京周口店一带。更新世以后，大熊猫无论在分布范围上，或个体数量上，都大大地缩小或减少了；而近五千年来，大熊猫在鄂、湘、川三省边境的一些山地并没有消失，且一直保存到十九世纪初，甚至二十世纪。保存的地点不是仅限于一、二个县内，而是六、七个县内都有。这些事实雄辩地证明，历史时期大熊猫在江南地区并没有灭绝，二十世纪初才逐渐消失。打破了过去认为大熊猫除现在分布地外，其他地区早已灭绝的论断。自清代中叶以后，由于人口急增，山地森林，竹林不断被开发，逐渐打破了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生态平衡，使得不少珍稀动物，尤其是高度特化的大熊猫逐渐灭绝，可见人类活动的影响是这些地区历史时期大熊猫灭绝的主要因素。

中国鸚鵡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同期我国森林的变迁。历史时期中国鸚鵡的分布有很大变化，在清代道光以前，黄土高原西部兰州、六盘山、陇山一带的鸚鵡，久已灭绝。长江流域从滇东北、黔西北、成都附近到安徽南部、浙江东部的鸚鵡，在清中叶以后已绝迹。华南、滇南的鸚鵡，在分布范围和数量上也有很大的缩小和减少。清代是我国北方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期，在时间上正好与鸚鵡分布地区的南移和范围的逐渐缩小相吻合，说明森林的变迁与鸚鵡活动地区的盈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鸚鵡是森林鸟类，常常栖息在树上，一旦森林遭到破坏，它们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有两篇动物变迁的论文曾作为中国地理学会参加国际地理大会的50篇送审专论，当时曾参加选拔论文，后来任地理所所长的左大康教授亲自转告说：评委们认为这是两篇较好的论文。美国著名的殷商学专家吉德炜教授看过论文后，赞不绝

口。

（二）历史植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主要研究历史时期的植被等分布变迁情况，而植被又主要是指森林，也包括草原在内。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与动物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森林也是影响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亲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植被、森林、竹林等展开的。

对于历史时期的植被，他指出：约在七、八千年前，我国的天然植被从东南向西北，大致是森林、草原及荒漠三个地带，森林和草原占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仅森林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森林地带从北到南可分为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华北的暖温带林、华中与西南的亚热带林以及华南与滇南的热带林这样五个区域；草原地带主要包括北部的温带草原与青藏高原的草甸和草原两种类型；荒漠地带处于西部内陆。通过长白山地、太行山中段、华北平原中南部、江南的宁绍一带、豫鄂川陕交界处、湘江中下游、两广的高廉雷琼一带、黄河中游等地区的植被分布变迁，表明历史时期我国各地的天然植被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变迁的总趋势是天然植被逐步被栽培植被所替代，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几经兴衰，使我国逐渐由一个多林的国家变成了少林的国家，到建国初期，森林面积只有11.5亿亩，森林覆盖率仅为8.6%。

“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防护林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生物工程项目，为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父亲受林业部、国务院环保办（国家环保局前身）等部门的委托，深入研究了历史时期“三北”防护林地区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情况，对于“绿色万里长城”的建设规划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父亲先后完成了《历史时期“三北”防护林地区的森

林》以及新疆、青海、宁夏、内蒙等省区历史时期的森林分布变迁的多种专论。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不仅论述了这些地区森林的分布，变化过程，而且明确指出：近七、八千年来，我国由多林变少林，造成这种古今巨大变化，是与中国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变化紧密相连的。由于长期以来的战争，林火、滥垦、滥伐、滥牧等破坏了森林、灌丛等植被，引起生态性灾难（当然，也有由于自然条件造成的），贻害至今。这种变迁不是直线式地减少，而是经过多次反复的。最终造成这些地区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四料”（燃料、肥料、饲料、木料）俱缺，农牧业生产低而不稳。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值得认真吸取的。

历史上宁夏森林广布（如今是全国有名的少林省区之一），不仅在宁南森林草原地带，森林同草原镶嵌布列覆盖着广大土地，而且在宁北干旱草原、半荒草原地带的山地，也有大面积天然森林分布；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然森林分布的下限，以及多数低山区与多处大平坦沙荒地都曾经有过大而积灌丛存在，这些灌丛在宁夏生态系统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在恢复天然植被和发展人工植被中，要注意研究历史所揭示的植被演替规律，不仅要注意乔木的栽植，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的地方，要首先注重灌木的栽植，有的地方甚至要重视发展草被。

竹林在我国有重要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华北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经济栽培与野生竹林分布。父亲对竹林变迁的研究集中于华北地区，并逐步深入，他的首篇正式发表的论文即是《北方之竹》。他对历史时期华北、华北西部、河南博爱（华北最大的竹林所在）及北京（竹林分布的较北地区）的竹林变迁进行了认真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通过研究历史时期我国北方竹林分布北界的变迁，指出博爱是黄河以北即华北最大的竹林，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对于历史时期北方竹林北界南

退，明代中叶以后，黄河以北无经济栽培竹林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提出了斑竹是华北优良乡土竹种等，对“南竹北移”及发展北方乡土竹种等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这些都受到著名竹类学家熊文愈教授，学部委员、林学家吴中伦教授等的肯定和赞赏。

1981年父亲受国务院环保办委托，承担历史时期海南森林变迁科研项目。他不顾重病在身，曾亲赴海南岛实地考察。回京后，他夜以继日地分析、总结、研究，不久便提交了研究报告，得到好评。在这期间，父亲同时搜集了大量有关海南气候、生态、动植物等资料，做了进一步研究海南的计划。

父亲的有些历史植物地理文章被国外知名学者全译成外文，并在外刊上发表。

中国林学会会长吴中伦教授谈道：“我于50年代初认识文焕然同志，并经常交换有关古气候和历史时期森林的变迁问题的看法。文焕然同志根据他严谨深入的研究结果，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这些文章对研究我国古气候、森林的变迁都有重要科学意义和参考价值。”《历史时期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一书，得到吴老好评，并被吴老主持的《中国森林》编委会选定为编写该书的样本之一。

《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变迁》一文的油印稿被学部委员吴征镒教授大量采用、改写，作为他主编的《中国植被》专著的一部分。该书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历史气候。气候变化主要表现为冷暖与旱涝，它的正常与否极大地影响着地球上的生物与人类。气候变化史远早于生命的出现，而人类对气候的认真研究只是近代才开始的，搞清气候变化规律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对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众说纷纭。父亲是四十年代着手于这方面的研究。

父亲所作的《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被誉为是“解放后我国第一部历史气候专著”。书中确立了不同于“干寒说”，也有别于“脉动说”的新观点，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本书对许多学科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著名学者竺可桢、李长傅、彭芳卓、邹逸麟教授等都曾公开对它进行过引用、评论、肯定；黄委会更是作为重要参考书，不时利用它；国外有人对该书做过专门介绍。这部专著是他在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的力作，也饱含着父亲对我们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黄河的无比深厚情感。

《距今约8000—2500年前长江、黄河中下游气候冷暖变迁初探》一文，是父亲将动物变迁、植物变迁、气候变迁进行综合分析，互相印证，毕生研究的成果。文中指出：“中国近八千年来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的总趋势大致包括以下四个阶段：

(1) 距今约8000——2500年前为温暖时代；(2) 距今约2500年前——公元1050年为相对温暖时代；(3) 约公元1050——1450年为相对寒冷时代；(4) 约公元1450年——现在为寒冷时代。同时指出，中国近八千年来的具体气候是冷暖相间，有如波状起伏变化，并且既非直线式地下降，亦非一般的波动，而是阶段式地转冷。”这就是他对八千年来中国气候冷暖变迁的最终观点——阶段式转冷。

《封丘县旱涝史》、《邯郸地区近百年来旱涝情况初探》等文探讨的这些地区的旱涝规律，邯郸地区近百年旱多于涝，而且在一年中先旱后涝的年份多于单旱及单涝年；大旱以十年左右出现一次为多，大涝亦多为十年左右出现一次。对于影响旱涝的因素也作了分析，认为是由于气候、地貌、水系及水文等自然因素与政治、经济、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及水利失修等社会因素，这些都可能加重旱涝灾害。

(四) 历史土壤地理。父亲的《从盐渍土之分布论历史时

代河域之雨量变迁》、《周秦两汉时代华北平原与渭河平原盐碱土的分布及利用改良》、《北魏以来河北省南部盐碱土的分布和改良利用初探》等文，探讨了黄河流域、华北平原、渭河平原的盐碱土的生成和历史演变过程以及改良利用的经验教训。盐碱土的分布与地貌、地下水、河道变迁及气候的旱涝有密切的关系，次生盐碱化范围的几度盈缩往往离不开社会的安定或动乱，农耕或畜牧生产方式的改变，水利排灌设施的兴废等人为因素。文章为改良土壤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依据与措施方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了著名土壤学家熊毅教授的重视，特邀父亲参加学术报告会，推荐两篇论文相继登载于《土壤学报》。

（五）历史人文地理。探讨历史时期人类各种活动的地理表现，以及发展变迁的规律，也是父亲所从事的一个方面。

早在四十年代，父亲就对历史时期的西北交通地理，渭河的水运，三门峡水运，长安的水源与水上交通，福建晋江人口变动情况，福建晋江居民生活的变迁等进行过研究。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抗战期间，该校曾迁移到云贵），父亲就近对遵义地区进行过考察研究，著有《遵义的沿革》一书并有附图。六十年代初，当时贵州大学的姚公书教授（父亲的老师）曾专函索要父亲学生时代所作的有关夜郎国（古国名。战国至汉代时，主要分布在今贵州西部及北部，并包括云南东北、四川南部及广西北部部分地区）的研究。

其后，父亲在历史人文方面的论文研究课题主要是根据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急需，承担有关祖国南疆以及西部、北部边陲的若干项科研工作，研究成果多是向外交、国防等部门提供专题报告、重要资料等。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兹不赘述。这些成果也多次得到好评，获得重大成果奖，有力地配合

了这些部门的工作。

《石塘长沙考》虽是不达万字的短文，但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图籍中得到有关的资料竟达百余种，对东西方有关国家的多种图、籍也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引证。上自公元225—230年（三国吴黄武四年至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派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归国后所撰的《扶南传》至今，经过近二千年的详尽考证，指出：“石塘”、“长沙”等这一类地名的起源是与南海珊瑚岛的形态与成因有关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这一类地名有时泛指南海诸岛，有时是专指南海诸岛中某一群岛或某一些群岛。同一地名在不同时代，不同文献中所指有时也不尽相同。至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及日本图籍中的“帕拉塞尔”、“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显然是受我国的“石塘”、“长沙”这一类地名的影响，所指究竟是何地？亦应根据其地理位置进行具体分析。越南史籍中的“大、小长沙”、“万里长沙”等大都指越南中南部沿海岸的岛屿、沙滩，而非我国南海诸岛。

《中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我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等文，从多种角度，以翔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文章受到国内外重视。《我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是应学部委员、著名鸟类学家郑作兴教授特约，载于《动物学报》。

黑龙江是中苏东北部的界河，它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耶字界碑东角（约东经135°5′）是我国最东端疆域，黑龙江在国内部分的流域面积254796平方公里。然而这只是黑龙江经历了人间沧桑后存留的现状。父亲的《从历史地理看黑龙江流域》等文以史籍记载的大量事实为依据，雄辩地证实、提供了东北历史上的边界变动资料，为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出了一份力。

黄淮海（黄河、淮河、海河）平原面积最大，人口稠密，农业生产水平长期低下，改变这种落后状态，是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科研项目。父亲的《封丘县旱涝史》，《邯郸地区近百年来旱涝情况初探》等文是中科院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科研成果之一。《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食管癌记载初探》是父亲通过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亲自深入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调查访问后写成的。这些直接为农业、卫生及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成果，得到有关方面的高度评价，父亲因而被聘为科学顾问。

父亲的论著往往是含有多种学科，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证，综合研究，因而也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进行分类时也不容易将它们截然分开，也就是说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

对于父亲的工作，谭其骧教授一贯关心、支持，1982年学部委员们考察地理所，谭老指出：文焕然同志集中精力搞动植物变迁，方向是正确的。侯仁之教授在全国历史地理讨论会上谈到，“过去某些研究中的空白，也被开始填补起来，例如历史时期动物的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近几年来连续有不少成果发表，引人注目。”学部委员们认为历史动植物地理的研究是中科院地理所的一个特色。胡厚宣教授赞道：“先生勤奋，大著创见极多，无任钦佩！”江应梁教授信中写道：“云大（指云南大学）领导同志看了油印稿（指父亲文章），感赞先生学术造诣深而功勤。”著名史学与图书馆学家、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王省吾主任函称：“大作五篇，拜读之后，钦佩之至。你所研究的范围系新园地。”并表示要将文章存入该馆并寄送美国国会图书馆。学部委员李春芬、史念海教授高度评价父亲所作的马来鰐一文，并称之为历史地理新探索的范例。学部委员施雅风教授说：“焕然兄毕生致力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别古代文献资料搜罗发掘，著述宏富，贡献很大，非常钦

佩。”学部委员、地图、遥感学家陈述彭、河南师大校长李润田教授等地理学专家们也对父亲的成果表示敬佩。父亲没有沉醉于赞誉之中，他为祖国的科学研究拼搏不止。在病榻上的父亲听到地理所领导告知聘他为研究员后，对陪侍在身边的子女说：“对一个老知识分子来讲，这不是最后的追求。最后的追求应该是著书立说，将自己的知识全部奉献给人民，遗留给子孙后代。”

为了祖国的历史地理和环境科学事业的发展，父亲身患重病仍争分夺秒地勤奋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和分析，准备撰写大型科学专著，万事俱备，然而万恶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

各界于1986年12月1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光明日报》登载了他逝世的消息；据新华社报道，含有他一份心血的《中国自然保护图集》即将出版，已交稿的一些论著仍在陆续付梓；专家教授们十分关心他的遗稿、资料；三十余位学部委员、著名教授挥笔希望早出他的遗著；组织上准备着手整理出版工作……他未竟的事业将由有志之士继续下去。

# 近代中国新化邹氏地学 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文士员\*

武昌亚新地学社在旧中国地图编印出版事业中，无论就其历史之久，规模之大，出版图书之多和影响之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世人多只知有武昌亚新地学社，而不知武昌亚新地学社是新化邹氏地学的继续和发展。

新化邹氏地学自清嘉庆年间（公元 1796——1820 年）以来，至解放时，已传七代，150 余年间，其中比较著名的人士有 48 人，而邹门弟子尚不在其列。由于多年积累，多士发挥、创新，贯通古今，兼采西学，因此，亚新地图得以独步一时，并非偶然。

我在 1923 年就读于武昌师范大学，从先师邹兴钜（伯庚）先生学习，以后教学之余，也参加了该社一些编辑和发行工作，对于该社情况略有所知，近年又搜集了一些有关该社的资料，深恐新化邹氏地学与亚新地学社的实况年久失传（现代一些地图学书籍讲中国地图学史时，竟未提到邹氏地学，如南京大学编的《地图学》），特著文加以介绍，尚希专家同志们指正。

## 新化邹氏地学的由来

新化邹氏，世居湖南省新化县城南七十里首望山麓之罗

\* 文士员系邹氏地学传人邹兴钜学生，并参与过武昌亚新地学社工作。

洪，故称新化罗洪邹氏。邹氏地学起源于清嘉庆时（公元1796—1820年）邹文苏之继室吴夫人。邹文苏字景山，岁贡生，长于经学。吴夫人名瑚珊，乃同县吴兰柴（建轩）之女。在清乾隆时（公元1736—1795年），士子多沉溺于科举帖括，续学之士则致力于考据之学，独兰柴好舆地学，精心考核，著有《地理今释》4卷。吴夫人随父编校，耳濡目染，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尤详于中国地理沿革，郡县四至。归邹氏后，吴夫人生了六个儿子，长汉纪（字伯申）、次汉璜（字仲辰）、汉勋（字叔绩）、汉嘉（字叔升）、汉章（字叔明）、季汉池（字季深）。夫人课读时，常聚灰画禹贡山川图以教子。后此汉纪兄弟皆成知名之士，尤长于地理学，而其中以汉勋为最著。

汉勋幼聪颖好学，年十五郎佐长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年十六七，佐仲兄汉璜撰《群经百物谱》；年十八九，撰《六国春秋》，二十以后，精研汉学，撰《读书偶识》，后长沙王先谦编入《皇清经解》中。汉勋博极群书，于学无所不窥，通天文推步，六书，九数，金石之学，尤长于音韵学，初著《广韵表》，晚为《五均论》，论说精粹，论者比于江（永）戴（震），他特长于地理，常谓知古者，期以用于今，今古之不相遇。官名，氏族，法制典章，州郡地名皆是，而地名尤丛杂难据，故考核独详。他应聘校刊《王夫之遗书》，凡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因此知名于世。他又应聘修宝庆及贵州贵阳，大定，兴义，安顺诸府志。所撰《新宁形势说》及《贵阳循吏传》皆洞中日后情况。他在中举后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后访问魏源（默深）于江苏高邮，互出所著相参订，与同府魏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之绘天象诸图。世论湖南学者，王夫之（船山）后，并推邹魏。他于清咸十三年（公元1853年）战死于安徽庐州（今合肥一带），时年19

岁。

汉勋的地理学，上继吴夫人，而加以发扬光大，有许多重要的新发展。尤其对于地图学有系统的论述，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夫人之学尚属考据范围，汉勋之学则不仅囊括考据，并已进入引古证今，经世致用之学。他的著作甚为丰富，而其中论述地理，并为世所重者则有下列三种：

一为《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修志的要点。他主张修府志，应以州县统乡里，以乡里统村、团、都、砦，大小相维，如国家之以行省统府州，以府州统州县焉。他认为修志必须注意下列六项：（一）乡里村落，毗连界址，必须明析登载；（二）山水原委，分合远近，必须缕述无遗；（三）民居氏族，必须详载；（四）书籍碑版，必须详载；（五）人物必须确记（不可简略或浮誇）；（六）科目必须续登，援例必须增入（科目援例指府属举人、进士、恩、拔、付、岁、优廪、增、附、功，各贡生及援例京外各官，恩荫，世袭诸职）。所举六项均切中旧志之弊。按此搜集资料，修撰新志，因此汉勋所修新志（按此志系与同府邓显鹤共同主修）远过旧志，当时名号海内第一。所述各点足供应后此修志者之参考。

其次为《极高偏度说》。本文专论经纬度，我国人民早就有了关于经纬度的知识。《周礼》中《地官司徒》篇有大司徒用土圭测土深，正日影之说；《周礼》中《考工记》篇有匠人建国的方法；唐代（公元八世纪）在开封一带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测量，宋沈括（公元十一世纪）有直测北极术；元代（公元十三世纪）郭守敬发起测量全国纬度的计划，测定了纬度27点；清康熙（公元十八世纪）测量全国各省重要城市的纬度。汉勋在这篇文章中，对《周礼》的理论作了精辟的发挥。他认为善言地理者，必合乎天度，地之合乎天度者，以北

极高度和东西偏度为最著。所谓极高即今之纬度，所谓偏度即今之经度，必须根据经纬度才能确定一地之位置。他认为《周礼》所谓测土深即测一地的南北位置，正日影即测一地的东西位置，均以土圭测之（按土训度，土圭即度圭，是一种玉器，古代用以测日影）。他指出，测土深的方法是根据日影的长短。因中国位于北半球，北极以南，赤道以北，越往北则日影越长，越往南则日影越短，因此，用测土深的方法，由一地日影的长短就可以测定它的南北位置。他又指出正日影的方法是根据一地时刻的早晚。由于地球自西向东旋转，因此，东边的时刻早于西边，当东边是下午时，西边才是上午；可以在月食时，选择纬度相同，经度不同的几点，同时看准中星（二十八宿依次居天中之星）计算时刻，各推至次日正午之时，观察时刻的多少，就可以得到各地时刻相差多少，由此来确定各地的东西位置。在确定中国东西和南北的大距以后，再折半就可以得到中国的地中。在周代，这个地中在阳城（古城，相传周公测日影之处，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和洛阳之间。其地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周代就在那里建立京城。由此推论，他认为各州县无不有极高和偏度，根据这个极高和偏度，就可以在地图上定出各州县的位置。汉勋的这些论述与今日测经纬度的基本原理相合，他根据这一原理来测绘地图。他的胞弟汉池根据这一理论作有《輿地经纬度表》2卷，推算中外各国经纬度。他的侄子世诒（字子翼）应湖北巡抚胡林翼聘，主编过《清一统輿图》（胡以李兆洛《辨志书塾輿图》太简，乃纂修輿图，为军国之用，聘汪士铎、邹汉池、邹世诒等参与其事，汪作凡例，汉池推测经纬度，世诒绘成全图，图成，世称精审，优于清康熙乾隆时的内府輿图，世称胡图）也应用了汉勋这一理论。后来，他的孙子邹代钧更发挥了他的理论，为邹氏地图学打下一个科学的基础。

第三是《宝庆疆里图说》。在这篇文章中，汉勋叙述了地图的基本绘制方法。我国地图绘制起源甚早，晋裴秀（公元三世纪）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拟订了制图的准则，称为“制图六体”，包括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等六法，清胡渭（朐明）加以申明，并以鸟道为要。汉勋认为胡渭所撰《禹贡图》不画支川，因之地势差移，亦未为精妙。其后画图大半委之画工书吏，画工只知画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其法与画地形之法迥异，书吏则敷衍塞责，毫无法度，因此，不可得善图。汉勋修《宝庆府志》，欲画《宝庆疆里图》既患古法失传，而当时西法又未传入，缺乏适当的制图准则，乃精研古法，加以增减，并传授修志有关人员，共成此图，一时推为绝作。他于图后并附之以说，将裴秀六法概括为四要，又申述为二十六病。关于二十六病，因过于繁琐，这里不作介绍，只简介四要。所谓四要，即分率，方隅，鸟道，道里。所谓分率，就是图与地的比例。汉勋的解释是：“约地之广狭，与纸之广狭，享榘而命之之谓也。其画法，纸为正方格，方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惟所命，此作图之第一义，决不可变者也。”这就是所谓计里开方，在地图上画许多方格，以方格的一边表示实地若干里，他认为确定分率以后，还要造一个“分率之尺”，即今日之比例尺，尺长相当于图纸之十格，依此再画分寸，如果要计算两地的距离，就可以比例尺来计量。所谓方隅，即是方向。他认为古人所用十二方或十六方太疏，简量家所用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又太密，以酌用二十四向为宜。为了确定方向，画到图上就须先定中宫，如作一县之图以城郭为中宫，一府之图以府城为中宫，绘图时因一县一府不必为方形，县治府城又不必在县府之正中，故中宫不必在纸心。所谓鸟道，即空中直径，“空中飞鸟，一直天回转之道也。根据鸟道可以定方位、远近。”裴秀六法中之准望包括方隅、鸟道两

项,汉勋则以这两项很重要,须分别列举。他又指出,乌道的测法有二,就其大者而言,“取四海九州之遥者则以日星”;就其小者而言,“取一郡一县之细者,则以勾股重测”(即三角测量)。所谓道里即是距离,沿人行道路测绘之。曲图之所以必有道里,是因为地图必须画出山川,而山川常多绘折不如人行道之直,所以不能根据山脉水道来测距离,要用人行道来测距离。裴秀六法中有道里,高下(指地面高低),方邪(指地物形状的斜正)和迂直(指道路、山脉、河流的曲直),汉勋认为都是有关道路的方法,在测绘道里时,可以把高下、方邪和迂直包括在内。此外,他还论述了图例和注记的方法。汉勋所述地图测绘方法,虽然简略,但在当时古法失传,西法尚未传入,测绘工具又极不完备的条件下,他发挥了裴秀“制图六体”提出一个系统的地图绘制方法,还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这套方法不但用于测绘《宝庆疆里图》,而且为他的后代,特别是他的孙子代钧所发挥和应用,在中国地图事业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汉勋的其他著作有《颢琐历考》2卷,《尧典释天》1卷,《水经移注记》2卷,《宝庆吏书》1卷,《户书》2卷,《礼书》7卷,《兵书》2卷,《刑书》1卷,《工书》2卷,《宝庆沿革表》1卷,《贵阳府志》120卷,《大定府志》60卷,《兴义府志》24卷,《安顺府志》50卷。

### 邹代钧与舆地学会

新化邹氏地学至代钧而大盛。代钧系汉勋长孙,字甄伯,又字沅帆。他幼开朗,思继先人遗志,努力上进,年二十,补县学生,负祖父稿走谒左宗棠于甘肃酒泉军次,乞序而行之,即后传《邹叔子遗书》。左宗棠以代钧系故人之后,留幕读书,兼令佐理文书。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秋,代钧由

两江总督曾国荃介绍，随太常寺卿刘瑞芬出使英俄两国为随员。适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日亟，争哲孟雄（即锡金）为印属小国，清总理衙门（官署，即外交部）邮咨刘与英人交涉。刘集诸随员商议对策，诸人相顾不发一言，独代钩引古证今，侃侃而谈，谓哲属西藏，不属印度。散会后又写了个报告给刘。刘平日依靠秘书方某，以之示方，方厉声反对，说：“书生泥古，而昧于时务，那知大计，我天朝泱泱大国，难道在乎这七十里的小部落？今天英人既然要，不如给他，以维和好。”使馆参赞英马格里支持代钩意见，谓：“代钩系地理家，其言确凿有据，如据以译复英外交部，保证万无一失。”英外交部果无词以对，但由于清廷懦弱，终照租借例定议。代钩于是日益感到地理学的重要，有暇遍购欧美诸国地理图册书籍，潜心研究。一日闭户，遂得度里相差之理。所谓度里相差，是当时中国地图测绘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指地图上的经纬度度数与里数不相符。在清代，规定地图测绘上每度相当于200里，但实际测绘结果表明有误差，不是200里不等于一度，就是一度不等于200里，两者并不相等。代钩认为这个问题是由于当时中国地理测绘上所用的尺不准确所致，用这个不准的尺去量地，地就随之不准。为了纠正这一缺点，就要反过来，先根据地来定尺，因为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是一定的，如根据地球子午圈的长度来定尺的长度，则尺就准确了。他于是利用了法国的米突尺（他译作迈特），因为半尺是根据地来定尺的，相当于地周子午圈长的四千万分之一。必须根据米尺来制出一种专门用来在中国测绘地图的尺。根据他的计算，这个尺为米尺的百万分之三十万八千六百四十二（计算方法是：地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丈即1800尺，故地周子午圈长 $360 \times 200 \times 1800 = 129,600,000$ 尺，而地周子午圈长40,000,000米，因而 $129,600,000 \text{ 尺} = 40,000,000 \text{ 米}$ ，则来与尺之比40,000,000

：129,600,000， $1\text{尺} = \frac{308,642}{1,000,000}\text{米}$ ）。他就根据这一比率

请西匠制了一支专用于中国地图测绘的尺，并定名为“中国舆地尺”，于是，他的地图测绘在长度单位上就有了一定的准绳，以后他就广泛地使用了这个尺，来测绘地图。

代钧随使英俄，期满归国，时清廷开馆续修会典，代钧上书（详后）言测绘地图事，其要有三，一为测天度，一为测地面，一为依率成图。说理精湛详确，会典馆总裁采纳其说，并推荐他担任该馆纂修。同时，两湖总督张之洞又调他兼任湖北全省地图测绘事宜，图成，并附之以说。图说指出：“武昌、荆州、襄阳，同为湖北重镇，然荆扼江而不能扼汉，襄扼汉而不能扼江，武昌，江汉之会，可以制东西之命，可以交南北之冲，非特点楚所凭陵，实为四方之辐凑，观此则知所轻重矣！”张之洞以为卓识伟略，殆过顾宛溪（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者）。代钧才而侠，好谈兵谋，尤其对东南海防，西北兵情，指陈凿凿。中日甲午起，代钧建议当时政府：分全国为五镇，各道兵集于京津间，用新法训练，移驻辽阳、牛庄、海州、盖县、金州、复州，与日人为久战计。又建议合南北洋、福建、广东海军舰艇巡海上，截断日人供应线。凡数万言，颇有见地，但以清廷昏聩，竟置不理，深为可惜。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张之洞开译书局，仍留代钧负责海国地图编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管学大臣奏以代钧任编书局总纂，兼学务处提调官。次年任《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兼校对官，书成，升任分省补用直隶州知州。当张之洞任两湖总督时，创办两湖书院，以经史地算教士，聘代钧为地理教习。不久，张洞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荐代钧任京师大学堂地理总教习。流风传播，自后中国言地理者，皆代钧教传弟子。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学部拟以山东提学使任用，而代钧已病偏

枯，卒于武昌舆地学会，时年55。

舆地学会是邹代钧一手创办的，是我国最早的编印地图的企业。当代钧由英伦返国时，所购地图精本为国内第一。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猖狂，清政府对外交涉不断失败，丧权辱国，局势岌岌可危，有识之士，多讲经世之学，求所以富国强兵之道。陈立三（江西义宁人，吏部主事），汪康年（浙江钱塘人，进士），吴德藩（四川达县人，知县）三人尤有名（属资产阶级改良派），代钧与他们三人商议，说：

“英国陆军部海军部设地图局，已有二百余年，未曾中断过，由此可知英国称霸世界，与多年研究地图有关。现在我国政府不能办，我个人来办。”陈等三人极力赞成，于是在武昌创办舆地学会。代钧认为“地理是学术的根荪，政治的基础”，下定“此会当永不停办”的决心。以后他的工作虽然很忙，往来湘汉，服官四方，但经常以图局自随综绘中外总图、分图千余幅。这些地图主要有列特点：

（一）取材于中外名图，或实测地图。例如国内取材于《清一统舆图》，会典馆湖北、湖南等省分县详图，国外取材于英、俄、德、法等国名图，其中如亚洲北段图，原本俄文，经邹世可（伯宗）穷数月之力，译成汉文，绘制刊行，成为当时亚洲北段图中最精最详之本。

（二）采用新法编制，并经过仔细的审查修订。代钧发挥祖传地学，学习西洋方法，于地图绘制理论及方法，多所创获（详后），据以制图。同时，对于制图根据的各种资料，包括中外名图，均进行了审核、修订、选择等工作。例如所据国外各图均以其本国文字注记，经纬度以其本国首都观象台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用其本国尺度（英俄法尺）。对此，代钧则均加以更改，外文译成汉文，经纬度改以北京的子午线为起始子午线，比例尺改用中国舆地尺。此外，还综合中外地

图特点，详为图例和注记，以便辨识阅览。

（三）印刷采用新式方法，即烂铜版法画图于铜版上，用浓硫酸腐蚀后即成（这个方法是代钧派人赴日本苦学而得的）。

因此，邹氏地图精审，清晰，美观，与中国旧式地图有天壤之别，遂屹然为中外各方面所重视。

参加舆地学会工作的人有邹世可（伯宗）、永良（易卿）、永煊（煥庭）等人。自代钧卒后，世可、永良亦相继谢世。代钧门人周震麟（宁乡人）在侧，见其师身后萧条，舆地学会无方续办，乃建议当局将学会图经（经即地图说明底片）、印图器械归学部收购。得代价以赡养代钧后人，并助代钧堂兄代藩（字价人，与黄兴、谭人凤等组织华兴会，积极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出长宝庆军政府，后赴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参加临时约法的拟制，谭延闿任湖南督军时，曾回湘任湖南省水利局局长，1922年卒，年62，撰有《宁冈县志》18卷等）从事革命经费。

邹代钧于地理之学造诣甚深。他继承了祖父汉勋之学而作了一定的发展。汉勋根据中国旧法，加以发挥，虽有改进，尚不完备。代钧则发扬中国古籍，结合西洋方法，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论述地图测绘，尤有独到之处。他的著述甚多，其中关于地图测绘的论述主要有《上会典馆书》及《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两篇。

在《上会典馆书》中，代钧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及绘图三事。测天度即经纬度，借以定各州县之部位。中国古代对于经纬度及其测定法早有一定的知识，代钧之祖汉勋曾对这些记载加以论述，发挥（已如前述）。代钧根据乃祖的论述，参考西方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认为地球是一个圆球，其南北二点正当天空中的南北两极，地球的中腰大面亦与天空之

赤道相当。地之南北不同，则北极超出地面高度不同，东西不同则日出的迟早不同（每度差4分时），地周360度，与天周相应。测天度必先定午线如以前我国以北京为中线，英国之格林威治，法国之巴黎，从前西图所用之福岛（在非洲西北大西洋中）等。西人定其国午线及经纬度之法与《周礼》所说，其理相同，不过西法参用指南针，子午仪，经纬仪及纪限仪等仪器。测地面即是测地面广阔高低，以定各州县所辖之地域。他认为测地面要用三角测量法，即中国古算法九数之勾股，在《周髀算经》中有卧矩知远，偃矩望高二语可以包括一切。在这里，他还叙述了西法所用各种测量仪器（包括经纬仪，测向罗盘、纪限仪、瓶水地平仪等）的使用方法，测量后就可以绘图。他认为绘图首先要明确分率，所谓分率即地与图之比例。地图周360度，每度200里，每里1,800尺，因此每尺为地周的 $\frac{1}{129,600,000}$ 。作图时用开方法，设每方一寸，十方一尺，如

以图上尺代地上一里即1800尺，则其分率为1:1800，但作总图时，此分率太大，可用1:900,000，其它各图，视详略而定。其次布经纬度，纬度当赤道处，每度相距200里，渐北则渐狭。经纬线最好用圆锥通经直纬曲之法画之。为了画经纬线，他建议作八线表和分率微分尺，并叙述了画经纬线，定一地经纬度的方法。又其次是画地面高度，他介绍了等高线的画法。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中国古代关于经纬度的理论和地图测绘方法，也介绍了西洋地图测绘方法，提出了测绘地图的准则，这些准则为会典馆所采用，对中国地图测绘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一文中，他论述了测天度，测地面鸟道，测地面人行道，用人用器，绘法及图说等七个问题。关于测天度，他叙述了经纬度的简要理论，同时指出，应

派遣精通算法，善用仪器的人员，携带经纬仪，度时表，遍往全省六十八州县治所，测天求度。又于每州县四边之极，南北东西不致平行之处，择四定点，定其经纬度分；而名山之峰，大川之上，以及古郡县旧治，关隘险要，亦定其经纬度分，注于册。此外，还可增设各点，既得若干点，再求各点间的鸟道（直线距离）为三角底线，以便进行地形测量。关于测地面鸟道，他叙述了平面控制测量的三角测量法。关于测地面人行道，他认为既测地面鸟道已得山脉、水道、道路和界线四者的转向，而四者的纬曲远近，则需要测人行道的方法测得。具体测量法是用测向议定方向，记里轮量远近，一人测向，一人记里，择要详为记载。关于用人，他主张招聪俊耐苦生童20人，教以测绘，学习三月，结业后，随同者测绘局12人，分大路，计8人，其测一州县，二年测完，再加绘图一年，共用3年。关于用器，他主张采用西器，酌用经纬仪（能辨十秒者）度时表测天，测向仪，奈林仪测地。关于绘法，他主张分率，全省总图定为九十万分之一，州县分图十八万分之一，草图一万八千分之一，用圆锥通经法，作经直纬曲之式。关于图说，他认为会典馆所发表格，其中叙述沿革疆域乡镇是略仿班志诸书之例，叙山则拟山经，叙水则拟水经，又详天度道里，而山之矿产要隘，水之圩堰桥津均叙于当处之下，简而明，要而详，自应遵守。总之，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会典馆所发章程表格，详细规定了湖北省测绘地图的具体办法，使以后编出的《湖北全省分图》（一称湖北会典馆图）成为一个精审的地图。由此也可知当时我国地图测绘工作已达一定水平，而代钧在我国地图事业上作过一些重要的贡献。

代钧其它著作有《上德宗皇帝书》（其内容系论述清会典馆编绘地图事宜），《光绪湖北地记》24卷，《中国地理讲义》6卷，《中国海岸记》4卷，《会城道里记》2卷，其内

容系叙述当时京师至各省会及各省会相互间的路线和里数），《蒙古地记》2卷，《日本地记》4卷，《朝鲜地记》2卷，《安南、缅甸、暹罗地志》3卷，《印阿富汗俾路支三国地记》5卷，《西域沿革考》2卷，《五洲城镇表》2卷，《五洲疆域汇编》32卷，《西图译略》12卷，《英国大地志》10卷，《中外舆图》68幅（即前述武昌舆地学会编绘印行的地图），《西征纪程》4卷，《中国地志略》（高等小学教科书），《外国地志略》（高等小学教科书），《湖南全省分县图》（系根据会典馆本参订刊行），《西藏全图》等。

### 邹永煊邹兴钜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永煊，字焕廷，系代钧子，初佐邹代钧创办舆地学会于武昌，邹永煊佐绘《亚洲北段图》等。其后代钧、世可（伯宗）相继卒，舆地学会瓦解，其地图底本、制图器械皆由学部购去，而不知所用。永煊慨邹氏地学顿衰，邹氏地图不复见于世，乃起而继之，创设武昌亚新地学社，作为一个编辑印刷和发行地图及史地书刊的企业。于是召集同仁，编印地图三十余种行世，邹氏世业，得以光大。所刊诸图，皆经同仁肆力搜求，殚精刻绘，铜版石印，著色七套，于是邹图复见重于世。永煊年六十时，以图学付其子兴钜。永煊善书法，手临汉碑，见称于世，建国后卒，年九十余。

邹兴钜，字伯庚，武昌方言馆毕业，通日文，曾任教地理于沈阳、武昌两地大学，后继承父业，专心办亚新地学社。对于该社工作，颇有改进。编印各图，随时调查，随时更正，附有表说，以供参考。水建则源流具晰，山岭则脉络悉陈，至于疆域之广狭，都会之位置，物产之盈亏，道路之通达无不一一详载，以便学者。而且稿出必勘，付印必校，对勘再四，而后敢出一图，如此慎之又慎，因而每一图出，风行国内，远至南

洋。又扩大厂房，设置电机，改良印刷，便利推销。并在上海、南京、广州、长沙、成都等地设立分社，业务发达，盛极一时。1937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战，而反动政府假抗日，真投降，节节败退，甚至不战而逃，1938年武汉沦陷。事前兴钜父子将亚新所有图片底本及印刷器械运至新化原籍，继续出版，各方面所需地图得以供应无缺。当时兴钜已患病，犹编图不辍，遂至不起。兴钜生平所编著，有《春秋战国图说》4卷，《中国历代疆域战争合图》4卷，《华英对照列国图》40幅，《中国分省图说》2卷，《京省道里图说》4卷，《江苏道县图》、《河南道县图》44幅，均刊行，嘉惠士林不浅。

兴钜卒，而其子新垓继。新垓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该校教地理者为张印堂、洪思齐两先生，教地质者为冯景兰、袁复礼、孙云铸、杨钟健诸先生，教气象者为李宪之、起九章两先生，皆一时名教授。新垓既从之学，又考察滇西数县地质，所学益进。新垓既继父业，益发奋，所编著有《世界地理纲要》、《中国、日本、日印半岛、南洋群岛航空图》81幅，又改编《新世界列国地图》、《本国析类分省地图》、《袖珍中国分省地图》等。新垓现任地图出版社副总编辑。

亚新地学社是由邹氏一家独资经营的，参加地图编制的，除邹氏而外，主要有欧阳纆、文士贞等。抗战胜利以后，亚新地学社迁回武昌原址。

1949年武汉解放，亚新职工也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获得新生。1953年，该社迁至上海，与上海、北京、南京十几家地图出版企业合并，改组为公私合营地图联合出版社。五十年代末又改组为国营地图出版社。至此，亚新虽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告结束，而中国的地图编印出版事业则翻开了新的一页。

## 冯玉祥将军 在桃源帮助彭施涤先生办学

彭秀叔\*

祖父在世时，曾和我多次谈到他在桃源办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时的艰难情况，并说冯玉祥将军帮助他解决困难的一个故事，感人至深，至今不忘。要记故事的经过，先从祖父办教育的简历谈起。

我祖父彭施涤先生号心荃、或写惺全（1871—1947）是我省创办近代教育的前辈之一。祖父是清末举人，后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之后，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尔后曾任湖南省自治筹备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府委员等职，但他的主要精力则致于兴办教育方面。日本留学回国后，1906年与马君武、秋瑾、宋青堂、姚宏业等在上海办中国公学，祖父任董事会董事兼学监，1908年回湖南任湖南高等实业学堂（即湖南大学前身）副监督（即副校长）、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湖南西路师范学堂监督等职务，供职国会期间，曾在民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嗣因袁世凯恢复帝制，北洋军阀争权夺利，国会弃若敝屣，国事日非，先祖父愤极携眷回湘。回湘后仍致力发展教育事业，与同仁集资办兑泽中学、沅澧中学，祖父将自己储蓄三千元，分别投给两校，毫不吝惜。1915年祖父由湖南省政府派任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女师设在桃

\* 彭秀叔系土家族，湘西自治州政协委员，系教育家彭施涤的长孙。

源，又称桃源女师。祖父在这里任职六年，直到1921年才离开，由于祖父从事教育工作，受业于门下的知名者甚多，堪称济济多士，在湖南教育界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祖父任职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期间，正值北洋军阀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北洋军阀势力已侵入湖南，湖南已成为南北要冲，屡遭兵变，民生水火。1918年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张系北洋军阀系统人物，莅湘后，与其爪牙专横跋扈，搜括民财，压制民主，阻挠护法军北伐，镇压学生工人的进步运动，对湖南教育破坏很大，我祖父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办省二女师，实在困难重重，但我祖父迎难而上，决心要把这座提高女同胞文化知识的师范学校办好，为使学生有个实习工厂，完善师范学校的学制，又于1917年7月，建立了一所附属小学。这年秋天，常德县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困难，无法续继办下去，在我祖父的同意下，常德县女子师范的学生全部转入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入学学生陡然增加，教师、校舍、设备等都大大不够，这就更加加重了祖父办学的困难和压力。困难还不止此，这年的12月，省银行通知停发省二女师的经费，教育厅下文要学校自筹经费维持，停办亦可。在此严峻形势下，祖父咬紧牙关，东拼西凑，坚持把学校办下去。1918年，祖父秘密去广州，参加“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护法政府大元帅，趁此机会，向各界同情人士为省二女师募款，得到各方资助，学校得以勉强维持。1919年张敬尧仍盘踞湖南，湖南财源枯竭，学校经费仍无着落，学校面临山穷水尽，无法继续的地步，我祖父以坚强不屈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办学意志，亲赴北京，以国会众议员的身分，向北京政府呼吁要求解决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的办学困难，此次幸好得到湘西著名政界人物熊希龄先生的帮忙，从湘西办实业款中拨出二千元光洋，使学校得以艰难的继续办下去。1919年古历腊月，因南北两军交战，相

持辰溪、桃源之间，加之，上湘西地区发生匪乱，学校虽已放假，上湘西各县数十名女学生（包括四川酉阳数名女生在内），因道路不靖不敢回家，当然也得不到家里的经济接济，祖父为这些女学生安排留校开餐、居住、复习功课，眼看伙食经费无着，临近断炊，且年关在即，大家都很发愁，我祖父焦急万分，忧心如焚，他一再向桃源商会及街上商家东拉西借，奈何兵荒马乱年月，谁也无心解决学校的这个燃眉之急，往返多次，只借得几十串钱到手，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祖父长吁短叹，一愁莫展，坐卧不宁。其时，我的祖母向熙祚也看到祖父的困难，，她已想了个解决困难的办法，提醒我祖父说：“我的校长先生，你那样发愁，头发也愁白了，我倒有个好主意，你身上不是穿了一件从张家口市场买的皮衣吗？那是进口货，值几块光洋的，何不拿到外面当铺卖了，可拿得几十块回来，不是可以解决学生们吃饭的困难么？你可以找那件旧棉袄穿一穿，我已经给你补好了！”祖母的话，提醒了祖父，好象绝处逢生，祖父急忙脱下皮衣，拿到当铺去卖，得光洋三十，祖父乐呵呵，拿光洋回来，除安排好学生生活外，还与祖母商量办点年货，与女学生们过一个患难与共的穷年。女学生们听到校长卖皮衣的事，悲喜交集，女学生们容易动感情，一个个泪流满面，说不出是悲是喜。

原来前不久冯玉祥将军以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及湘西镇守使的身分，驻军桃源县城，负责控制常德、澧县一带，年关将近，军事稍暇，偕夫人刘德珍女士漫步街头，欣赏当地年节准备情景，也想买点年货，当他到我祖父卖皮衣的那家当铺时，突然看到我祖父卖的那件皮衣，这进口皮衣，质量很高，引起冯将军的注意，当他问起皮衣的价格和这件皮衣的来历，铺老板对冯将军叹口气说：“这皮衣的卖主是举人校长哩（桃源人都这样称祖父）。这举人校长是永顺人，为办好女

师，他吃尽了苦，现在留校学生伙食困难，无法过年，彭校长脱下身上的皮衣，自己穿件破棉袄，我们是不忍心买他的皮衣的，他又再三央求，只好买下了。”老板哽咽说不下去。冯将军早就知道祖父是湖南有名的办教育人，今天见此情景，更为感动，当下与夫人商量，掏出三十块光洋，赎回那件皮衣，并与夫人亲自到学校把皮衣送给祖父，给祖父说了很多出自内心的鼓励话。当他听祖父诉说办女师的艰难情况，他便以他和夫人的名义，把自己的存款一千元光洋，赠送给学校，作为省二女师办学的经费，这真是雪里送炭的及时雨，祖父感激万分。祖父赋性耿介，知道冯将军带兵清廉，官囊不丰，坚持写借条准备日后奉还。冯将军笑着说：“校长不必如此，你是教育家，你办学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为国效力；我是武人，我练兵打仗，也是为谋求国家富强，殊途同归，几块钱算是我们支持你办学的心意，赠送者，赠而不还也，还打借据做什么？”冯将军讲得直率有理，祖父只好代表全校师生，向冯旅长及其夫人表示万分的感谢。

省二女师门房（传达）刘老头，性情倔强固执，但忠于职守，有两件事做得好，得到校内外的赞扬，其一：女学生在学习时间，非特殊事件，一律不会外客，外客进校者，一律凭正式手续，谁也不准随意到校闯进闯出；其二，校门口前后附近，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任何人都不准在校门内外附近到处扔废物或随便大、小便。某日，刘老头在后门“巡察”，忽见冯部的一个青年士兵，背朝外身，朝内在后门墙角边小便，被刘老头看见。老头一气之下，打了士兵两个耳光，青年士兵被打，扭住老头，要拉到司令部坐禁闭，两人正在扭扭打打，不可开交，适有冯部两个下级军官过路，问明情况，喝住青年士兵，并向老头道歉而去。事后，祖父知道此事，批评刘老头不该随便动手打士兵，又为此事向冯玉祥将军道歉。冯将军听了哈哈

大笑，并安慰祖父说：“老百姓出钱出粮养活官兵，官兵是老百姓的子弟，老百姓应该管教官兵，刘老头虽然动手打士兵，但他敢于管兵的精神是值得表扬的。况且你那个学校的秩序应该大家遵守维持，你想大家都不遵守学校的规矩，你能办好这个女子学校么？”随即叫来秘书，冯将军口述，秘书笔录，写下：“本旅长冯示：学校重地，军民人等不准滋扰，违者严惩。”然后盖上旅部大红印，祖父拿来贴在校门口，在冯军驻扎桃源之日，学校秩序井然。

过年后几天，冯将军请祖父到司令部赴宴，席间冯将军把他的军官，如团长张之江、营长宋哲元、韩复榘等都给祖父作了介绍，并给军官们介绍祖父是我国教育界的名人和办省二女师的精神，把祖父卖皮衣的事，也给大家讲了，入席时，他拉祖父坐首席，他开玩笑说：“‘天地国亲师’，只有你这个师，才有这个资格。”席间为祖父频频敬酒，祖父平常不善酒，这次冯将军至诚盛意难却，连干三杯，有些醉意了。席上，冯将军还劝勉在座的军官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要支持彭校长办好女师，严禁官兵随便出进女师，绝对不准发生官兵调戏女学生的事件，若有发生决不姑宽。冯将军还号召官兵一定要重视教育，尊重老师，敬育是立国之本，老师是献身教育之人，不重视教育，不尊重老师，是误国误民的行为，冯将军在席上真知灼见，使我祖父和在座的军官都十分感动、佩服。

祖父年老之后，经常和我们后辈谈及他办教育的往事，总是要详谈到他在省女二师的一段艰苦历程和在他办学的为难之际得到冯将军慷慨资助的一段经历。冯玉祥将军为他赎回的那件皮衣，他一直珍藏着。他说：“一件皮衣能值几何，焕章先生的情义是千金难买的。”

为使先辈关心教育、热爱教育的事迹不至湮没，故将先祖父所讲的经过，回忆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 回顾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的历程

罗桂良 刘冬松\*

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是民革湖南省委主办的。1978年10月创办时，是为高考落榜青年办的文化补习班，仅188名学生。今天，这所学校拥有79个班，3443名学生。他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要一分钱，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十二年来累计结业、毕业712个班，为国家培养了35406名各类专业人才。他们办学一丝不苟，热心为同学们服务，克勤克俭，以学养学，人才辈出，在省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前后22次受到民革中央、全国总工会，省、市政协，省、市教委，民革湖南省、市委等领导机关颁发的奖状、奖金和各种荣誉奖励。

## 见缝插针 艰苦办校

这所学校与众不同，没有自己固定校舍，租用长沙市五所中、小学的多余房间，设四个教学点，分布在长沙东、南、西、北四个区。他们没有高楼大厦，设备简陋，大部分成年学生，用小學生课桌学习，诸多不便。校本部设在育英小学，两间约五十平方米的楼房作为办公室，指挥几千人的教学活动。学校高度分散，但教学有条不紊。课堂的利用率可说达到了极点，白天学子满堂，晚上成千学生云集，就是节假日也不例外。有的学生舍正规学校不上，有的舍近求远，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学习。我问学生们为什么这样？他们自豪地回答：“学校

\* 罗桂良和刘冬松均系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名老教师。

好坏，不是客观条件决定的，艰苦磨练人才嘛。”的确，许多有志青年，就从这里成长、腾飞。在这里电大汉语言专业毕业的学员，有的已成为省内外知名作家，英语专业毕业的学员，已有几十名出国深造，工企管理专业毕业的学员有的已成为国内外颇有声誉的企业家。

### 拾遗补缺 按需设班

“拾遗补缺”四个字，是几年前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同志给该校提示的办学原则。现在，他们拥有电大教学部、高教自学考试辅导部，中央党校大专函授辅导部，八九年开办本科班，干部大、中专专业证书班，省教委备案的职工中专、电视中专教学部，进修复习部等，都是按照朱老所提的原则设置的。特别每个部设的班，都是通过调查研究，根据国家需要和多数青年要求开办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为了适应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山业大进修复习部的英语专业，适时增开了交际英语，研究生英语，出国考察人员口语培训等班，几年来总计结业、毕业学员两千多人。在国家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新形势下，学校的高教自学考试辅导部增加了法律专业的教学，先后培养各种法律专业人才五百多人，他们参加法律专业各科的高教自学考试，都取得较好的成绩，如刑法学学员的合格率为100%，婚姻法为97%，法律语文为95%，经济法为91%，又如法学基础理论一科，全省考试成绩的前六名都是中山业大的学员。1989年经湖南省教委批准备案将中山职工中专，与中山业大是合二而一的。他们经过深入调查了解，与社会各界联系研究之后，别开生面，开办了美术印刷、制冷设备专业。这些新开的专业，从教学计划、教材采编，师资聘请诸方面均要增加成倍的工作量，但他们为了及时给国家培养四化建设所需的人才，总是主

动地自找苦吃，迎难而上。

### 赔钱也要狠抓教学

这所学校处处为学生着想，考虑学生的经济负担，收费低于国家规定标准。他们坚持勤俭办学原则，精打细算，非教学性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一所三四千人的学校，没有一名正式的勤杂工，每年数以万计的教科书，各种教学设备、用具，都由古稀之年的正、副校长带头，全体办学人员搬运，所收学费，除支付教师授课费外，每年要用近十万元租赁教室。经费略有节余就添置教学设备。十二年来陆续购置了课桌椅八百多套，双层铁床七十多张，发电机组一台，风琴二十五架，电视教学用的大彩电、录放像机、收录机、图书资料等，总值十多万元。还将历年积累下来的二十万元，与省直属机关党委干训部合资建造一所教学大楼，作为永久性的校舍。

他们收费的原则是：以学养学。有的班级入不敷出。怎么办？他们总是以余补亏，保证学生完成学业。

1989年下学期职工中专财会班五十七名学生，根据应收应付预算，略有节余，但是，该班41名外地学生住宿，租三间寝室住得很拥挤，租四间寝室，每年亏损3000多元，为保证学生有稍好的住宿条件，学校坚持租了四间宿舍。还有电视中专幼师班70名学生，按所收学费核算，作一个班上课略有节余，但是人数多，将影响教学质量。分两个班上课，每年亏损一千多元。学校为保证教学质量，最后还是分班上课。据我们了解，全校七十九个班，这样亏损的有十一个之多。但是，学校采取以余补亏的办法解决，从来没有增加学生负担。

### 难能可贵的奉献精神

中山业大，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成为省内

外社会办学的先进单位，党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民革湖南省委的具体领导，当然是重要因素，但也与这里的全体办学人员无限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分不开的。

在这里办学的三十几位同志，都是教育界离退休的老教师。他们明知老之已至，但为教育事业奉献余热的赤心仍在。他们不愿在家享清福，安度晚年，志同道合地来到这里办学。民革湖南省委成员，第一任校长王显跃同志，创办之初困难重重，他以校为家，呕心沥血，披荆斩棘，使学校初具规模。1984年他伏在办公桌上，安祥辞世，被人誉为当代的“武训”。

现任校长廖经池、副校长梁士洁、胡献勋都是年逾古稀的老同志，他们一心为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既进行宏观管理，又做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他们日日夜夜全心扑在学校工作上，节假日都很少休息。有时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他们就顶上去。

学校要求办学人员，每周出勤十二个班（上午、下午、晚上分别为一个班）。为了搞好教学，所有办学人员都超过了这个要求。三十几名办学人员，负责三千多学生的教学管理，任务繁重，比离退休前工作还劳累得多，每月正式补贴不过七八十元，个个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心里装的是学校，是学生，身外之物，谁也不去计较。

正是这种无私奉献精神，使这所学校不断发展，培育成千上万的学生健壮成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山业大经历十二年的艰难历程，已经桃李遍布三湘四水了。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决心进一步贯彻勤俭办学方针，积累点滴资金，还盼望获得社会各界的资助，为建造一处国定校舍，为进一步办好这所新型学校，为国家源源不断培育各类专业人才而不懈努力。

## 记在延安保卫战中牺牲的周月南

刘 国 安\*

周月南是湖南衡东人，1947年10月在延安保卫战中壮烈牺牲。他生前跟我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来往。他母亲是我嫡堂姑母，他的年纪比我大一两岁，我叫他表兄，从小他跟姑母回娘家时，我们就在一起玩。他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妹妹，比我小儿岁，也常来我家在一起玩，真可谓青梅竹马。他妹妹因病在年幼的时候不幸夭折，姑父、母就只有月南表兄这独苗了，所以对他很喜爱。初中上学时，我们一道考入衡山县立初级中学读书。他跟东安兄年纪差不多，接触马列主义比我早。喜欢跟年纪大一些的同学议论国事，看一些进步的书，他成熟比同龄人要早，生活习惯也比常人不一样，多数同学早上吹起床哨子才起来，他却比别人早得多，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先锻炼身体，而天亮后拿着书本躲到静寂无人的地方去看书，喜欢发议论，喜欢写文章。当时学校的校长叫彭达麟，是一位四十来岁长满黑胡须的胖子。有一次在纪念周上吹胡须，瞪眼睛，对同学们训话，说是有的学生写文章，谈论社会发展规律，说“社会发展不是直线形的，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形向前发展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受共产党的影响，是一个危险信号，要防止赤化等等。事后我得知这篇文章是月南表兄写的。因他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受到训斥。有一位在广西大学读书的曾昭融，跟他来往较密，

\* 刘国安系周月南表弟，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有许多进步书刊可能是通过曾介绍的。周月南去延安前介绍跟我认识，我也通过他找到过不少书籍。除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为了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还通过他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和巴格达诺夫著的论述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等书。

姑父、母为了找一个家务帮手和早日见到第三代，很早为月南表兄成亲。那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表嫂比月南大几岁，帮父母做家务到是一把好手。但月南与她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他初中毕业后，跟我一道考入了湖南省立衡山师范学校，他开学时在学校用功读书，放假后也藉口要复习功课，留在学校不回家。他多次向父母提出要离婚，没有解决问题。1938年元月为了参加抗日民主活动，下决心与在湖南省立长沙高级中学读书的刘东安、康杰三人一道离开家乡，奔赴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在寒风凛烈，雪花飞舞的一个冬日，从衡山县城北中学附近的河岸坐上小木筏朝西安去延安的方向出发了。行前为了筹措路费，得到衡山师范学校进步校长汪德亮和进步教师邹鸿老师的资助，并请进步教师朱晨声老师给基督教军人服务部驻西安的负责人写了介绍信，请其在月南等经西安去延安的途中给予帮助，以免在沿途被国民党截留送入集中营。

当时我也要求与东安兄与月南表兄一道去延安的。但当时学校地下党同志做我的工作，要我留在学校、留在蒋管区工作。中共地下党已经向省委汇报，要发展我入党。不能把蒋管区的工作都丢下不管，我服从了党的决定。把他们送走后，我不过三个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把月南等三人送走后，经常盼望他们的来信。当时衡山、西安之间的通讯还是方便的，但西安到延安，就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到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那是两个世界，封锁是很严密的。事后得知从西安到延安当时要身背被包，步行七天七夜，经

过国民党封锁线，随时有被抓的危险。他们走后是否在封锁线上被抓、被送进集中营？我们十分担心。大家经过几个月以后，我居然收到了一封用十分破旧的粗糙得像草纸一样的信封，信封上写了我的姓名，寄信的地址是肤施农村。肤施就是延安原来的地名。信中没有信，只有一张照片，这是月南表兄在延安照的，背面写着：“祝你们像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我们高兴极了，得知月南安全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投入烈火般的革命洪炉，一定会锻炼得像钢铁一样地坚强。

我以后再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知：1947年延安撤退，月南当时担负着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撤退的任务，当时他是三边区党委书记（三边大概是指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陕、甘、宁边区这三个边区交界的一个特区），为了党和毛主席的安危，为了人民的利益，掩护毛主席、党中央，掩护老百姓撤退，他带领三边区的地方武装走在最后，被宁夏马鸿逵的骑兵部队包围，被俘。马鸿逵反动头目为了想从月南的口中挖出毛主席、党中央的去向，用尽了各种刑罚，始终动摇不了他的坚贞，反动头目无计可施，终于用“五马分尸”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了月南的生命，碎断了他的躯体。然而月南的革命精神、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信念，是永垂不朽的！

## 龙凤翔与湘西苗区公益事业

邱晓玲\*

湘西地处湘、鄂、川、黔边境，山高水险，交通不便，闭塞落后，尤其是建国前的苗区，穷山恶水，灾害频繁，苛捐杂税繁重，文化经济发展缓慢，再加民族歧视和官匪欺压，苗民们几乎在生死线上挣扎。可就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龙凤翔却以终身致力于苗区公益事业，有所建树，而被人们称颂至今。

龙凤翔（1862——1945），名桥喜，字岐山，号端敏，苗族，湖南湘西凤凰县唐家桥人。自幼勤奋俭朴，乐于助人。不堪忍受官府对苗族“蠢苗”的辱称，发愤读书，18岁考中秀才，继而投考举人。行至投考途中，惊闻贵州土匪打劫唐家桥寨，杀死父亲，即返故里。召乡人协助杀匪报仇，被官府逮捕下狱，受尽折磨。幸得苗族举人龙骥等鼎力相救，方被释放回家。出狱后，他苦苦思索，谋求一种保持地方安宁，让家乡百姓安居乐业的办法，他与人谈及了“合款”制度。

合款或称合团，早先是苗族氏族村社及地区部落的联盟组织，其雏形是合鼓（苗语“博傩”）。它由有共同信仰、风俗及血缘关系的苗民组成，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几寨，有的上百寨，后由以娱乐为主的合鼓团体演变为维护社会治安和民族生存的制度。散会的头领叫款首，由群众推选通晓古今、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不族世袭，不称职者，另推他人。款会按族规

\*邱晓玲，苗族，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教科 文卫委员会工作。

对内维护治安，解决民事纠纷，保护成员生命财产，对外实行同心作战，凡在护款斗争中消极观望或贪生怕死者将受到处罚。龙凤翔决心实行“合款”制，他联合方圆48寨苗民，恢复了款会制度，并被48寨苗民推为款首。不久，又因维护苗乡治安、举荐人才有功，“阖营称庆”，上苗乡成立凤凰厅上五河永镇团时，被选为“团首”，成为苗乡最后一个“款首”，最后一任“团总”。

1910年，龙凤翔与表弟吴玉山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积极投入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组织活动。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凤凰县后，人心大振，凤凰进步人士唐力臣（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独立旅旅长，徐州警备司令，湘黔边防游击司令等职）、田应全（曾任川边太臣赵尔丰一等随员和成都兵工厂提调）立即响应，组织了光复会，于1911年12月27日邀集贵州松桃，湖南乾州、永绥及凤凰县等地的光复军5000人，陆续云集凤凰长宜哨，半夜时分兵分三路，直扑凤凰城。由于驻凤凰的辰沅永靖兵备道道台朱益浚监视严密，唐力臣所率各路义军进攻北门时，田应全等未能及时策应，起义部队失去内应，攻城义军遭受清军炮火猛烈轰击，伤亡极重，北城内外血流遍地，攻城失败。以后，唐力臣、田应全再次集结松桃、凤凰、乾州、永绥等四厅苗、汉、土家等族人民誓师起义，迫使朱益浚引退，建立了湘西军政分府。龙凤翔积极参与了这次“凤凰扑城事件”的策划和善后工作，为表弟吴玉山提供了三千吊铜元的经费，深为凤凰辛亥革命党人田凤丹（即田应诏，曾任湘西镇守使兼辰沅道尹，湘西护国军总司令等职）赏识，结为“把兄弟。”1913年10月，凤凰厅改为凤凰县，建立新政权。县府于10月16日致函龙凤翔，称其“乡望素孚，老成慎重，相应备文照清，即烦查照。务于国会省会选举投票之期，齐集投票，所负担管理责任，是所盼切”。龙接函后，即赴县城主持

国民代表的选举工作。不久，被选为“凤凰厅上苗乡第四区自治公所议员”、“省议员”。袁世凯窃国后，龙响应孙中山“讨袁”号召，支持田凤丹组织湘西22县独立运动，被选为独立议会议长。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任大元帅，组织护法军讨伐北洋军阀，西南各省纷纷响应。田凤丹率领竿军东下沅陵，组成护法联军第一路军。龙凤翔支持吴玉山接受田的邀请，出任营长，相约“兄守本土，弟征顽类”，表现了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忠诚和热情。

日寇大举进攻中国，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民生涂炭，怨声载道，身居偏远苗寨的龙凤翔心系国事，忧心忡忡，挥笔洒下无数愤懑的诗文，这里抄写两首，可见一斑：

“几经北伐始中兴，又见烟波海内生。”

相率同庭逐异类，莫教夷狄肆鲸吞。”

“深感吾国事，一世乱滔滔。

夺利劳征马，争权苦战袍。

枪交山水动，兵接鬼神逃。

省省尸盈野，年年血满河。

雨时斑竹泪，声处滴泉号。

冀遂天召去，无人唤卖刀。”

字里行间，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

以后，龙凤翔越来越看清反动政府的本质，对依靠腐败的政府建设好苗区不抱希望了。他不满于这种黑暗统治，拒不出仕，坐守家乡，一心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凡地方公益事，无不尽力提倡，如开塘坝以灌田水，修桥路以利行人。排难解纷，累息争讼，乡人德之……”（见湘西镇守使署秘书长滕凤藻书《端敏先生龙凤翔石表》）他充分发动乡民，团结创业，让其侄儿龙兴明出面组织“唐家桥创业会”，自任名誉会

首，并于1920年代会首龙兴明拟写了《创业股簿序》：

“窃闻至圣论政，首重足食，大贤谋国，先筹恒产。可知衣食足，然后礼义兴，此亘古不易之说也。倘饥寒交迫，府仰日深，谋生不暇，何论其他。爰邀族友，玉成一会，名曰：

‘创业会’。每股凑钱4000文，共34股，合钱136千文。由会内人等，择一、二老成者，经理生息。每于年节新正时，集合扣算一次，除经理人伙食开销外，得利多少，登入股簿，俾众周知，以免后言。其会议定满15年后，方许瓜分。倘能如愿相偿，则衣食可足，礼义可兴，名曰如‘创业会’，不亦宜乎？谨序。”序中论理简明扼要，寥寥数语，便把发动民众，互相合作，筹集恒产，艰苦创业的指导思想明确表达了出来，以很强的说明力使乡人信服，加入创业会的34户股员齐心协力，大兴安邦富国、益人利民的好事。在股金的扶持下，34户会员中有六户很快大幅度地发家致富，其他各户也成倍地增加了田产，还支持了一些困难户的生产。在这种正确的安邦富国，益人利民的指导思想指导下，龙凤翔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有所建树：

一、兴修水利，完成了担水江水利配套工程。龙凤翔生于苗区，长于苗区，深知“水”对居住高山的苗民的重要，对农业的重要，他提出了“修筑塘堰以兴水利”的口号，切中苗区农田之弊。在既无国家投资扶助，又无技术力量引导的情况下，他作为“苗族头人”和“农村富人”，决心组织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同商办”、“通力合作”，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他首先拟定了一整套“群众互助修水利，合理管水灌田”的章程。《修理担水江水圳碑》在序言后，计开乡规民约九条：

“（一）工程浩大，筹资实难。拟中田一挑出小工一个，钱十文；下田一挑出工二个，钱20文。计亩均摊，以示均平。

(二) 田有业户、当户、佃户。业户自行耕种者，照章帮工。佃耕于人者，佃户出力，业户出资；或业户已当者，不肯出工，当户以转贖屡更，吞惜小费，拟当户暂出小工。日后业户赎田除当价外，须补足修圳用费，俾得踊跃从事。

(三) 圳长水远，架枧筑堤，朝盈久涸，易致朽坏。每年议出理水谷七石，妥雇一人理水，以专责任，俾免朝夕涸之害。

(四) 田有中田，有下田，中田十挑，每年出理水谷7升；下田10挑，出理水谷一斗二升。以分中下俾顺群情而愜众志。

(五) 圳若余水，其间若有荒地，可开田丘，于修圳时节，无力帮助小工者，准予补修对照章补帮。搭管余水，庶荒废之地变为膏腴之田，贫困之家可免无力之憾。

(六) 所议理水谷，通盘合算，不止7石，且有荒地待开，田丘照章均派，数尚未定，仅除7石雇人理水。

(七) 圳水所经之地，若兼事外之业，公同商办，若系通力合作者之业，无论疆界彼界，一律开挖。

(八) 理水灌田，务要相匀，不得持强欺弱，妄行滋事。违者共同率究，以平争端，俾沾实惠。

(九) 田业主若有当出，理水谷系得当主承认。但当主业主姓名繁多，不便详载，谨注明修圳录中，以好查收理水谷石，应理水有资，永无荒废。”

规定中敢于提出“贫困之家可免无力憾”的主张，组织乡民，有钱者和无钱者同心商办，共同富裕，公平合理，为大办地方公益事业争得了民心，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保证。那时，苗族地位卑微，根本没有国家投资和技术力量扶植，龙凤翔按这九条乡约邀约27户受灾苗民，根据田土受益面积，集资合伙，开始了牛家堰筑坝凿渠工程。他们从贵矿汞矿请回一个苗族矿工，仅凭一根竹竿，测完了担水江水利配套工程所过之处，辛勤作业，并亲率苗民艰苦施工，于1904年完成了这项凤

鳳县开天辟地第一大工程。水渠从牛家堰延伸至唐家桥，长达5华里，整个水圳配套工程由一条大坝，一条长圳，九个山塘组成。一座大坝，即担水江拦河坝，从清基处至坝顶高九尺，坝长3丈，坝宽两米余；一条长圳，包括主圳和上圳四千余米，其中破岩山两处，挖土坡两个，砌岩坎造圳3处，20余丈，架木视石板视十处数百米。

九个山塘，有团鱼塘，上大塘，下大塘以及后造成的沱田的六个小塘。

水圳过了三个大户的“龙脉风水宝地”，淹了一家人的水碾，过了四户苗民的屋场坎地，自然是磨破了嘴皮。竣工后灌田340多亩，龙与受益户商订理水公约，刻碑立石，为鳳凰县修塘灌田之始。水利竣工不到两年，灌区内又造水田192亩，基本使当地唐家桥多荒地的外貌得以改观。

二、修建油坊水碾。苗民缺少文化和科学技术，自古以来碾米榨油都采用碓捣磨推的办法，十分费力。龙凤翔是个有心人，早在19岁赴省会试途中，他就考察到了汉区的油坊、碾坊和磨坊的先进用途，下决心仿造汉区开办各种作坊。1884年，他从辰溪请来一个油匠师傅，帮助筹建油坊，推广了榨油技术。以后，牛家堰担水江水圳修通，他又把这项技术与水利资源更好地利用起来，联接“水打鼓”和“搅笼”两种设备，创造出需水少，转速快的作坊，并将这项技术无偿传授给方圆百里苗寨，先后亲自勘测和指点不少苗寨在担水江、龙塘河、鸟巢河修建油坊12座，碾坊25座，磨坊2座，有些作坊，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三、架桥修路。由于国民党政府压迫和民族歧视等原因，苗民们多居住在高山陡坡之间，沟壑纵横，逶迤泥泞，“行人病涉，不胜惻然。”为使乡民能“旅行乡农，攸行无滞”，畅通无阻，龙凤翔在“要津”之地，“河狭水浅”之处，架桥修

路，木桥易毁，改石桥，桥墩难立，改铁桥，因工程浩大，用费颇繁，帐独立之难友，思众擎而易举”，他寄望并发动民众“自行携资相助”，“玉成”大功。在修路架桥时，他撰写了15篇碑文，充分反映了自己发动苗民修桥补路的指导思想、奋斗精神和有效措施。如他的《担水江石桥序》写道：“担水江，虽小通。向有木柱板桥，历历倾颓，族权林富易木为石，以期永久。民国癸未，大水横兴，石堞仍颓，迄今十有余年，行人病涉。每念及此，不胜惻然，爰拟重修，有志未逮，故连年节储，延至庚辰。又得工师赞成，始得兴工。詎料兴工之后，承各父老自行携资相助，不期月而告竣，实诸君玉成之力也，谨述事实，而为记。”由于他的恳切热情，大得民心，人们踊跃参加他发起的这些活动。据不完全统计，由他发起修筑的道路有三条，桥有10座。这三条路是：唐家桥通往落潮井的石板路；唐家桥通往大兴场的沙石路；唐家桥通往阿拉的乡村大路，共计20多华里。10座桥是：唐家桥、耙耙桥、紫玉庵石桥、连升庵石桥、岩刺窝拱桥、担水江石桥、龙塘河明务木桥、马颈坳铁链桥、忍务流滚木桥和禾梨坡石桥。这些桥现在均还在为乡民所用。

四、兴办学堂。辛亥革命后，湘西大部分学校停办，文化教育长期衰落，除少数人出外求学外，大部分子弟无缘入学读书，尤其是苗区子弟，更谈不上受教育。作为苗区最后一个“款首”，最后一任“团总”，龙凤翔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为了使本民族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摆脱“蠢苗”的辱称，提高苗民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他自己出钱请来教师，教授乡里子弟念书，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四十人不等。学生学习科目，启蒙时为三字经、百家姓、四书、声律启蒙、千家诗、幼学等。1936年，苗族人民先后派出代表到湖南省城请愿示威，要求兴办苗学，省政府不得不在所里（今吉首）创办了湘西特

区师资训练所，从湘西各县招收百人，毕业后分别回到本地兴办特区短期义务小学，对苗族子弟进行免费教育。1937年，龙凤翔所办私塾才得以转为特区短期义务小学，教授学生学习国语（包括常识）、公民训练、算术、体育、音乐、美术、劳作等学科的知识，成为唐家桥第一所正规小学。

以后，为使自已兴办公益事业的传统得以发扬，他把自己早年免费收到家塾的得意门生和其他“款中”名人组织起来，成立“春酒会”，即每年新春聚会，总结旧岁地方公益事业发展情况，研讨新岁发展地方公益事业诸事。另外，为保证地方安宁和公益事业能够顺利进行，他还把“健壮子弟”组织起来，成立了民族自卫队伍，有选择地推荐合格的人才，参与管理苗区。下中营土坤吴宗清，在奉命兼理唐家桥土备时，带兵巡疆，惩治劣匪，英勇果断，执法公正，先后两次迅速使清土匪谋财害命案件，杀匪除恶，人皆称颂。龙凤翔为他专呈保稟，苦口婆心地说“闾营之安危”、“国家之治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使吴宗清受到重用。

在军阀的苛捐煎熬下，在官僚土匪的残酷压榨下，苗区生产长期无法发展，生活无力改善，苗民们“小儿无衣裤者，十居其二；卧榻无衾褥者，十居其六；衣服褴褛者，十居其九；鬻卖子女者，其事尤寻常。”匪盗出没山道，活动频繁，而唐家桥附近“合款”的48寨却比较安定，作坊发展迅速，桥路维修良好，水利系统不断完善，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办学风气较浓，与附近的苗土相比，它较为富裕。这一切都与龙的努力分不开，因而，苗民们对龙“愈尊重之”，称他“如水之清，如玉之素，立德明行，克昌厥后，声没名存，休声载路，付洁贞珉千秋之秀。”（见滕凤藻《端敏先生龙凤翔石表》）连官府也不得不承认龙凤翔是敢于“侃侃言地方利害事”苗族首领，是“尽力提倡地方公益事业”的苗族名人。

## 长沙民间婚丧习俗琐闻

朱运鸿\*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在嫁娶、丧葬方面，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气。旧社会长沙的婚嫁仪节，最重媒妁之言，先由媒人经手“发草八字”，二步“合庚”，三步“拔庚”，以至“过礼”、“铺房”、“陪媒”、“接亲”、“合卺”、“分大小”、“闹新房”、“回门酒”；到“下厨”、“谢礼”等才算完姻。

丧葬，更觉复杂，分金葬、木葬、水葬、火葬、土葬，谓之“五行葬”。听说少数民族中个别地区还有种“鸟葬”等等不一。只就长沙市而言，关于嫁娶、丧葬事务，就牵涉了一连串的封建迷信，繁文缛节的东西。过去，有钱人家，凡是做过官，或发过财的，虽然家道中落，但遇上嫁娶、丧葬，总看作“大事”，为了炫耀门第，即使把剩余产业花光，也要办个热热闹闹的场面来。因之婚丧仪式越搞越大，花样越多，而为它服务的行业，也就应运而生。

建国后，党和政府提倡移风易俗，嫁娶也好，丧葬也好，旧的形式全部废除，嫁娶改为集体结婚，丧葬改为火葬、公墓，此一改革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为婚丧服务的行业，也多默默地被淘汰了。笔者隐居湘城达六十年，耳濡目染，回顾过去，征集史料，记之于文字，使能体现旧的落后，进入新的文

\*朱运鸿老人在长沙生活数十年，对民间的婚丧习俗颇为熟悉，本文系他根据记忆和传说整理而成。

明进步的过程，藉供读者参考。

### 婚姻由陈腐趋向进步

婚姻，首先由媒人略得到双方家长同意，用红纸贴书上男方生庚，拿到女方叫做“发草八字”，女方认可，则回女的生庚，两方经研究妥了，这一手续名为“合庚”假使男方不中意，须在七日之内退还。俗云：“男八字满天飞，女八字一七归”就是这个意思。合庚好了，再把男女文言上为乾坤两造生庚，写在红绿庚书上，规订男红女绿，两方取据为凭叫“拨庚”，男锁女方金银首饰、鸡、鱼、肉之类为“订婚”。要办理结婚时，先央媒人示意女方，择定日期，男家将新娘衣服财礼送到女家，叫做“过礼”女家便把妆奁物件送入男家陈设洞房，谓之“铺房”，男家再用轿子接“月老”又称红叶先生（即媒人）吃酒席谓之“陪媒”。这位月老还有个权威名称叫“大掌判”。双方在疑难处，由他裁决算数。处在疑难中他两头梭搞吃，俚语叫“媒人吃廿四台”好象理所当然。到吉期日，八人或四人抬一“金花诰封”绣花轿子，前面走的是一对大号鸣呐，鸣呐开道，跟随是小孩穿红衫提绣花灯的叫“子孙灯”，后是旗、伞，继之锣、鼓、唢呐、钹，叫“小乐亭”周围扎红彩抬着走。也有用两把日月招阳扇的，吹吹打打前往迎新娘叫“接亲”。花轿抵男女家，有人挡住大门要包封叫“把关”，新娘接来男家，先设香案，礼宾喊“迎喜神”，礼毕，媒人再开轿门锁，女侍者（亦称伴娘）将新娘搀扶出轿，拖红毡，新娘足不履地，进入洞房脚不踏门槛，新夫妇交拜，坐床沿吃“交杯茶”，点一对龙凤烛，一人唱赞歌：“两支红烛放光芒，照得洞房亮堂堂，照得二人情意好，照得福寿万年长，照得鸳鸯成双对，照得龙凤结成双”。此一幕叫“合卺”。再者拜堂行“庙见礼”（即朝见祖先主位）礼宾读喜文告祖，有时

礼宾假意读不出索包封，叫“润舌”。轮班辈互相见礼为分“大小”，拿金银首饰钱钞给新夫妇为“献礼”。是夕，亲朋戚友看新娘，新娘新郎抬茶吃，谈笑无忌，如赞茶歌中有：“郎不高来姐不低，天生一对好夫妻，今晚洞房花烛夜，玩耍泥鳅拱草皮”逗人笑得前扑后仰，主人欢喜。拥入新房叫“闹新房”一入放鞭炮唱歌曰：“一拍房门喜连连，一心爱看好妆奁，一年好景君须记，一圆和气子孙贤。”二拍房门不住停，二姓欢喜结朱陈，二人恩爱如山重，二乔美女出名门。三拍房门好江山，三战吕布虎牢关，三顾茅芦诸葛亮，三国兄弟刘关张。四拍房门连四声，四郎番邦去招亲，四明山上来保驾，四海为家结弟兄。五拍房门好香椽，五马山寨闹翻天，五关斩将关夫子，五百年前结姻缘。六拍房门荷芳芬，六郎兴兵破天门，六出祁山汉丞相，六十花甲传乾坤。七拍房门果菠萝，七夕牛女渡银河，七步吟诗曹子建，七壁（谐音赤壁）游湖苏东坡。八拍门房美罗裙，八虎（即唐伯虎）探娇假卖身，八皆（蔡伯皆）会试中榜首，八纛重义结友昆（即兄弟）。九拍房门是紫荆，九牧兄弟甲子林，九里仙师好新梦，九眷六亲看新人。十拍房门凑十全，十年身价凤凰池，十载寒窗挑铁砚，十（谐音识字）义韩朋会团圆”。三朝女家接新郎新妇叫吃“四门酒”所谓三天回门，四天转脚。新娘在男家已熟习现状，在新婚三天内还要入厨房拿桃、筷、锅、盆等厨具叫“下厨”即做饭，唐诗有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一人唱歌转新妇手曰：“刀切九根葱，多子又多孙”即是一例。婚事之后，要请帮忙的吃餐席面为“谢礼”还要送礼谢媒，才算完善。到民国初年，城市民气已开，男女有自由恋爱，双方经父母同意，不须三媒六证了，只觅要好亲友作介绍人，订立婚约，交换戒指，或其他物件作证。举行新式结婚礼，改乘生花轿子，仪节革除旧式，大为简单。有的多在酒楼、旅社或公共场所举

行，门前悬旗结采，厅堂设礼案，由司仪人喊程序，放鞭爆，奏乐，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新郎，新妇男女宾相以及来宾，均有一定席次，首由主婚人宣读证婚颂词，然后，新人交换饰物，在婚书上盖章，新夫妇互行鞠躬礼，乃谢主婚、证婚、介绍人和男女宾客，并致答词，谒见长辈亲友，摄影赴宴，新式结婚三十年代初，也办过集团结婚，参加者很少。当时只局限于城市，乡村多未实行通，仍要坐花轿，行庙见礼等旧习。到抗战后才逐步消失，可见嫁娶仪式是由陈腐逐步趋向进步的！

### 丧 葬 习 俗 话 旧

旧社会民国前后常见街头有出殡，大出丧的行列，络绎于途，有的行列绵亘长达数里，当然这是指达官巨富之家，一般是没有的。大出丧如同办城隍会，热闹得狠，两旁行人一看就得半天，街道又窄狭，有时水泄不通。在长队最前列，是挎盒子炮的军警，每人挂上一条毛巾作前导，后头为正式仪仗的大型队伍，有纸扎的老虎，有仙鹤童子，紧跟两尊用板车载着丈多高的纸扎神像，名叫“开路大神”传说是封神榜上的两兄弟方弼、方相。接连四人抬的“铭旌”亭，上写亡人官爵禄位，享寿多少，由名人题字。清末还有四人抬一座“浩封亭”周围画有龙凤彩色，此亭民国之后不用了。随后，封建王朝所遗留的全副执事，銮驾等还保留着。执事人穿着有一定的讲究，兰缎袍、红缨帽、青坎肩、灰套裤、青云头靴，夏天穿官纱长袍，戴凉帽或荷叶帽，扇、伞、锣、旗各有八对，官显牌（即官衔）四块，肃静、遇避牌两块，后面背蟒鞭童子四人，戴红，黑坨帽，一名童子背令箭袍，穿青裤褂、红裤、腰锣一对，吹鼓手一堂八人，和尚十三人，穿袈裟，前一僧敲木鱼领认，跟随合十诵经，唸往生神咒。还有用彩棚一堂八人，

提香炉、盘香各一对，官衙灯一对，日罩小伞三把，一队十二名鼓手，红号衣、持手鼓，鼓下边饰黄色栏杆，后面八人或四人，抬一绿呢官舆，又叫“神轿”，轿内坐一少年捧死者灵牌，轿夫穿兰布大褂，套青布围裙镶白边，白大布袜，快鞋，挂条布巾缀丝缘，轿前一引导，拿把木尺，走到人多的十字路口“打轿”，由引导指挥轿夫行走步伐快慢，“兜圈”左右偏摇、“倒退”玩五六个花样，博得观众喝采，丧家高兴。做官的人家后还有跟八把“万民伞”，一座“香炉亭”，四人抬是古式白铜鼎，香烟氤氲，鼻嗅芬芳，还有雇用一棚尼姑吟经的，手持小木鱼，喃喃不停，边走边诵。又有穿绿色黑边圆领绣花道袍的道士，吹打乐器，多为十八人，取十八罗汉之义，前二人执“招魂幡”“撞钟子”带头唱《劝幽文》，后随一人骑纸扎的“叉子马”身背印盒，内印一版文曰：灵宝大法师印。还有儒教（即行文公礼）一堂，礼宾先生计二十四人，名为二十四路诸天的意思。戴平覆冠，穿青颜色白领白袖长礼衫，云头靴套白袜子，前二人一持“功布”一持“云裳”后跟各持一件乐器，读《朱子浩》，一人骑匹纸扎的“驛传马”。也有的人家把吊客送的祭棒、挽联用竹竿撑起招摇过市。到了民国年间，又时兴赠送花圈，书写一句吊唁话，不久改为一个“奠”字，一路甚至有几十百把个。再后面就是“孝棚”孝子由仆人搀扶着，手提蒲墩给孝子跪拜呼谢，谢沿路族鞭爆、摆路祭的。执事即送一条白毛巾为“发白号”作谢意。跟着即是灵柩，抬柩的有用十六人，三十二人，四十八杠的，六十四杠的，甚至一百二十杠的不等，灵柩前拖有两块“迎”字牌引路，分左右边，拖十数丈的白布，尾端扣在“龙头杠”上为“拖丧”，又叫“执紼”送葬的身着白长服叫“号衫”亦有胸挂白兰色纸花的，或青袖圈，最后则为孝亲女眷的官轿，或马车，多的有几十乘，锣鼓亭压后。要完全说清出大殓的摆场，此说

仅够一半，只拿佛事的儒、释、道三教而言。场面只点缀而已，实难尽述！道是长沙过去有关大出葬的史话，顺便叙述几则，也知梗概。民国五年，授功勋一位，陆军上将黄兴（又名克强）于十月三十一日病逝上海。时隔八天，即十一月八日，勋一位上将衔，陆军中将蔡锷（又松坡）病故日本东京福岗医院，遗体旋即运归国土，黄、蔡二将军皆系湖南人，由沪同运长沙，根据当时民国政府，大总统黎元洪颁布的国葬法第一条是这样规订，中国人民，为国家立有殊勋，身故后，经大总统咨请国会同意，举行国葬，这二位将军一个是创造民国，一个是再造民国，是湖南人的骄傲，两将军遗体同葬岳麓山。出殡那一天的热闹场面，可想而知了，不过，笔者尚是孩童，不敢妄谈，一事是值得提及的，据老人回忆，蔡锷当年在北京有段艳情雅史，他为了避免袁世凯猜忌，当出入勾栏院，与一叫小凤仙的名妓，情深意合，此时听到蔡锷之死，痛不欲生，在悲痛之下撰一挽联付来长沙，联曰：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此联挂在蔡锷墓庐，蔡的遗像旁，后来长沙几经兵祸，不知出向了。

民国二十年春，红军反国民党第一次大“围剿”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劝他投降，坚持顽固，被红军斩决，将头颅钉在木板上，书张辉瓒之首。由赣水上游流下，经国民党军队拦截后，配一檀木身驱运来长沙，在鱼塘街消防队内，开追悼会，葬岳麓山，修有坟墓。再有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宁乡人，死时，他的妻妾沙夫人，在悲痛下坠楼身亡，两人同时出葬，也是在鱼塘街开追悼会的，与张辉瓒出葬场面大致相同，仪节摆场盛况空前，仪仗行业“行头”几乎全部包揽，无所不有，祇讲前面走的军队，有陆、海、空三军和马队，灵柩用的火轮过渡，湘江两岸扎有彩牌坊，鞭炮之声不绝于耳，两丧

用费计上万元光洋。说到此处又要志一桩事，由于鲁涤平家庭出身地主，自己又是军阀，官虽然做那么大，对家乡地方上，毫无一点情谊，传说有这么一回事，宁乡土特产出茶叶，猪产量丰富，路运艰难，多以宁乡的“乌江”帆船藏运，来长沙无码头靠岸，看了省主席是家乡人，请他设法搞个码头，岂料鲁涤平全不理采，使说情的碰一钉子，愤然而去。因此，家乡人听到他死了，要埋葬鲁氏祖山，必经过一座石桥，连夜把桥拆掉，数百农民站立桥端，不许通过，硬有搞得农民赢，只好在桥下开临时道走，至今老人谈起此事还莞尔而笑。

### 为 婚 丧 服 务 的 行 业

长沙办红、白喜事，涉及的行业很多，有仪仗行、酒席馆、轿行、生花圈、中西乐队、扎彩铺、明瓦彩棚、茶担、杠行、纸扎店、白货号、租货号、小货铺、京彩局、棚铺、刻印局、打纸庄、香烛铺、清音乐队、主位店、军乐队、棺材铺、寿服店、堪舆先生（阴阳生又名地生），计二十余行业。

仪仗行业，专供人家婚丧喜庆事临时租用，故名仪仗行，长沙大火前，共有七家，吉庆堂在尚德街，鸿庆堂在鱼塘街，荣华堂在万庆街，端福堂在史家巷，双庆堂在北正街，湘庆堂在清泰街，广福堂在樊西巷。该行租给顾客的业务方面的有旗、伞、执事灯彩绣货之类，一概俱全。

国乐队：是我国传统音乐，乐器有鼓、钹、笙、箫、瑟、锣、唢呐、大筒、胡琴、笛子等。旧时为清音堂，继古代教坊的遗意，为妓女学唱堂戏，或出堂度曲，设在樊西巷内广福堂、清音堂（又名清音社）。自国乐业成立，分为兼善和七柱两部，会址在黄泥街。清末光绪、宣统年间，为抚、藩、臬、学及首府两县，长沙县、善化县各衙门供应吹打，叫“供差”。民国后供差已废止，但从事业务会员增多，民国二十二年长沙为

市时，马国钧呈报市府，划分码头，地段营业，在政府备案，不得争执。

茶担业：常与仪仗业联营，不设门面，但不属茶居业管，又不摆茶卖，专供婚丧喜庆之用，一只烧开水的红铜茶桶，可盛两三担水，出租茶盅、茶壶、插钵（插姜用的）等。旧时还有白铜水烟袋，杆长一米，可伸缩，专侍候客人吸烟，又叫装烟，后来因碍卫生也不文明，故而消灭了。今日若发现长烟袋，也要算文物了。

寿服店：也可说专是为死人服务的行业，首先都设在东区箭道巷、游击坪、鱼塘街一带，起初规模小，所售仅寿被，鞋帽，陈石灰，石膏装衬之殓葬物。嗣后，长沙人对治丧趋于讲究，多重排场，且备办各物，手续既繁，亦不完善，故被一个叫李次青的商人看到，此业大有可为，遂创设长生乐寿服店，兼营寿枋棺槨，于鱼塘街，凡关于丧事用具应有尽有，无不完备，是个前店后坊颇具范围的店子。清光绪二十九年，湖南抚督端方，他岳老太太得病，请盲人推算“八字”问寿元，说：“运行此处有一关，好比盐船下陡滩，若得艘公把舵稳，平安而过也无妨！”推理正走壬癸水，当年太岁戊己土，土克水犯有凶灾之厄！幸遇甲乙木星化解，最好备一棺材，便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而这位端抚事对岳母颇顺，亲自到长生乐店，定购一副楠木棺材。老板李次青见是抚督光临，毕恭毕敬地奉承一番，事也巧，不久这位老太婆果然康复，端方便送他一首对联曰：“斫削成材，为人世到头事业。经营有术，尽生平结果文章”。一时传闻，取到了宣传效益，长生乐业务更加兴旺，后来据闻于孙不力，家业衰颓了。

轿行：是往日没有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而设的，其工具为“肩舆”俗称“轿子”这里要说的轿行，是专指结婚用的彩轿，也是仪仗行的俗称，彩轿从长沙来看，已消弭有四十多

年了。结婚由坐轿子到坐汽车，体现社会之文明进步。早年彩轿是八人或四十抬，蔑木而成，外罩大红贡缎，绣龙凤花纹，装彩色玻璃镜，轿门绣“荣华富贵”“金花诰封”等四字。还有绿泥彩轿，接上亲、高亲（即母、嫂）送亲用的，现今要看到实物“着难”。笔者前年旅游，在石家庄看到演《红楼梦》影片中的复制品。轿行兴起在长沙约于清道光年间，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打开南京，湘军掠抢到的金银财宝回家，风靡一时。轿行不但有原来的“镜轿”（又名“官轿”）、“大轿”出租，还有如婚姻事备有旗、伞、执事、官灯、条盒、花灯、桌围、椅披、花屏、香炉、碗盏、瓷铜锡器等出租。万庆街姓李开的荣华堂最有名最好，这些物件价值万余银两，来租用的按月计算，租用一日，照码算价。用两日照码加倍打八折，用至六日算到五折止，后来改彩轿为生花轿子，与汽车出租，到抗日时1938年，文夕大火，荣华堂付之一炬，再未出现花轿了，四十年代尚有生花轿子的残存，建国后完全绝迹了。

杠行：专为丧葬抬灵柩，又叫“轿行”，清末光绪时长沙仅一家，在西长街水来庙，牌名文公杠行取戴国文公行儒教礼的意义，杠夫力资原本有定规，官府立有案，为衙门打差，受保护，杠伙多系街坊贫民苦力者。清末民初，起过变化，高唱“革命”调子，废弃定价，还有横蛮不讲理的行为，杠行打听到富有之家，老人得病，先将绳索（又名袍索）暗地放在其家的大门角内，如果其家人死了，只能由他们抬柩，要多少就得给多少，其家病者好了，也要“压灾”钱，有如此霸道，人们反映到当时的市商务总会，虽经劝导未得要领，依然如是，被慈善公所看不下去，在皇仓后街，另行组织名叫兼善堂杠行，营业上含有慈善性质。贫苦人死了，抬棺不取钱，兼善杠行设备开支，人力来源概归慈善机关经营管理。所以价银公道，而文公杠行受到冲击后，也就省悟，收敛，仍复合理定价，亦视

丧葬家自由选择，再不要流氓手段了。杠行到北伐之后，工商界人士饶菊生，兼营的鸿庆堂仪仗行，附设出租丧葬棺罩，他在北平学来大杠改“龙头杠”，分双龙头、单龙头两种，全部红白铜镶嵌，光彩夺目，威武壮观，又出租幡龙绘凤，花鸟虫鱼的棺罩，成为长沙大出丧别开生面。

### 建国后民间婚丧习俗的变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倡移风易俗，首先在男女婚姻问题上，颁布了《婚姻法》，婚姻自主，双方同到各级政府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书，才为合法，取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枷锁禁锢，从而由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以勤俭节约原则，号召婚事新办。1953年元旦，长沙市人民政府，责成中国人民救济总会长沙市分会，举办了我市第一届人民集体结婚，礼堂设在市政府大礼堂，由阎子祥市长、尚子楠副市长主婚，参加集体结婚者，有二十对新夫妇，堂内红烛高烧，鞭炮齐鸣，乐队高奏《社会主义好》的歌曲，仪式非常隆重，由正副市长亲授结婚证书，并一同摄影留念。前来祝贺亲友，每人还发袋点心吃，只收婚家二元钱手续费，因政府带了个好头，树立了新的风尚，群众反映良好，自后由市救济分会每年在元旦节、五一节、国庆节，借欢度节日机会，举办集体结婚，简直成了律规。直到1957年，救济分会并到市民政局以后才停止。先后办了十多次，至今犹为市民所称道！

其次，丧葬的习俗，人民政府更为注意到了，在嫁娶改革的同时，对丧葬实行重大的改革，市救济分会首先成立了丧葬事务管理委员会，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重视下，派人到汉口姑嫂树，参观学习日本人所建的火葬场规模，回来后，觅到南门外金盆岭，筹建火葬场工程，人生规律必皆有死，死后必葬，提倡火葬好处很多，大大节约了土地和木材。火葬场落成

之后，当时还组织各区、街居民委员会派居民代表前往参观，扩大宣传做到家喻户晓。随后又在南郊烈马回头、石马铺，和北门外洪山庙，以及对河望麓桥等四处，辟有公墓，又将兼善堂接收过来，改为殡葬队。1957年，市民政局，成立了“长沙市殡葬事务管理处”于建湘南路，统一管理全市殡葬事宜。近年来火葬场又修建一栋大型殡仪馆，有礼堂，遗体室，骨灰寄存室，汽车停放处，和革命陵墓等设施，沥青马路，树木成荫，鸟语花香，幽雅别致，有蓬莱仙境，临离撼地之感！从而人民政府，把中国数千年来，民间嫁娶，丧葬旧习加以改变了，人民无不称善。但近年来，结婚要什么“四十八只脚”的新式组合家具呀！彩色电视机呀！双箱冰柜呀！各类名堂，层出不穷！乡村亦复是，酒席、财礼之用费达几千元或上万元，据说首由介绍人带到女家相亲，不管成不成功，要拿“看钱”“茶钱”，动辄出手一张票子（即10元）或十几张不等，若双方中意，请女家属用餐“落实饭”，每人赠送一段料子，或鞋袜才算定局。结婚要用出租汽车，扎彩球，一切馈送财礼与旧时不但不会少，有过之而无不及！导致交不出财礼，逼出了人命者有之！结婚后，亏一身账者有之！弄得家庭不和者有之！才入洞房又入牢房者有之！

丧葬的旧习也冒出来了，城市死了父母的，明知政府一再提倡火葬，好处很多，但为子女遗属者还要千方而讨偷偷摸摸用棺材送下乡去土葬，预先派人到乡下安排人挖“墓穴”还要做道场，唱夜歌子，馈什么“谭四甫”（即死了人的套俗）或者大开筵宴开吊，唱花古戏，烧灵屋，化冥钱，大办丧事，实行土葬，旧的一套陋习又死灰后燃了。

# 我所知道的湘潭烟业行业习俗

廖瑞星\*

湘潭在香烟未行之前，人们多吸水烟，故当时烟店所经营的都是条丝烟。因此本文所谈烟业，只限于条丝烟，不包括卷烟（香烟）。

## 烟丝业的由来及产地

清乾隆丙子年（公元1771年）《湘潭县志》（吕正《》）卷三十二物产志开始有“蔦叶”的论载。清乾隆辛丑（公元1781年）《湘潭县志》（白璟龙卷39“风土”下“土产”中记载：“俗称蔦叶，山种曰山蔦，田种曰田蔦，产河东者，有红片、白片、土人种蔦之户，谓之定山，秋后成捆发行。”

1951年《中国土产综览稿》下1载：宁乡湘潭烟叶——总称宁湘叶。宁湘叶可分白叶、红叶二种，白叶按其成色可分金黄、谷黄、漂白三种，此三种是三伏天（六月）摘收的，品质最好为上等烟，伏晒中次品为中等烟。秋叶和脚品质均劣于白叶，白叶含油量少、味淡、色淡黄，90%用于卷烟，其色深黑者，则参加烟丝中。红叶则色味俱浓，油气重，产量少，仅供本地农民食用，甚少外运。湘潭烟叶也分白叶与红叶二种，白叶最少，其品质用途与宁乡相同，以湘潭九华庵出产最出名。湘潭烟叶产于霞湾、马壕里、和尚岭、七里冲等地，主要产地分布易俗河、黄龙、姜禽等地。

●廖瑞星老人在湘潭市生活数十年，本文根据传说和记忆写成，

烟丝的来源，以福建为最多，故烟店的招牌，多加上“福建”字样。其实，烟丝来源不只福建一地。江西盛产的谓之西烟，广东所产的曰广丝，本省所产的谓之土烟。土烟中以出郴州者为上品，而产于岳麓山附近称之曰“云盖烟”，为下品，只能销乡下。四川所产的，谓之“金堂烟”，当时颇为时行。

据有关资料记载，湘潭约从1926年至1928年，全市最著名的烟庄有广大、赖仁和、和恒大，最兴盛时期约有职工1000余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烟庄48个，雇有一、二个工人的夫妻商店约有二十多个，雇有三人以上的个体小资本者约有20多个，1956年对资改造成立南区制烟社，1959年改为南区制烟厂，厂长王德荣（现为中山街道大码头居委会调解主任）。1962年成立湘潭市制烟社，正式发展机械生产，1961年收回到市手工业局，1964年正式由市烟酒专卖公司接受而结束。

### 湘潭烟业商工两般合编条规

（一）琢工定式。各色烟庄有格多格少之分，有清格不清格之别。每包烟以连纸十两为则，逐一附列于后，此式既定，如有紊乱，任东改其非。

（二）日常工。春分后每日八点钟起作，六点钟休息；秋分后每日九点钟起作，五点钟休息，以示整齐。如钟点到时，偶有因事因病来曾起作者不拘，倘故意延烟，任东记过。

（三）早晚有时。早晚工作视阴阳长短，天气炎凉为变通，故夏不作晚工，冬不作早工，三时只作早工。倘店东急需货售，照常息工后，另加工夫三小时以备缓急。每月以四次为率。早工自日出时起，晚工以二更为度。

（四）按给工资。点包、长年工资，每半月一结，东无拖欠，工无长支。惟意外急需，可随时变通商支或因缓急相济。长支不还甚至忿讨停烟及背逃横骗各情，任东投凭工董，扣留

行永不在潭佣工，倘若知情故请者，应问该店东垫偿。以杜背骗而防包庇。

（五）考工优劣。工艺有优劣之分，店东有考察之权。凡工琢之烟，任东与店伙随时考察分别，或另给奖以资劝戒。然奖资不得与工钱相涉，店东不给奖者听便，惟考察失当，难以服众，反滋议论。考察者当一秉至公，以昭慎重。

（六）停工旷废。口角是非，主雇在所不免，尽可请凭商工两界董事或街团理论，不得动停工琢，旷时废业，激成事端，违者重罚。

（七）暗夺抢请。工经请定，他店不得暗相雇夺，该工亦不得背旧投新，如违，均当处罚。

（八）开请限制。凡请定长年，非点包可比，除有滋事生端，旷工废事等情可以随时开退外，平时无故不得开退。纵生意滞钝，减人必须逢五八节期方可。若节后辞退，陷下家莫找，失业抛工，累害匪浅，在工人亦不得乘工夫紧急，故意逃避欺卡店东，如有此情，潭城不准雇请，至请零捆，不拘一捆二捆，开退时总以捆完为断。

（九）捆完留滞。凡烟捆未完，无论主雇不洽或逢节期开退，必自脱完，毋许留滞，或平时患病及有事请假，任东调人另做，以济销场，又有成捆或油水失宜或沙多难刨，均须自错自整，不得假故规避，即实有事耽擱。须托同事代脱，不得将捆延搁，致限有损伤累亏东本，违者处罚。

（十）银钱照市。凡给工资，钱色照市面退用花边，扣时价加算，毋得高抬以滋议论。

（十一）互相董正。工般旧规甚严，倘有不法等情，一经查获，店东鸣工董事，轻则处罚，重则开退。而店亦贵和平，倘有礼相接，苛刻太甚之举，该烟工可鸣商董处罚，以杜纷争而联主雇。

(十二) 烟工价目。烟工分长年、点包两色。迨因维持烟业保全市面起见，爰按各色烟包经凭团保从优酌加作为定章，另列如下：

长年薪水凭宾东面议若干，落地为凭，按月支用，外加议客师徒弟捐钱入祀，仍照旧章二千四百文。计开各色烟式工价外，每天给酒钱肆文，歇工不给；盖包挂牌烟，盖面清格十六格，每包工钱贰拾贰文。盖包攸庄烟，盖面十六格，清捌格，每包工钱贰拾文。头庄丹桂烟，攸庄十四格，码子十二格，每包工钱拾捌文。盖面十四格清四格，每包工钱拾玖文。二庄丹桂烟，与头庄丹桂同式工价与头庄丹桂同例。码烟，码子十二格，每包钱拾肆文。盖面十四格，每包工钱拾伍文。

宣统元年四月十五日公立。

以上条规，从清末民初到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虽受历史局限，但对当前深化改革，加强企（商）业管理，不断修改劳动定额，搞好承包，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 烟丝业的行帮与其他

同业者曰行，同地域者曰帮，故一行中又分为若干帮。在清咸年、同治以前，湘潭经济仍不甚发达，在商业方面来说，大多数是夫妻商店，小本经营，而且以江西人居多，江西会馆设在现在的平政路豫章学校，除烟丝业外，还有更大的行业便是药材行。传说这些江西人的祖辈多半是明初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西大战时逃难来湘潭的，他们在湘潭占据拐角，做起生意来。因当时湘潭街头流传有“江西人一把伞，走到湘潭当老板”和“江西人恶又恶，走到湘潭占拐角。”的俗谚。他们在湘潭时间既久，子孙繁衍，加之亲邻相招引，人数渐多，以致城乡四处皆有。

行帮有建帮，为福建人，以赖姓者居多，如本市之赖仁和

烟庄。西帮为江西人，如本市之广大烟庄、恒大烟庄等。还有娄底出产之“娄底烟”，为数较少，而本地人所开烟庄则更少了。

烟丝的配制各店不同，名目各异，种类极多，可从图记分别如下：

（1）有图记，黄漂色，纯系建丝，色香味都好，最为上品。

（2）有牌号，粗红色，多半为西烟，香味也好，为次等。

（3）无牌号，属普通杂色烟，质量较差。

烟店兼营建元，建桔饼、建茶、建面、槟榔、烟刀等物，因福建土产，藉以衬托门面。货既行销，遂成惯例。同时，还兼售茶叶，如攸县的名产“珠兰茶”，即全都由烟店经销。

后来香烟行世，对烟丝业的影响颇大。不过当时香烟价钱高，非富贵人家不能有此。故在民国之初，烟丝还很畅销。

另外，当时还有所谓“卖水烟”者，其人身带烟丝，持一特别长大之水烟筒，并行于戏院或众人丛集之地。喜庆之家，亦有每临时招引之人，装烟点火，专为瘾君子服务。因此从事于此者多为无赖懒汉，故为社会所鄙贱，不为正业。

## 黄埔军校有多少分校\*

王 玲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与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队，挽救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国而创办的，1924年6月16日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开学。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发展，1925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征克复潮汕后，在潮洲设立了黄埔军校第一所分校，后又相继在南宁、长沙、武汉创办了三所分校，分校校长一般由黄埔军校本校校长蒋介石兼，分校设正、副主任主持校务，其组织机构、教学体制、教学内容等基本上与本校相同，校名亦根据本校校名的变更而几经改称。培养对象为招考的学生与现役军官、军士（即学员），学制一般为学生一年至一年半，学员三个月至半年。培训的兵种有步、炮、骑、工兵及经理、政治等科，为实现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随着国民军的北伐，1926年12月潮洲分校结束。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在军校实行反共清党，军校遭到摧残而改变了性质，南宁、长沙、武汉分校因此而停办。嗣后国民党中央禁止各军自行创办军校，将各军军校改组，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此为黄埔军校迁南京后的校名），至1943年军校接收改组了南昌（1929年7月结束）、广

\*本文系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州、昆明、南宁、均县、乌鲁木齐等地的六所分校，恢复了武汉、长沙(1939年下半年结束)分校，增设了洛阳、成都(后迁江西瑞金)、西安分校。抗战期间设在洛阳、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宁、西安、均县、乌鲁木齐的分校，更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至九分校，招收的学员生分为入伍生、甲乙级生、学生军、军官训练班、军士教导队及高级班、普通班等，按培训对象的文化水平实行分科、分级教育，另开设了战时补训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等多种类型的短期训练班适应战时需要。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军政机构调整，除乌鲁木齐的第九分校保留外，其余各分校均裁撤，到1947年3月第九分校亦结束。自1925年3月至1947年3月黄埔军校共开办了十二所分校，毕业学员生约17万余人，其中女生1100余人。以下按各分校成立的时间简介其历史发展。

### 潮州分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是黄埔军校开办的第一所分校，创办于1925年3月，是为给随同第一次东征进占潮汕的军校第二期学生补习课程而开设的。1925年5月23日因奉命返回黄埔本校，分校即停办。同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复底潮汕遂恢复了潮州分校，校址设在潮州城内李公祠，12月10日蒋介石任命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为分校教育长兼代校长(1926年何调黄埔本校后由邓演达继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分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5月后由何玉书继任)，校部设政治部及副官、军需、军医三处，12月18日正式开学，其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参照黄埔本校，至1926年12月潮州分校共开办两期。第一期系学员队，由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及独立第二师下级军官组成，1925年12月23日开课，1926年6月1日毕业，共348人(该期学生与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同

等待遇)。第二期招收的系学生,1925年12月23日开课,1926年12月底毕业,与其一同受训的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未经过军校教育的军士50余人,本期共毕业376人(该期学生与黄埔军校本期第四期学生同等待遇)。第二期学生毕业后潮洲分校结束。

## 长沙分校

长沙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因校址设在长沙(长沙小吴门外教厂坪),故通称长沙分校。1927年2月开始筹备,3月蒋介石任命石醉六为分校校长,教育长余范传,政治部主任夏曦,总教官杨石松。校部设政治部及编译、副官、军需、秘书四处。马日事变后,校长石醉六、教育长余范传离校,夏曦等共产党员教官、学生转移,学校曾一度无人负责,后学校由唐生智接管(因唐在武汉,校务实由周斓主持),取消校长制,由唐生智、刘兴、何健、李品仙、周斓、叶琪、费浩、张翼鹏、谢煜焘等组成校备委员会主持校务,教育长由谢煜焘升任,校部各处改为课部:教务、管理、庶务、会计、医务五课。1928年春蒋介石发动西征后,唐生智出走日本,程潜接管长沙分校。1928年7月30日第一期学生总队毕业后长沙分校停办。自1927年2月至1928年7月长沙分校只开办一期,共三总队,其中步兵总队、炮工总队系学生总队,学习期一年,1928年7月(其中有部分1928年春毕业)毕业,共627人。带薪生总队系学员总队,学习期半年,1927年8月毕业,共375人。

1937年底为抗战需要长沙团校恢复,校名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长沙分校,校址设在长沙市南门外书院坪长沙高级中学,主要培训下级军官及警官等。分校主任张治中(后由薛岳、杜建时继任)、副主任徐权、唐仲勋,校部设教育、政治

训练（后改为政治部）、经理、总务四科及医务室。1938年4月25日正式开学。11月因受抗战局势影响迁往湘西泸溪县，分校教导团亦由长沙岳麓山迁往湘西沅陵县。1939年1月15日张治中调离后，分校主任薛岳派杜建时去泸溪接收长沙分校，5月长沙分校奉命撤销，由杜建时率领迁往湖南茶陵王家渡与湖南干训团合并，长沙分校结束，自1938年4月25日至1939年5月期间分校办理的学员队有：军官大队第一至三期，军士大队第一、二期，学兵教导团第一、二期，共毕业3270余人。

### 南昌分校

南昌分校原系第五路军军官补习所，1927年12月筹备，1928年4月30日成立，5月1日正式开学，培训对象为第五路军下级军官及军士。同年10月西国民党中央禁止各军自行创办军校，补习所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昌分校。校长刘体乾（后为唐淮源）副校长张鉴桂，校部设教育、经理、医务、庶务四处及教授、训练两部，教学参照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昌分校只开办了一期学员班，学员系第五路军各部队下级军官及军士，1927年7月毕业，共415人（这期学员因毕业时间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接近，故与第六期学生同等待遇）。本期学员毕业后南昌分校结束，改为江西省警察学校。

### 洛阳分校暨第一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于1933年8月筹设，其开办的宗旨是：①施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员生转地教育，②对于志愿赴西北服役的军官或屯垦者施以军事训练及屯垦教育。1933年11月分校正式成立，12月18日开学，分校主任祝绍周（后由钟彬、刘仲荻继任）、副主任江煌（后由刘海波继任）。校部

设军事、屯垦、政治训练、总务、经理五科及军医院。分校以训练学员为主，教学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以下简称军训班）教学大纲，从军训班第二期开始办理（第一期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至1937年7月共办理了军训班：第二期一总队、第三期一总队、第四期一总队、第五期一总队、第六期独立一队，共毕业学员6600余人；办理军士教导队第一至三期，共毕业学员2900余人。1937年11月15日洛阳分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址由洛阳迁陕西南郑（即汉中），学校开始招收学生；自第十四期第三、四总队起办理。1945年秋分校裁撤，未毕业的学生并入新疆九分校。自1937年11月15日至1945年秋，一分校期间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四期三、四总队，第十六期十、十一总队，第十七期十八、十九总队，第十八期四、十四总队，共毕业学生8207人；办理军训班：第七期独立一队、第九期独立二大队、第十二期独立六大队及各种短训班，共毕业学员3200余人。

### 武汉分校暨第二分校

武汉分校最早的校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几次更称，最后定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校址原设武昌，因几度停办、迁址，该校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

#### 第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时期

（1926、10——1927、7）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提师北伐底定武汉后，为实现第二次北伐而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教育长方鼎英提议设分校于武汉，经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同意将黄埔军校本校的政治科移设武昌。在创办分校过程中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政治训练班筹备处阶段。分校最早称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政治训练班，地址设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楼，1926年10月16日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包惠僧为筹备处主任，拟以武昌大学为校址。（二）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阶段。筹备处成立不久旋奉令改办政治科，1926年10月27日迁至武大附中作临时办公处，11月2日蒋介石委任邓演达兼政治科主任，在此阶段录取学生1181人（男生986人，女生195人）。（三）由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阶段。1927年1月19日根据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政治科改为武汉分校，邓演达任分校代理校长，顾孟余任分校代理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1927年3月后由侯连瀛继任），秘书长周佛海，军事总教官蓝腾蛟，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校部设训练、政治两部及军需、军医、管理、经理等处，还聘请铁罗（苏）、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李季、章伯钧、蔡畅、张国焘、李汉俊、陈潭秋、项英、陆沉、彭泽湘、郭冠杰等为政治教官。2月12日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四）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阶段。为防止军校变成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工具，3月国民党二届常委二次会议决定取消军校的校长制，实行委员制，对武汉分校的领导体制进行相应改革，由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员会，3月18日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军事委员会。时学校领导机构除设立常务委员会外，还设有总办公厅（1927年4月改为秘书处）、训练部、政治部、军需处、军医处等，办理学生第五、六期总队，全校有学生近六千人，学校的教育、训练日趋完善与正规化。“4·12”、马日事变后，恽代英等被相继免职，学校中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员教师、学生均离职、转移，7月学校停办，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

## 第二，续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时期

(1929、4、28——1932、3)

1929年4月蒋介石命钱大钧接办武汉分校并任教育长，分校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4月28日正式开学。校部设总办公厅及教育、政治训练、总务、经理、军医五处。培训对象为学生，自武汉分校第七期开始办理。1930年7月分校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政治训练处归入特别党部，增设财政监察委员会、工程委员会、驻京（宁）通讯处等，对总办公厅及教育、总务、经理、军医四处进行了内部组织调整。1932年3月中旬蒋介石命令武汉分校移驻南京，未毕业的第八期学生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改编为第八期二总队（1933年11月毕业于南京，共1240人）。1929年4月至1932年3月武汉分校只开办第七、八两期，共招收学生3300余人（其中第七期毕业1677人）。分校停办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

## 第三，恢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时期

(1935、10、1——1937、12)

1935秋陆军整理处军官教育团奉命停办，恢复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专门训练下级军官，同年10月1日正式开学。分校主任刘绍先（后为李明灏）、副主任白兆琮（后为毛福成），校部设教育、总务、政训、经理、医务五科。至1937年12月分校办理了军训班：第五期二总队、第六期二总队，军士教导总队第一期及观通训练班等共毕业学员2200余人。

## 第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时期

(1937、12——1945、8)

1937年底武汉分校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分

校主任李明灏（后由周磐继任）、副主任毛福成（后由周磐继任），校部设办公、教育、总务、经理（1942年改为科，隶属总务处）、军医（1942年改为军医科，隶属总务处）、六处及政治部、会计室，培训对象分学生、学员。1938年1月4日因受战局影响校址由武昌迁至湖南邵阳，因该地营舍不敷，3月16日移至湖南武冈，校本部设在武冈东部法相岩山。1944年9月日寇侵占新化、邵阳，企图包围分校，学校向绥宁转移，分散在塔塔岭、三口桥、武阳等地进行教学，11月校部组织机构调整，各处部改为组（后又改为室），时校部设教育、机要、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医、政务八室。1945年4月学校遭日寇第二次包围，突围疏散至会同县。7月11日奉命裁撤，未毕业的十九期学生拨归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或辘重兵学校代训，8月二分校结束。在此时期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四期五总队，第十五期八总队，第十六期八、十九总队、第十七期六、七、二十一、二十七总队，第十八期七、十二、十三总队，第十九期五、六总队，共毕业学生17000余人，办理军训班，第七期二总队，第八期三总队、独立第二大队，第十期三、四总队及独立二大队，第十一期二总队，另还办校官班一期、技术训练班第一至四期，军官补训第二总队等，共毕业学员8700余人。

### 成都分校暨第三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1935年8月成立，1936年4月18日正式开学。校址设于成都市北校场。分校主任李明灏（后由陈又新继任）、副主任彭武歇、马嗣良（后由骆德荣继任）。校部设教育处、政治部、会计室及总务、经理、医务、文书四科。分校培训对象以现役军官为主。1938年初成都分校更称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三分校，年底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南京迁

至成都，将分校校址改作本校校址，三分校停办学生归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至1938年底分校共办理了军训班：第四期二总队、第五期三总队、第六期三总队，共毕业学员2100余人；办理学生队：第十四期六总队（后归入本校，1939年10月毕业共1559人）。1939年3月三分校转至江西云都办校、后又移至瑞金，于7月正式开学。分校主任吕济（后由沈发藻、柏天民继任）、副主任唐冠英（后由陈畅威继任），教育长唐超伯（后由赵协章继任）。校部设第一处（后改教育处）、第二处（后改办公处）、第三处（后改经瑞处，1942年3月改为科隶属总务处）、第四处（后改军医处，1942年3月改为科隶属总务处）、政治部、总务处、毕业生调查处，1940年初又增设营缮委员会。1941年5月分校由瑞金迁广丰沙田，6月因战局影响返回瑞金，1942年5月迁江西五都，6月迁福建邵武，后又返回瑞金，1944年底迁江西会昌。1945年11月分校裁撤，未毕业学生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6年初分校结束。1939年7月至1945年11月三分校共办理学生队：战事工作干部训练第三团第一期（原属军事委员会，后隶属三分校共，毕业2814人，女生241人，第十六期政训一总队（共毕业2542人，其中女生418人）、十七、二十二总队，第十九期七总队，第二十期学生步兵大队，共毕业学生8874人，其中女生659人；办理军训班：第八期二总队、第九期独立一队、第十期二总队及独立八大队、第十一期三总队、第十二期独立二大队、第十三期，共毕业学员5893人。

### 广州分校暨第四分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广州分校位于广州市郊的燕塘，1927年黄埔军校因学生增多，校址偏小西选择其为军校入伍生训练地，嗣后随着学生迁汉，此处成为陈济棠第八路军教导队，旋

又扩充为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后易名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1936年8月15日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10月12日正式开学。分校主任陈诚（后由韩汉英继任）、副主任陈芝馨（后由谢婴白、陈联璧、张振鏞继任）、校部设教育、政训、办公三处及医务、经理两科。1938年3月分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部组织机构除教育处外，其他部门均有所变动，政训处1938年5月改为政治部，经理科1940年5月改为处，1941年9月改为军需处（1942年5月又改称经理科），医务处1942年5月改为军医处，增设了会计室、总务处、毕业生通讯处等。校址也因遭日寇轰炸1938年初由燕塘迁至广东德庆、西江，1938年10月迁广西宜山，1940年3月迁贵州独山，1942年6月迁贵州遵义，1944年冬迁贵州湄潭。1945年军政机构调整四分校裁撤，未毕业的学生分拨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及炮、工、通兵科学学校学习，1945年10月四分校结束。自1936年8月至1945年10月，四分校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一期独立二大队，第十二期三总队，第十三期三总队，第十四期七总队，第十五期七总队，第十六期九总队，第十七期五、八、二十三（二十三总队系三分校拨归四分校的）、二十四、二十六总队（二十六总队系由华侨学生组成）及炮科独立第二队，第十八期炮科独立四大队，第十九期八、九总队，共毕业学生14529人；办理军训班：第四期四总队、第五期第四总队，第七期三总队，第八期独立一队，第九期独立二队及军官教育队技术训练班第一、二期，共毕业学员4164人。

### 昆明分校暨第五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的前身为云南讲武堂，校址设在云南昆明。1930年改为滇军军官教导团，1935年8月20日改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年9月16日正式开学，主要训练未受

过正式军校教育的现役军官。分校主任刘永祚（后由唐继麟继任），副主任张翼仁，校部设政训、教育、医务、经理、工兵、步兵六科。1938年1月昆明分校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1945年9月分校裁撤，在校学生提前毕业，至1946年春分校结束。自1935年9月至1946年春，分校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一期独立一队，第十四期八总队，第十六期七、十八总队，第十七期四总队，第十八期五总队，第二十期独立大队，第五期独立二大队，第六期独立二大队，第七期独立一大队。独立二队，第十期独立三大队等，共毕业学员3100余人。

### 南 宁 分 校 暨 第 六 分 校

南宁分校最早的全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1926年3月在广西南宁筹设，5月1日正式成立，5月5日开学。分校校长俞作柏（后由吕竞存、白崇禧、李泽民、薛岳、陈芝馨、夏威、李品仙继任）、副校长（1936年增设）刘士毅、教育长肖钱（后由陈芝馨、余华沐、刘士毅、刘任继任），校部设步、炮、工三科及政训（1930年改为政训部）、经理、副官（1927年改为总务处）三处。1931年秋校部组织为校长之下设总办公厅、政训部、军需处（1937年改为经理处）、教务处、总务处、军医处及步、炮、工三科。培训对象为学生、学员自1937年10月一分校办理了一至八期，共毕业学员生8043人，其中包括高级班四期，共学员415人。1937年11月分校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旋又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分校校主任俞星槎（后由黄维、黄杰、甘丽初、冯璜继任）、副主任王景宋（后由周嘉彬、梁恺、杨彬、谭承慨、陈骏南），校部设办公厅（1940年5月改办公处）、政治部、教育处、经理处（1942年3月改为经理科，隶属总务处）、总务处、军医处（1942年3月改为军医科，隶属总务处）、会计

室、驻桂办事处等。时值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学生在校学习时期,为与本校统一,分校将第九期改为第十四期九总队。在创办过程中分校校址几经变迁,1929年由南宁迁桂林,1930年迁柳州,1930年秋迁回南宁,1938年3月复迁柳州,1939年3月返回桂林,1944年底迁广西凌云,最后迁至百色。1945年11月分校裁撤,未毕业学生并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期,1946年春分校结束。自1937年11月至1946春分校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四期九总队、第十六期十二总队,第十七期十七总队(系由福建十三补训处保送生及原十七期二十八总队第二大队学生等组成),第十八期三总队(本总队转入工科独立第九大队388人),第十九期十一总队(本总队系由学员、学生混合组成,学员约750余人,学生150余人),第二十期十一总队(该总队未毕业,于1946年春并入本校),共毕业学生9478人;办理军训班:第十期独立三队,第十一期独立一、二大队及荣誉军官大队,军官教育队,军官预备教育班第一、二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等,毕业学员2700余人。

## 第七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1938年1月在西安成立筹备委员会,委员为胡宗南、顾希平、罗历戎、曾扩情、吴允周。3月在陕西凤翔办理驻天水的第十七集团军学生队及在长沙训练的西北干训班第六期学生,3月29日七分校正式成立于凤翔。分校主任胡宗南,副主任顾希平(后由周嘉彬、邱清全、张卓继任),校部设主任办公厅及办公、教育、经理、总务四处。5月校部迁西安王曲修寺庙,相继增设政训处(后改政治部)、医务处、会计室、毕业生通讯处、回安办事处等,至1939年春校部组织基本完备。七分校是抗战时期培训学生最多的一个分校,其开办的班次、类型,毕业的人数均居其它各分校之首。

其学生队分为甲、乙级生，甲级生学制一年，乙级生学制一年半，自第十五期第二总队开始办理，学员队自军训班第六期独立三大队开始办理，至1945年12月共办理学生队：第十五期二至五总队，第十六期四总队（其中特科大队1939年4月拨归六总队）、五总队（其中第一大队1940年1月并入十五总队）、六、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总队（原系十总队，1939年9月改称十六总队），第十七期九至十四总队（十四总队部分学生1943年2月编入十、十二总队，部分编入十八期）、十五总队（1942年2月学生编入其他总队及炮兵独立九大队），第十八期十五、二十二总队及特科独立大队，第十九期十二、十三总队（其中第二、十队编入十二总队）、十四总队（1946年归属西安督训处二十一期）、十五总队（1946年归属西安督训处二十一期）及独立第九大队（系一分校拨并七分校的学生组成），共毕业学生25014人，办理军训班：第六期独立三大队，第七期独立二大队，第八期独立一大队，第九期三总队，第十期六总队及独立四队，第十一期六总队，第十二期六大队，军官研究班第一、二期，军需实习班第一、二期，政工干部训练班第一至三期，军官短期教育班第一、二期，特务长训练班，补训独立第五大队及政治队、女生队、边区语文班等，共毕业学员12303人，其中女生189人。

1945年12月31日七分校奉令改组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督训处，1946年1月1日西安督训处成立。处长袁朴（后由吴允周、刘钊铭继任），副处长吴允周（后由邱是庸继任），处本部设教育、政治（1947年5月改为训导室）、总务三组及经理、军医两科。接办七分校第十九期十四、十五总队等，时军校改学生总队制为大队制，本期学生改为第二十一期步七至十大队，炮、工、通大队，共毕业学生2132人。1947年12月二十一期毕业后西安督训处结束，改组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军官训

训练班(时国民党为配合其反共内战政策,先后在北京设立第一军官训练班,沈阳设立第三军官训练班,台湾凤山设立第四军官训练班,乌鲁木齐设立第五军官训练班),班主任刘钊铭、副主任陈延生,班本部下设人事行政、教务、训练、军需、训导五个组,主要训练现役军官、军士、青年军留营士兵及预备军官,前三者为各部队、青年军选送,后者为招考的学生。1948年2月从军训班第十五期独立一大队开始办理,规定军官学习期四个月,军士、青年军留营士兵、预备军官学习期半年,共毕业2000余人,至大陆解放前停办。

### 第八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系抗战后设立的,其前身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1940年1月改组为第八分校,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3月正式开学。分校主任康泽(后由徐祖诒、罗列继任)、副主任沈发藻(后由罗列继任)。校部设办公、教育、总务、经理、军医、毕业生通讯处及政治部、会计室、营缮委员会。1942年6月校部组织机构调整,改设办公、教育、总务三处及政治部、会计室、经理委员会。校址设在湖北均县草店镇,1945年迁湖北房县。1945年6月奉令裁撤,未毕业的第十八期十六总队、通信兵第六大队等并入西安督训二十一期,10月分校结束。自1940年3月至1945年10月分校共办理了学生队:第十七期十六总队,第十八期十六总队及通信兵科第六大队等,共毕业学生2331人;办理军训班第九期二总队,第十期五总队及独立第七大队,第十一期七总队,补训独立第六大队,十八期十七总队等,共毕业学生4554人。

### 第九分校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分校原为新疆讲武堂,1928年10月

改为新疆陆军军官学校，先后招生八期，1943年3月27日改为第九分校，隶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分校主任盛世才（后由刘仲荻继任未到职，宋希濂继任）、副主任龚愚，后由唐井然、夏日长继任），校部设办公、教育、总务三处及政治部，改为九分校后将原新疆军校第六期改为第十八期独立六队，第七期改为第十九期独立二十二大队，第八期改为第二十期独立一、二队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拨来的学生混合编为一总队（后改为大队），同时还设有入伍生预备教育班、无线电训练班、通信教育班等，并采取学员、学生混合编队，分别教学的方法。1945年11月分校按新编制在教育处增设步、骑、炮、工、战车、辎重、通信七科，撤销了学生总队与通信教育班。1947年3月第二十期学生毕业后九分校结束，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军官训练班。从1943年3月27日至1947年3月止，第九分校共毕业学员生1000余人。

# 建国后湖南省直设置了哪些党政群机构\*

任 连 荣

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不同时期形势的发展，我省省级党政群机构经历过多次精简调整，变动极其频繁，其沿革情况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 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

(1949年10月至1956年)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8月20日，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为切合过渡时期的性质，8月24日组成湖南临时省政府。8月29日，成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

当年，我省省级机关设有17个机构，即：党委系统设：省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社会部。政府系统设：临时省政府秘书处、省公安厅、民政厅、工商厅、交通厅、农林厅、财政厅、教育厅、人民法院。群众团体设：省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南省

\*本刊第37辑发表任连荣同志《四十年来湖南五次机构精简整编始末》一文后，一些读者来信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认为颇有参考价值，并希望再介绍一下湖南省级机构历史沿革情况，故本刊再刊此文，以应读者。

工作委员会。

1950年4月1日，湖南临时省政府撤销，正式成立湖南省人民政府，临时省政府秘书处改为省政府办公厅。省级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党委系统增设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系统增设省人民检察署、财政经济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劳动局、卫生处、参事室，省工商厅分设为工业厅和商业厅，教育厅改名为文教厅。群众团体设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截至1950年底止，省级党政群机关共设27个机构，共定编制3559名。

1951年，经中南局批准，省委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厅，新设省委城市企业部。政府系统增设政治法律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人事厅、合作事业管理局。1952年增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建筑工程局、粮食厅，文教厅分设为教育厅、文化事业管理局，卫生处改为卫生厅。

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适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我省省级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省委增设农村工作部、直属机关党委。政府增设统计局、体育运动委员会，撤销土地改革委员会。群众团体增设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总工会筹委会改为工会联合会，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改为民主妇女联合会。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成立了国务院。为适应有计划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学习苏联的管理经验，进一步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同时要求地方各级组织机构作相应的调整。据此，我省省级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省委城市企业部改为省委工业部。省政府增设计划委员会、手工业管理局，将农林厅直属的林业局、水利局划出，单独设立省林业厅、水利厅，直属

省政府领导，省农林厅改名为省农业厅。

195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改称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撤销了原省人民政府政法、财经、文教三个委员会，同时设立了政法、工业、交通、农林水、财粮贸、文教办公室；将人民监察委员会、人事厅、文化事业管理局分别改名为监察厅、人事局、文化局；撤销合作事业管理局，新设供销合作社、气象局、司法厅，省人委机构增至34个。党委系统机构也作了相应调整，将省委纪委改为省监委（1956年又改为省委监委），省编制委员会也正式明确列入省委工作机构序列。此外，省人民检察署改为省人民检查院。省人民法院改为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提前一年完成，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继出现高潮。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党委系统增设省委政法工作部、交通运输工作部、财政贸易工作部、文化教育工作部。政府系统，撤销省交通厅，分别成立公路、航运两厅；增设省农产品采购厅、省高等教育局、省广播管理局（电台）、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建筑工程局改为城市建设局，对外贸易局改为外贸部驻湖南省特派员办事处。至此，省级机构总数达到59个，名称如下：

党委系统13个：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部、工业部、交通部、农村部、财贸部、文教部、监委、编委、直属机关党委。

政府系统39个：办公厅、政法办、工业办、交通办、农林水办、财粮贸办、文教办、监察厅、计委、民委、公安局、司法厅、民政厅、人事局、劳动局、统计局、工业厅、手工业局、公路厅、航运厅、城建局、农业厅、林业厅、水利厅、气象局、财政厅、商业厅、外贸办事处、供销社、农产品采购厅、

粮食厅、教育厅、高教局、文化局、卫生厅、广播局、体委、机关事务局、参事室。

群众团体 4 个：工会联合会、团省委、民主妇联、文联。

按党章、宪法及有关章程设置的机构 3 个：政协、法院、检察院。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时期

（1957年至1966年4月）

1957年，省委撤销政法部；省人委增设物价局和服务厅，将农产品采购厅并入供销社，并将外贸办事处改为外贸局。

1958年，中央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一部分工业、商业和财政的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并将许多原来由各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鉴于体制上的变动，省级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省委新设工业办公室，撤销文教部。省人委撤销政法、工业、交通、农林水、财粮贸五个办公室及物价局；将工业厅分设为重工业厅、轻工业厅（手工业局并入），后又将重工业厅分设为冶金、机械、煤炭、化学四个工业局；城市建设局改为基本建设局；水利厅并入农业厅，新设水利水电局；外贸局、服务厅先是并入供销社，后供销社又并入商业厅，高教局并入教育厅；撤销省气象局；新设省外事办、科学工作委员会、物资储备供应局。群众团体增设科学技术协会。

1959年，省委增设政法办公室，省委工业办公室加挂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牌子，省委政策研究室正式列入省委工作机构序列。省人委增设基本建设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撤销监察厅，将司法厅并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科学工作委员会、化学工业局、水利水电局分别改名为科学技术委员会、化学石油工业局、

电力工业局。此外，工会联合会改为省总工会。至此，省级党政群机关共设56个机构，共定人员编制5771名。

1960年冬，党中央为了克服从1958年以来持续三年的“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提出了“调整、改革、充实、提高”的方针，改变过去权力下放过多和过于分散的现象。为了适应这一重大变化，我省省级机构和人员编制在1960年至1961年、1962年至1963年先后进行了两次精简，对机构特别是人员编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精简。1960年省委将工业部和交通部并入省委工业办，并将农村部、财贸部改为农村办、财贸办，省人委撤销了文教办和人事局，将轻工厅、化学石油工业局合并为轻工化工厅，将建委与基建局合并为基建局（仍保留建委名义），省冶金工业局改名为省冶金厅，省煤炭工业局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湖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实行部、省双重领导，省电力工业局与农业厅的农田水利局合并，改名为省水利电力厅，新设省农业机械局、农林垦殖局、水产局。

1961年，省委增设军事工业工作部，从省委工业办公室分设出省委工业工作部，恢复省委农村工作部。省人委撤销省农机局、水产局、基本建设委员会（原与基本建设局合署办公），将省物资储备供应局改为省物资管理局，新设农林水办公室，恢复省监察厅，从轻化厅分设出手工业管理局，从商业厅分设出外贸局和供销社，省科学技术协会与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合署办公。

1962年，省委军事工业工作部与省委工业交通工作部合署办公，军工部对外保留名义；新设财政贸易工作部。省人委增设政法、工业、财贸、文教办公室和人事局、气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部湖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仍称湖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此外，省民主妇女联合会改名为省妇女联合会。

从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民经济在调整

中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原来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协调起来。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段时间，我省省级机构也相对稳定，1963年省人委只撤销了监察厅。科协与科委分开办公。1964年新设工商局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撤销机关事务局，基本建设局改为建筑工程局。省委工交、财贸工作部改为工交、财贸政治部，新设国防工业办公室。1965年新设基本建设委员会，省委农村部改为农村政治部。到1965年底，省级党政群机构达到63个，其名称如下：

党委系统12个：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工业交通政治部、国防工业办公室、农村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监察委员会、编制委员会、直属机关党委。

政府系统43个：省人委办公厅、政法办、工业办（经委）、农林水办、财贸办、文教办、外事办、计委、科委、民委、公安厅、民政厅、人事局、劳动局、统计局、物资管理局、冶金厅、机械厅、煤炭局、轻工化工厅、手工业管理局、交通厅、基本建设委员会、建筑工程局、农业厅、林业厅、水利电力厅、农林垦殖局、气象局、财政厅、商业厅、粮食厅、对外贸易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社、教育厅、文化局、卫生厅、广播管理局、体委、计生委、档案管理局、参事室。

群众团体及其它的机构8个：总工会、团省委、妇联、文联、科协、政协、法院、检察院。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省级党政群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8年4月，湖南省革命委员

会成立，下设政治工作组、办事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4个大组，四大组下设15个组，省革命委员会为党政合一的机构，掌管全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原党政群机构均被撤销。

1969年2月，省革委会机构进行了调整，四大组下设29个组和2个办公室，定编720人。当年3月，省革委会决定，生产指挥组下设政工、工交等9个组，组下共设29个公司、部、局、行、站。

1970年，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把全国划分为10个协作区，各自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中央要求所属各部门在1970年内把绝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随着管理体制的变动，省革委会将生产指挥组所属机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生产指挥组除保留办公室、政工组、计划组外，其余的组均撤销，并新设冶金、化学、煤炭、交通邮政、轻工、机械、水利电力、基本建设、地质、农林、物资、财政金融、粮食、商业、卫生等15个局和气象站。当年底，我省召开了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

1971年省革委会将物资局改为物资储备局，气象站改为气象局。1972年至1973年，省革委会相继撤销了生产指挥组、政工组、办事组及公检法机关军管会（人民保卫组），同时撤销了“三支两军”机构及人员，设立部、委、办、厅、局机构，截至1973年12月底止，省级党政群机关共设44个机构，其名称如下：

党委系统4个：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

政府系统36个：工交办、国防工办、农村办、财贸办、外事办、计委、科技局、公安局、民政局、劳动工资局、物资局、外经办、知青办，冶金、机械、煤炭、化学工业局，轻工业局、

电子工业局、交通局、基本建设局、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局、社队企业局、气象局、财政金融局、商业局、粮食局、教育局、文化局、卫生局、广播管理局、体委、档案组、机关事务局。

群团及其它机构4个：总工会、团省委、妇联，法院。

1974年至1976年，省级党政群机构增设8个（五机局、测绘局、农机局、外贸局、直属机关党委、建委、供销社、人防办），撤并2个（工交办、基建局），至1976年底，省级党政群机关共设50个机构。

####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至1989年12月）

1976年10月，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国务院为了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从1977年至1981年先后恢复和增设了48个工作部门。我省省级机构为了与中央、国务院机构相适应，也恢复和增设了一批机构。1977年恢复了纪检会、政协、工交办、文教办、统计局、建工局、参事室等7个机构。1978年恢复和增设省委政研室、检察院、民委、人事局、编委、医药局、建材局、出版局、旅游局、文联等10个机构。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从1979年至1982年省级恢复和增设了18个一级机构，这些机构名称是：省委政法委员会、老干部工作局、信访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司法厅、视察室、物价委员会、二轻局、纺织局、环保办、沼气办、工商局、职教办、计生办、韶山管理局、科协、侨联；撤销知青办，气象局改为双重领导。至1982年底，省级党政群机构共达83个，是历史上机构最多的一

年。

由于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中央、国务院决定进行机构改革。遵照中央指示，我省于1982年9月成立机构改革领导小组，着手进行全省的机构改革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到1983年5月，省级机构的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结果：撤销省农委、财贸办、文教办，将省委信访办并入省委办公厅，沼气办、农机局并入农业厅，环保办、人防办并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五机局并入国防科工办，旅游局并入外事办，外贸局、外经办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厅，劳动、人事二局合并，成立劳动人事厅，撤销省人民政府视察室，其业务并入省委老干部工作局，纺织、电子、医药，建工4个局改为公司，社队企业局与供销社合并为农村合作经济联社，出版局改为出版总社。农村合作经济联社、出版总社、测绘局均列为事业单位。新设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交财贸政治工作部、保密委及省审计局、体改委。省顾委、纪委、人大、政协、检察、法院、民主党派及各群众团体，按照党章、宪法及有关章程规定设置。省级共设68个一级机构，中央核定省级人员编制5000名（不含公检法司及以后陆续追加的专项编制）。

从1983年至1986年，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合并的机构又分设了，降格的机构又升格了，改为公司的又恢复为行政局，如电子局、纺织局、医药局、人防办、乡镇企业局、旅游局。同时根据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如科教办、国土局、侨务办、社联等等。截至1986年底止，省级党政群机关共设77个机构，其名称如下：

党委系统9个：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政研室、老干部工作局、直属机关党委、保密委。

政府系统55个：办公厅、国防科工办、财贸办、科教办、外事办、计委、经委、农经委、科委、民委、公安厅、司法厅、民政

厅、劳动人事厅、编委、物价局、统计局、物资局、冶金厅、机械厅、煤炭厅、石油化工厅、轻工厅、二轻厅、纺织局、电子局、医药局、交通厅、建委、建材局、人防办、农业厅、林业厅、水利水电厅、乡镇企业局、审计局、财政厅、商业厅、粮食局、对外经贸委、工商局、教委、文化厅、卫生厅、广播电视厅、体委、计生委、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档案局、国土管理局、机关事务局、侨务办、旅游局、参事室、韶山管理局。

群众团体7个：总工会、团省委、妇联、文联、科协、侨联、社联。

按党章、宪法及有关章程设立的有省纪委，顾委办公厅、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政协办公厅，检察院、法院。

1987至1989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这就要求政府体制作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党中央和国务院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同时明确，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治理整顿，在中央未做统一部署以前，地方机构改革不全面展开。在这几年内，湖南省直机关也新设和调整了一些机构。即：

党委系统：将省直属机关党委改为省直属机关工委，新建中共湖南省高等院校工作委员会，两委均为省委的派出机构；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列为事业单位。

政府系统：设立省监察厅；撤销省劳动人事厅和省科技干部局、省编制委员会，成立省劳动厅、省人事厅和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撤销省冶金工业厅，成立冶金工业总公司；设立省新闻出版局并以“湖南省版权局”名义行使版权管理职能，不另设机构；省纺织工业局改称省纺织工业厅，省物资局改称省物资厅，省二轻厅改为第二轻工业局。

1988年7月省七届人大会议通过决议，省七届人大设立：民族华侨委员会、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

化卫生委员会。1988年5月省七届人大常委会二次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和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设有：提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联谊委员会、城市经济与科技委员会、农村经济与科技委员会、文教卫体委员会、社会群团与宗教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州市县政协联络委员会。

各民主党派在湘设立省委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湖南省委员会、中国民主建国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南省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湖南省工委、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员会。

1989年底机构设置，群团尚有省工商业联合会，省作家协会（副厅级），省文史研究馆列为事业单位，省政府直属厅局级的事业单位中，还设有担负有行政职能的省环境保护局、省测绘局和省人民政府食品工业办公室、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此外，省直政府系统机构中，尚有省法制局、省税务局、省标准局、省计量局、省农机管理局、省劳改工作管理局、成人教育局和省委信访办公室、对台办公室等半格局，即副厅局级机构。

综观建国以来我省省级机构的设置，是一条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路子，其中变动较多的是经济管理部门。这些部门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几经变迁，但都只限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没有触及党政职责分开，以及政事、政企职责分开，没有触及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

## 张本清龙溪口被刺内幕

杨 世 明\*

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解放前夕，地方帮会派系哄斗激烈，开明士绅张本清就此被害牺牲，其时我在该县警局任内，详悉其内幕情况，现记其始末如下。

### 张 本 清 其 人

张本清，晃县大湾罗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孙中山的北伐军和东征战役，曾担任国民党宪兵团长、少将旅长等职。其性情爽直刚毅，不喜逢迎，由于思想反蒋和与诚陈意见不合，政见分歧，愤而挂冠赋闲，于1942年离职返家经商，在家乡他自负自恃，孤傲不群，不与一般地方士绅为伍，其平时言论每多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对地方政府或党、团和参政会方面有不公正的人，他总看不顺眼，嫉恶如仇，凡遇不公平的事，他都站出来打抱不平。

当时晃县设有伤兵“第十九临时教养院”，收容伤愈者教养，他们自恃是抗战有功的“荣誉军人”，目无法纪，经常闹事，侮辱妇女，买东西不给钱等等，气焰嚣张，不服约束管教，地方治安秩序受其影响，我以县警察局长兼任军警督察处长，十九临教院长王馭寰兼任副处长，我们对此都感棘手，一次，有伤兵数人在城区菜场买菜，拒不付钱，因与卖菜妇女发生争吵，竟把那女人掀倒在地，恰逢张本清过街碰见，他冲上

\* 杨世明当时任晃县警察局局长。

前去将那揪人的伤兵打了几记耳光，其余伤兵见势上前围攻，张本清拔出手枪大声喝道：“你们为国负伤是光荣的，但不守地方法纪，估讨估要，出手打人，是犯法的，如不悔改，看我今天严惩你们。”这时恰有人在旁相劝求情，高声说：“张旅长，饶了他们吧！”那些伤兵一听是“张旅长”立即溜走了。张本清随即带那卖菜妇女到临教院，张向王馥寰院长提出告诫，并促使王院长召开大会，宣布伤兵纪律，并当场处罚违纪伤员。此会并邀请地方各机关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我也出席在场，一致阐明法纪，警勉伤员，从此伤兵闹事的情形渐有收敛。

抗战期间，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特别是人民群众每天所需的米、盐必需品奇缺，不但价钱昂贵，有时有钱无市，张本清为顾及民众生活，自己出资派人到外地购进大批米、盐开了一个盐米店，实行平价供应，凭户口严格限量出售，广大人民得到实惠。张解决疾苦，受到尊崇，特别是在基层劳动群众中普遍受到称颂。

张本清乐于助人，一般有困难或冤屈者登门求援，无论出钱出力，有求必应。举其一例，就连晃县惯匪头子姚大榜被独一旅围剿，姚本人在逃，捕其妻属关押，求助于张本清，他认为姚有罪，但不能株连其妻，遂出面说情担保释放，而后来姚匪恩将仇报，张竟死于其人之手。

张本清对坏人坏事、贪官污吏极为痛恨，有晃县县长欧阳涛染指修建龙溪口大桥经费，张对其干预责难，欧阳怀恨在心，知张与陈诚有隙，遂诬告于陈诚面前，被押解武汉行辕，后经张妻郭顺卿（中国战时儿童教养院长）求助于宋美龄斡旋，乃得以澄清诬案，获释还家。

## 当年背离蒋介石

张本清刚正不阿，不畏权势，敢于净谏直言，因此渐疏远于蒋介石以至挂冠引退。根据他早年写的家书材料，足以窥见

其为人，他在家书中写道：

“三民主义之政权是我同许多人之血汗所造成。民十七年春我正要去法国，为陈诚和我吵嘴事，蒋先生不说可否，我冲出门口，适遇陈立夫，他与我至好，他说上午蒋先生要见我解释清楚，我答：‘照如此干法，陈诚等如此荒谬（难以为法）’二十三年春，郭二妈从南京带来蒋先生亲笔长信，劝我立即回京，不要留广州赋闲。我坚决不回，我答蒋书中有云：

‘大抵吾人应与君子同生死，死亦不为正士所讥评，与小人得荣幸，终为小人所残害，且无补于国家民族。今日之团体分子以杀为威，人才有限，无穷之杀，恐难关到来，无人可与校长共患难耳。今日云团体分子制作蓝衣，行其非法定之礼节，与白莲教何异？！……团体决定以校长效法墨索里尼，殊云中国无意大利之背景，何能产生墨索里尼？纵然一时侥幸得盛，决非国家民族所需要，亦必迅速崩溃’，团体人物决定称校长为：

‘唯一领袖’，林森主席代表国家又何再来一个‘领袖’？一夜开会，他们如此决定，我个人反对最力，我非团体分子，因同学关系想我拢去，故亦参加会议，我有异议，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二十二年起，绝对不向蒋先生说明，忍辱蜚居。抗战时一度负责军政，末一年挂冠而走，仍为一贯抱负。去年竞选立委，并未热心，故不走长沙、南京……”

张本清直接向蒋介石上书谏，不以蒋的“以杀为威”伤尽人才为然，又反对“蓝衣社”（一律穿蓝色制服，以区别于普通国民党员）仿效法西斯主义，怂蒋为墨索里尼，并合希特勒与蒋一炉共冶，实行独裁统治，“蓝衣社”以“十三太保”为主要骨干，其中贺衷寒、潘佑强、邓文仪、肖赞育、杜心如等人都是湖南籍的黄埔一期学生，既是张本清的同乡，又是黄埔同期同学，其关系之密切不言可知，他们邀他列席“蓝衣社”的法西斯会议，他全力反对蓝衣团体中人尊蒋介石为“唯

一领袖”。不赞同仿效法西斯独裁政治，竟然拂袖而去。张早期已具有民主思想性质，因而既遭忌于“蓝衣社”，又得罪于陈诚，当时这两方面均属蒋介石的心腹势力，必然为蒋所不容，从而挂冠赋闲。后来为了应世而参加竞选立法委员，又无意奔走南京、长沙，假权势力量争取选票，他对当时政治现状极为不满，终于谢绝蒋介石最后的笼络而解甲还乡，回到晃县。因其资历为人，地方上选他为湖南省参议员，他的立场表现和在议会中正式发表观点，从不属于反动党团，不替国民党、三青团说话。他的政治观点是极力反对内战，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和平建国，其思想是民主进步的。

### 晃县帮派之争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湘西各地封建帮会的丑类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出笼蠢动、竞相哄斗。由于他们东奔西跑，社会秩序日趋动乱，各帮会大势猖獗活动，争相扩展各自的山头势力，趁机作乱，原镇远万寿帮会头子张太伯见芷江楚汉帮会头子杨永清的势力发展较大而投靠了杨永清，这样，杨永清就成了两个帮会山头的龙头大爷。晃县新合乡乡长杨崇树与在风火井的姚祖炎、姚茂清（正华）也都先后投靠杨永清在晃县的爪牙姚大榜，从此杨永清的势力范围伸入到了晃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

楚汉、万寿两帮山头龙头大爷杨永清身任芷江警备司令，拥有武装势力，是身踞帮会和军界的两栖分子。姚大榜是打家劫舍拦路抢人的地方惯匪，经剿捕未获，归顺杨永清后为虎作伥，称霸晃县地方，又收罗胡楚藩、姚子杰、陈锡光等文痞狭吏在县城大肆横行，并欲跻身于地方士绅的行列。

张本清在晃县的名气很大，深得人望，颇有群众基础，他为人正直，在地方上言出必行，对上述诸人的恶行劣迹深为厌

恶，不屑为伍。胡楚藩、姚子杰早想在地方上充绅士招摇出头，恨有张本清在，他们总翻不过身来，因此，暗怀歹念，必欲去张而后快。

晃县县党部的吴言良亦系楚汉帮分子，奉领指示，于1948年11月在土地壩谷里溪姚大榜家开山堂，齐集帮会分子及有联系的人都去参加，我特派工作上很得力的分队长蔡灯打入他们帮会，前去开会，回来报告说：“杨永清、姚大榜、胡楚藩、姚子杰、张言伯等头领都到会，他们特意邀请张本清参加，企图调合共处，但张不愿意去。杨、姚等人很为恼怒，姚大榜向杨永清说：‘此人不除，我们不得安宁了！’杨永清发狠道：‘他愿吃罚酒，我们就决定干掉他！’当下派定胡楚藩、姚子杰负责进行谋害活动，张本清已很危险了！”

会后胡、姚二人四处散布谣言，煽惑群众说张本清一贯横行霸道，鱼肉乡民，强管民事，众畏之如虎。又说张本清近期大肆活动，势将聚众图谋不轨，宰割地方，人民不得安身了……等等恶言诽谤，以此毁伤其声誉，欺骗群众，离间地方人士对张本清一向的信任心理，如此伎俩，胡、姚自称是“使张本清愤不成军”。然后伺机再下毒手！

由于这次出自胡、姚歹徒们的恶意大诽谤，而且尔后请如此类的恶毒谎言缕缕不绝，陆续不断地在湘黔境内赓迭误传，致使不明真象者对张本清其人误解有加，至今仍然让他蒙垢受屈，含冤地下！

张本清为人性好豪强，刚愎自用，祸生肘腋自己亦不知警觉，谣言传到他的耳里，一概不理，泰然自若，言行如故。但见到杨永清的帮会势力发展越来越大，又对自己咄咄相逼，开始有了戒心，乃于同年12月召集其亲信吴可观、舒仁鹏、张东华、谢文海等人准备组建“三民党”。自命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宗继承者，有其政治和现实意义，在政治上与南京蒋介石

石另树一帜，以民生主义迎接社会主义，从而达到和平建国目的，在现实上广罗群众，严密组织以与杨永清帮会抗衡。议定于1949年3月1日在大湾罗小学内举行成立大会，毕竟未能如愿，张本清先期被害。

先是在张本清自己家里开过两次筹备会，警察局为掌握情况，派出刑警队组长王斌及自卫总队部副官刘杨前往参加会议，二人都曾参加过帮会，回报说他们没有制定章程，主要是为了与杨永清、姚太捷对抗自卫，会名“三民”，但不拥护国民党，也不攻击共产党，他所罗致的人都很正派，并无败坏之徒。张本清知识渊博，在会上讲话有条有理，说是抵制帮会扰乱社会秩序，协助政府维持地方治安，要大家严守纪律，遵从政府法令，做好本身工作，大家听了都很信服。

当时湘西帮会，政府有令禁止，但只禁而无止，都转入地下，不敢公开活动。张本清组建“三民党”，自称不是帮会组织，拟作为公开的民主政党的姿态出现，以此居于有利地位与在地下活动的杨永清帮会对垒，必能制胜于敌。警察局经过多方调查，确认他的目的意图属实，可作为进步力量加以支持，让他发展组织，既可遏止反动帮会横行，维持地方秩序，也可于尔后争取群众，支援迎接解放，减少一些阻力。我怀着这样的目的走到他城里的住宅“归来园”去见张本清，我们早就相识，见而寒暄之后，谈及地方帮会问题，张对杨永清等辈表示十分厌恶忿恨，我请其出力协助维持地方治安秩序，他慨然允诺，并说：“这是我老张份内的事。”直至告别，我没有向他谈及时局形势，也不能骤然提到有关解放等问题，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当时我仍处于警察局的工作岗位上，在历史大变革时期，思想斗争颇为激烈，政治观点终于随形势的发展而转化，决定顺应新的潮流趋向新的方向，这样政促使我与中共晃县地下工作者傅三有了联系，这是通过进步人士周午的介绍才结

识他的，周午当时任晃县地方税捐征收处处长，我们对未来远景有着共同的认识，以后又陆续认识了同傅三一起的地下工作者汪郅猷、张逸生等同志，从此我就暗中协助他们进行工作，发展进步力量。此时我将张本清的情况转告傅三，促成他们直接见面谈话，彼此在交谈中颇为默契，张也存心为地方解放事业作贡献，并指定他的亲信吴可观专门与傅三联系。

### 龙溪口剿杀案

胡楚藩、姚子杰二人早就倚仗杨永清、姚大榜之势为害地方，作恶不少，后来慑于张本清的刚正作风，动辄干预坏人坏事，因而蹑手蹑脚，不敢放肆横行，其祸乱野心既未得逞，二人就在张本清的面前以伪善的面貌出现，表面上十分恭敬，内心也怀仇恨，隐伏杀机。他们随时刺探张本清的言行动态。1948年12月张本清与吴可观等人筹建“三民党”，被二人得知后，立即向杨永清密报，说张的建党完全是用来对付杨永清和姚大榜的，并加油加酱说他们已受到张本清的严重威胁，如不即时除掉张本清，则不知将来鹿死谁手？杨永清听后立作决定，指示胡、姚二人“速除此人”。

早先张本清为了扩大自己生意，在龙溪口修了一间铺房，占用了江西帮部份基地，并把江西帮房檐削去一块，他认为自己祖籍也是江西，他家本是江西迁来的，都是江面同乡会的成员，有权使用地基。江面帮碍于情面，无可奈何，但一直对张不满，怀恨在心。

1948年冬天，邵阳帮的余四麻子做食油生意，收油过多，不久油价下跌，不能急于出售，积压资金无法周转，因向张本清诉说困难，张慨然以原价收买下来，不料油价跟即上涨，张依约以原价提油，余不便毁约，只得忍住苦恼让张把油全数提去。尔后余四麻子就向人诉说此事，说他做生意，让张本清赚

了钱，言下十分恨张！

胡楚藩、姚子杰一直注意张本清的情况，上述二事被二人得知后，认为利用两帮的仇怨对张本清下毒手的机会到来了，就暗中找江西帮头子张少希，邵阳帮头子杨跃华等人，向他们造谣说，张本清组建“三民党”决定在成立大会上杀掉江西帮的负责人周家太、张少希、蓝叔业、张西元等四人，用以祭旗。说得如此荒诞离奇，本不足以置信，但是危言耸听，真个冲昏了商会中人的头脑，竟然被激怒起来，咬牙切齿，恨张入骨。此外，由于张本清在地方上秉持公道，洞察奸伪，恶人皆恶之，也必欲去之为快。于是一致商量如何消除此人。当下在胡楚藩、姚子杰二人的炮制下，一个暗杀张本清的阴谋计划确定了！

据警方侦知，1949年的春节，胡楚藩、姚子杰邀同张少希和杨跃华，还有龙岗烟厂经理苏定川一同到姚大榜家，以拜年为名，在姚家开会，由胡、姚二人提出暗杀张本清的计划，经在坐几人密商议定：由姚大榜选派心腹爪牙吴麻子为枪手，执行刺杀行动；由张少希筹集布匹二十件，菜油若干担，银元四百元，作为行动及犒赏；刺杀地点选定张本清日常必经之地，定在龙溪口闹市区，时间定在赶场天，人众拥挤，便于下手；由姚大榜赶赴芷江向杨永清禀报密谋计划。暗杀计划既已定下，姚大榜派其心腹姚五和姚应林为助手，与吴麻子三人组成暗杀小组，事毕，姚大榜就往芷江密报杨永清去了。吴麻子是万山高楼坪人，狡猾凶悍，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棍，接受任务后，伙同两个助手，每逢场期，三人暗藏手枪，逡巡到龙溪口闹市区，伺机下手。

张本清仍同往日一样，照常从太阳坪“归来园”住宅起身过河到龙溪口商店，料理他的生意，警方及时密告，他竟置若罔闻，自言“丑类其奈我何”？随身携带手枪，以作防卫，但终

于不幸遇害。

### 处 理 过 程

龙溪口在晃县北市，中隔一道潯阳河，有一浮桥相连。此地是水陆码头，商贾咸集，人烟稠密，每逢赶场天，诸色人等混杂其中，正好是杀人越货之徒逞凶的地方。1949年2月14日，正逢场期，张本清于此被刺。

是日上午11时左右，我正在局里办公，忽听得潯阳河两岸市街人声鼎沸，嘈杂喧嘩，正待派人出视，忽有巡警来报，张本清被枪杀在龙溪口街上，凶手在逃，我一听涉及张本清命案，不无惊诧，顿时想到其为人，亦如有所失！事属要案，我即刻率领城区警察所长陈杰凡、刑警组长王斌和警卫员向树桃亲赴龙溪口现场察看，走到龙溪口正街进巷子之处，见张本清被击毙横倒在正街中心，人众畏事不敢围观。顷刻消息传遍全县，人皆惊动，我们到达后，前来围观者渐多，死者之妻及其弟张文俊也赶来了。我见死者身着长袍，右手插在怀里，就命人将手拔出，带出左轮手枪一支，里系死者发观凶手，不及取枪自卫，就被凶犯击毙了。当即将此枪交给张文俊收领，并嘱其扶持伊嫂回家，妥善办理事后。

警方对姚大榜、胡楚藩等派遣吴麻子图谋逞凶等情况，早经掌握，惟因牵涉面太，考虑到如果事先引证拘讯吴麻子，令其缴枪，不利防止事态的发展，势必打草惊蛇，惹动观头杨永清。杨当时在湘西一带把持军政，勾通上下，其势难犯。又辖帮会势力无所不为，如果打击一点，必将引起帮会发难，波及社会治安，难以收拾局面。所以决定先行通知张本清加意提防，不让事态扩大，然后集中力量再图后果。不料张本清虽然有胆有识，但过于自负疏忽，因而导致失误。

湘西帮会，历年繁衍，为数甚众，渗入到党政军及社会各

行业和各阶层，形成庞大的势力，他们作奸犯科，打杀斗殴，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有的铤而走险，抢劫杀人，形成土匪集团，在晃县境内违法犯罪纪录在案的为数不少。杨永清帮会集团杀张本清后，迅而将作案杀手吴麻子和有关人犯隐藏起来，警方展开侦缉未获。他们并放出谣言，说张本清被刺是“地方除霸”，枉诬死者张本清。而且扬言如政府治安机关对他们毫不放手，紧追不舍，必将以牙还牙，全面开展反击活动。为了统一地方政府各部门意见，全力侦破此案，我几次而见县长唐振之，请商加强县境治安问题，并请其支持警察局对张案的侦破。唐抱着消极态度，认为杨永清势大，最好与之妥协求全，他说：“张本清不死已死，杨、张二人势如水火，两相拼斗，糜烂社会。其中两者死其一，社会即可维持现有局面，现在张本清既已死去，从此免于二者相争，县境治安即可维持，社会秩序可趋安宁。我们不如息其事，表面佯言侦缉逃犯，不必采取行动，杨永清自然心领，不致再兴风浪，县境可保平安。”他丢车保马，就此牺牲张本清，不再追究刺张杀手，缓解矛盾，妥协相安。这就当时现实情况两言固属慎妥之策，但我认为放纵歹徒置张案于不理，不保在政府方而有失职守，丑类气焰也会由此更为嚣张、更加目无法纪，而且既有负于张氏，人心亦为不服。因而再度几次与唐县长协商，他始终坚持同样意见，其他有关方面也主张就此息事，理由大致相同，都怕帮会人众势强，煽动暴乱。警方的破案工作由于各方面都不加以支持，进而形成阻力，因此难以展开，乃至搁浅。

唐振之是湘西靖县人，一向与杨永清、张本清都有交情。唐内心痛惜张本清之死，满腹哀思参加死者送丧的行列，而含泪痕，默默行进。面他对杨永清从未恭顺，承其俯仰，又复望其臂助，加今张歿杨在，定然唯杨是从。但张案未了，人心不满，唐恐难于息事，旦夕祸起，身为县宰，责任难逃，于是

先把家眷送回靖县老家，他本人白天到县府办公，晚上带着警卫人员到矿务局房子藏身，不久，又使用“金蝉脱壳”的方法，下了一张“条谕”交我代署县政，他只身避到扶罗去了。

此时各地解放消息频频传来，湘西帮头杨永清在芷江酝酿“应变计划”，大封“官爵”。晃县姚大榜、胡楚藩、姚子杰以及其他小头目等纷赴芷江，请讨封赠，听候派遣，各自分别纠集山头势力，反抗解放。刺杀张本清的人犯各有他图，都已走离县境，远散各地。

我既兼署县政，对张案未结，耿耿于怀，但帮会势力密布湘西各地，勾结军、商、政，关系极为复杂，而作案者又各自远遁，已非本县之力所能及逮，乃决定报请省方转令各县缉拿，使张亦瞑目，而安县人之心。遂写密报一件，详陈张案内情及凶犯尚未归案的原因，派人专程送往长沙省政府，递交邓介松转呈省主席程潜，不旬收程潜亲署的回信，其中主要答复只两句话：“如君明哲，当能酌情善自处理。”当时省方当局正在酝酿全省和平起义的大计，自无心受理地方局部问题。复信还说省党部干员陈介石将赴芷江，嘱去找陈面商解决。我到芷江找到陈介石，得见同他一起来此的有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和曾省斋及专员陈又新等，他们来此是为了接待白崇禧，白受命来到芷江部署衡阳到芷江一线防务。陈介石忙于其事，对晃县张本清命案问题，极表冷淡。他表明省方为维持湘西地方现状，不能刺激杨永清和各帮会组织，防止发生骚乱，于整个时局不利。当我一再争取陈介石研究解决张案时，陈毅然说：“目前要以整个大局为重，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们属于内部派系之争，不得以张本清一人之死而引起湘西大乱，张案可以暂置不理。”陈介石代表省方意见作出如此决定，与前此唐振之县长之意如出一辙，实际上也是当时地方形势使然，警察局只好依照省方的决定将“龙溪口事件”按下待结。

湘西地方，累积了历史上沉重的帮会层垢，唯待春雷破晓，让革命的洪流洗荡这历史尘渣。同年晃县解放，杨永清、胡楚藩叛乱被就地正法；姚大榜武装对抗解放军被击毙；姚子杰被依法判刑，此乃罪有应得。

## 湖南省银行支付两笔巨款内情

钱去飞

湖南省银行隶属湖南省政府，既是湖南全省金融枢纽，也可说是省政府的金库。事实上是代理省库；直属机关由省财政厅拨发的经费都归省库支付，省银行行长随省政府主席进退，省银行理事会理事长由省财政厅长兼任。何键主持湘政时间较长，当时省财政厅长为张开琰，都是醴陵人，省银行从1928年筹备至成立，第一任行长赵坦在位七年，至1935年辞职，何键调省政府秘书钟龄鑫任，1937年，国民政府调河南省财政厅长尹任先来湘接替张开琰，尹到任就在省政府常委会上提出要兼省银行行长，对整理湖南省财政才有办法，历来省财政厅长兼省银行理事会理事长，如再兼行长，三位一体更可运筹帷幄，当时众委员对此有异议，认为厅长兼行长无此先例，尹任先在河南就兼省银行行长有例可援，不兼行长对整理湖南财政就无方，尹的来头大，背景硬，结果只得通过，在会议休息时刻，曹典球委员乘坐人力包车匆匆赶到省银行向钟龄报讯，钟原计划下市县分支行处考察，以求业务的开展，而且已向客课室作了布置，闻讯后，立即取消原计划，又交代所属赶办移交。何键以钟龄主持省行一年多颇有成绩，如此下台，深感内疚，也无力挽回，乃下手令着由省银行当年盈余项下预先拨付壹万元作为钟行长特别奖金，此款约相当钟的二十五个月工资，省银行会计课长姚贤爵得到何键手令，即交主任科员许仕介办理，许

●钱去飞当时在湖南省银行任职员。

以本年是盈是亏还无从匡计，又如何提付此项巨额奖金，当时我是会计课助理员，和许是湖大同时期同学，经研究先以“暂记欠款”科目列帐付款，一直等到年终决算，幸当年有盈余，于是从盈余项下抵付特别奖金一万元，收回“暂记欠款”，了结公案。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湖南省银行随省政府迁往沅陵，当时省财政厅长尹任先已在本年一月辞去省银行行长兼职，改由彭潮接任，旋又辞省财政厅长职务，由杨绵仲继任，杨从长沙去沅陵就职，途经官庄，在一家饭店进餐休息，饭茶时刻感到茶味不错，就问这是那里的茶叶，店主说这是本地“时雨茶场”的茶叶，杨命店主叫茶场场主前来对话，想了解茶场的生产情况，时场主龚石愚也在饭店饮酒，已喝了几杯，不肯来，杨只得起身走到龚的桌旁，见此人矮墩墩的，正和自己体形相似，已有好的观感，经了解茶场经费有困难，于是问龚“为什么不来找我？”龚已有几分醉意，听杨如此说，也就问，“你是什么人？我上书蒋委员长都是空的，难道你比他还有办法。”杨此时也是几杯酒下肚，拍胸而言，“我是湖南省财政厅长，又兼省银行理事会理事长，找我就有办法。”龚获悉杨的身份，马上站起来敬酒一杯，接着你一杯，我一杯，相互敬酒，真是酒逢知己饮，而且错得十分错洽。酒醉饭饱后，龚带了几盒茶叶随杨一同前往沅陵。

省银行不明随杨厅长同来的客人身份，又不便询问，竟以上宾相待。到了次日，杨将龚介绍给彭潮行长，当面交代给时雨茶场信用贷款一千元，而且期限定为一年，彭即转交沅陵分行经理罗良翰照贷，罗再交给我这个营业主任办理，我以该茶场不在沅陵县城，错款金额大，时间长，又无错保及见证人，不合规定，不好承做。罗再去错示后，带回盖有时雨茶场及龚石愚公私章的借据，承还保证人由杨绵仲盖私章，不是错保，见

证人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彭国钧盖的私章，事实如此，我请罗经理在借据上亲批“照借”并盖私章，才交给经办人制凭证付款。龚石愚凭酒兴，遇财神，获巨款，兴高彩烈返回官庄。次年，此项借款到期，时雨茶场无力偿还，而且利息都无钱付，承还保证人不可履行承还责任，见证人更不再作见证，不能追，不便问。一直拖延到年底办决算时，我请示罗经理办法，他交代将本息都转“呆帐”，所谓“呆帐”，就是收不回的倒帐。真是“三杯酒下肚，一千元送情。”巨额公款就此抹消，天晓得。

# 巨匪姚大榜其人其事\*

杨 長 光

自《擒魔记》、《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法制月刊》对姚大榜其人报道后，观众读者都希望了解姚大榜究竟是何许人也？笔者对姚大榜的档案，以及知情人、当事人进行全面的调查了解后，特写此文，以答读者。《乌龙山剿匪记》、《湘西剿匪记》是文艺创作，作一定的虚构、刻画不足为奇，但《擒魔记》作为湘西剿匪回忆录，《年轻人》、《法制月刊》所载的文章，均说是湘西剿匪历史纪实，就应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如世袭土匪、年龄、死因、刺杀张本清等关键问题，纯属捕风捉影，悬殊甚大。有必要加以澄清。

## 为 匪 起 家

姚大榜，字必印，号占彪，光绪壬辰年（1882年）生于新晃侗族自治县（原晃县）方家屯乡杨家桥的牯牛溪，上过私塾，毕业于贵州铜仁讲武学堂。1950年12月在十家坪偷渡澧水时被我堵击淹死河中，时年68岁，为匪50余年。

幼年，浓眉大眼，楞头楞脑，两腿滚圆，两膀粗大，父母疼爱，就称为“大膀”。“膀”、“榜”谐音，由此得其名。

入成年，两颧高耸，嘴巴大，嘴唇厚，下巴象把铲子似的朝前凸出，两腮凹进呈猴像，除两颗门牙外，其余均脱光，鹰勾

\* 本文根据调查访问和有关资料整理。

鼻子，两眼充满杀机，几根既长又黑又粗的眉毛，一眼看去便知其人可恶。冷天时常穿件长衫，脏得油光发亮，热天着短白布衫，青布衣，脚系布袜套草鞋，戴缎子亮球帽。无事喜欢拿人取笑，特别是喜欢用烟袋烧妇女、青年人后脑勺头发，发出“吱吱”响声，以作取乐。被烧者，不得发气。否则，他就借故生端。由此，人们与他接近也要怕他三分，故伪称“姚老辈子”。

父姚德钦，母杨氏，均是忠厚老实人家，务农为本，除耕种几十石谷田外，没有做过邪恶之事。其祖辈均如此。姚大榜年幼时，一家七口，除父母外，一个哥哥早夭，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留在家里吃斋当老姑娘，一生没嫁。姚大榜为最小，自哥哥夭折后，他被视作独子，骄生惯养，少年时期就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是其之能事，家里管他不着。为了他，父母费尽了心血。开始，送他读私塾，识上几个字，便喜爱看些《三侠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书，好的没学，被那些绿林好汉，老奸巨猾的人所启示，把抢劫杀人者，称为“强人”，在姚大榜幼小的心灵中盟发了要做强人的念头。因不走正路，其母死后，父亲恨他干这遭世人唾骂的恶事，给祖辈丢脸，打骂也若无其事，后悔不该养这个不学之子，一气之下疯了，时间不长，也离开人世了。

仅16岁的姚大榜，由于在贵州讲武学堂学会一套玩刀弄枪本领，跑步如飞，登山如同走平地，其父死后，无人管教，流浪成性。一次，蔡建狗偷了他一头牛，姚大榜知道后，要其退牛，蔡家人多势大，横蛮地讲：“要退，只有拿白鱼崽（意指小刀子）退你。”姚大榜见他们不退牛也罢，还口出狂言要杀人，一怒之下用土夹板枪把蔡建狗打死，尔后，相邀邻近的姚国安（绰号牙生矮子）和姚本富（外号富林麻子）结为一伙。并从

当时晃县有名的大土匪唐青云（混名唐大王）那里搞到20多条枪，开始了为匪生涯。

开初，羽毛未丰，有些胆小，第一次杀人，怕别人找麻烦，便带其枪兵到贵州岑巩县龙鳌、牛场坡等地关羊掳抢，打家劫舍，残害无辜，得了一笔横财，回到牯牛溪，发展为大土匪。为了便于作恶，把家从高县城不远的牯牛溪搬到湘黔两省交界的偏僻地区——方家屯扎棚居住，此地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利于活动。不久，抢来横财颇多，便在那里买田置地，由一茅棚，扩大到一栋正屋，两栋厢房。又在不远的贵州玉屏县的雾程，新修一栋别墅，供霸占来的老婆蒋冠英寄居。先后抢了龙氏、黄氏、梁氏和彭氏五个民女，供自玩弄。其中龙氏生下应科、应洪和一叫毛姐的女儿，彭氏生下应海、应金、应银。真是三妻四妾，儿女满堂。其家产由原来的60石田，发展到1200多石，掌握有两百多土匪武装，并在新民、学堂坪和张家寨等地开办兵工厂，铸造枪枝，成为闻名湘黔边界的大地主、大恶霸、老惯匪。

### 阴 险 狡 诈

姚大榜比狐狸更奸，比泥鳅更滑，比老虎更凶，比蛇蝎更毒。他能为匪50余年，在他那团小天地里，有他的护身符。他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老鹰不打脚下石”。他对邻近群众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他不允许外人或手下人，在方家屯一带为非作歹，若有不轨事态发生，将追查到底。有一次，他手下一吴姓匪兵，在他管辖范围内，谋财害命，杀一个过路商人，外人说是姚大榜干的，他气极了，到处追查，知道是姓吴干的，就找其去问：“姓吴的，商人是你杀的吗？”吴姓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当即跪下对姚作揖道：“是……是我杀的。我真该死！我真该死！请老辈子饶命。”杀人不眨眼的姚大榜，为了

杀鸡儆猴，不再下问，就叫道：“好！你回去吧！”吴以为他大发慈悲，连连磕头，起来转身刚走几步，就随着“叭叭”的枪声倒在血泊里。

离方家屯不远的陈老满家，被贵州匪首潘桥桥抢劫，陈老满告知姚大榜，大年初一，他就带人去把潘桥桥三人抓来，一面从中大饱私囊，要潘出500块银洋的“辛苦”费给他。一面要潘退还陈家财物。待钱物交清，又当众人面把三人杀了。附近几个村子，国民党不敢去抽兵派款，青年人被抓兵或遇官司等事，只要索到钱，到他手下，就可以万事大吉。乡里发生纠纷，不惜重金，酒肉相待，请他这个“老辈子”去主持公道，不管输赢，都由他说了算。岩上(地名)有一个叫妖婆的，家有万石谷田。一年，她出卖百多石，开始卖给张家湾的一个地主，还未落实。晃县大地主杨宗贵与妖婆关系较深，背地唆使妖婆将田卖给他。因此，发生争执。双方请姚大榜去解决，姚各诈取光洋200块，钱交清，把田解决给张家湾，并当众人说杨从中插手，给杨宗贵几个耳光。从此，姚、杨结下冤仇。

为了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他在晃县、玉屏、万山交界的三角地区，办了一所玉屏中心学校，自任校长，表面上解决附近儿童读书难的问题，不明真相的人，也认为姚校长给地方上办了一件好事。实际上以此为据点，与各处土匪勾结，坐地分赃。

1918年，姚匪猖狂，龙溪口商号对他产生畏惧，想把他笼络起来，以免后患，请他担任晃县保商大队的中队长。姚则勾结了一些绅士商号的头面人物，又不择手段地向商家要供给，以肥私囊。当大批钱物到手后，姚把人枪全部拉走，与玉屏匪首曹云周合股为匪，驻扎玉屏县城。国民党无奈，进行招安，封为湘黔边区晃县、玉屏、万山联防办事处的大队长，主持三县治安联防。队伍得以扩大，武器装备充实，私囊中饱后，又反水

上山，重操旧业。

今玉屏县长岭乡的汪家溪，过去设有团防局在此。局长马玉书，与姚大榜相互勾结，打家劫舍。有一次密探告知，有10人挑鸦片路过此地，姚与马密商，将得来的鸦片均分。便设下埋伏，把鸦片抢了，挑鸦片的10人中有9人被杀，剩下的一人也被姚大榜用马刀砍了一刀，滚下田坎，带伤逃脱，到铜仁专署控告，国民党驻铜仁的白师长迅即派队伍来捉拿姚大榜，姚心窍诡秘，猜疑定有人来捉他，早已躲藏，队伍扑了一空。无奈，就怪罪局长马玉书管辖此地无方，治理不力。把马抓去坐牢，并将他押赴刑场赔斩，由此惊厥瘫痪。姚一口鲸吞抢来的鸦片，马则成了姚的替罪羊。

1926年，北伐军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在贵州天柱招兵买马，姚大榜便带其喽啰投奔，被封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师一团一营营长，得了不少枪弹军饷之后，又连人带枪拉回老巢为匪。

1934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堵截红军，又一次对姚大榜进行招安，委为“晃县铲共义勇总队副总队长”，次年7月，又拖枪上山为匪。

1936年初，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晃县时，就曾给姚大榜去信，告诫他不要执迷不悟，与人民为敌，要改邪归正，把枪口对准国民党，而姚不听劝阻。相反，还大量屠杀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和靠拢红军的群众，如新合乡农民广志桥因给红军带路，被活活逼死。

国民党政府数次对姚招安，反反复复，屡招屡叛，最后，准备把他掌握的匪伙进行收编，而他服招，不服调，真乃畜牧难驯。因此，国民党政府对他束手无策，毫无办法。

1940年8月，国民党政府对姚大榜采取清剿的办法，派陆军独立一旅三团前往。一次，清剿队得知姚从万山抢来一民

女，在雾城过夜，迅即派了一连人星夜兼程，赶去捉拿。昏暗的油灯下，姚正搂着这女子打牌。捉拿队伍靠近屋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房子给包围了。姚大榜听外面有响声，知道事情不妙，吹熄灯，推开那女子，掏出枪，迅即爬上屋顶，凭着能在瓦屋上奔跑无声的轻功，将一床烂棉絮捆成一个大包裹，往房子另一头扔去，围房子的队伍，看见有个黑影从屋上掉下来，以为是姚大榜逃跑，叫喊“抓活的，抓活的”，都往黑影扑去，趁慌乱之际，姚大榜又从屋上另一头，纵身一跳，待士兵们从这边扑来，他已遁之乎也。这连长才知道中了姚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一天，下着毛毛细雨，清剿队得报姚大榜已回到家里，天亮来到姚大榜寨前，早已起床的姚大榜一看情况不好，顺手捞一顶斗笠，披上蓑衣，把两支快慢机藏在装满粪水的粪桶里，装扮一老农，挑着粪桶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带队队长抓住他问：“老头，姚大榜在家吗？”姚大榜装着老老实实的样子，一换肩，粪水就往外溅，污了队长的裤子，队长后退一步，又问姚大榜在哪里？他用手指着一房间道：“他刚起床，正在抽大烟哩。”部队迅即围拢去，将房子层层围住。姚大榜过了两根田埂，把粪桶一扔，掏出两支快慢机，逃之夭夭。部队把他家里一搜，只见他的几个老婆和崽女。队长凶狠狠地问其老婆，姚大榜在哪里？他老婆说：“刚才挑粪的不是吗？”队长指着士兵骂：“还不赶快给我追。”可为时晚矣。清剿队伍几经追剿，几经扑空，一怒之下，抓去了他的老婆，崽女，将他抢劫得来的金银财物八担多全部挑光。此后，姚更加警惕，晚睡觉总是把香捆在手指或脚趾上，作为他的警报器。待香烫手时，又另换一个地方，往往一夜间转移数处，这便是他为匪的传家宝。

1942年秋，晃县爆发了“黔东事变”。组织者之一晃县

“同善社”社长秦宗炳（又名秦良善，绰号善人）先后联络玉屏罗殿卿、马和林和晃县姚大榜等人，同舟共济，一同举事，此时，姚是同善社的“天恩”，驻晃县酒店塘矿警队长，掌握人枪百余，弹药居多。其爱财如命，假意与秦共事，向秦索取大量金钱。著名的晃县敦厚堂药店老板吴敦明是秦的女婿，家有万贯，秦以之为靠山，先付给姚四万元，以作军费，姚表面答应祭旗出兵，暗地勾结玉屏县长李世家，要李于祭旗之夜出兵镇压。李暗示黄道乡乡长刘元藻率领壮丁事先埋伏。于8月23日，姚大榜、罗殿卿、马和林、黄尚明带其队伍在玉屏县黄道乡鸡婆田杀猪祭旗，开始行动。姚心怀鬼胎，乘祭旗时说：“此旗经高人勒赐，法力无边，能避枪炮，我乃试之。”说罢，拔出手枪，对旗而射，连打三枪，将旗击碎。并说：“此乃骗局，吾不信也。”将其队伍撤出。刘元藻之伏兵即向罗、马、黄的队伍进行包围扫射，未经半小时战斗，罗、马、黄之队伍被冲散，各奔山头。秦宗炳催姚大榜出兵，姚向秦索款不休，先后共计七万余元，仍然无动于衷。秦知道姚的阴谋，仰天长叹，投河自尽。

国民党禁止纱布走私，不准湖南纱布运往贵州，这损害了龙溪口各商号的利益，他们暗地寻找靠山，给姚送去大批钱物，要姚带人押帮。面狡猾如狐，贪婪如狼的姚大榜，采取更阴险的手段，多次押帮抢帮。一次，他带人押运一船纱布往玉屏，到达小地（地名），天黑下来，在此住宿。半夜，又另派手下一伙人把纱布抢了，嫁祸于人，并抓来一些与之毫无牵连的装卸工，硬说是他们所为，当货主面，将炮们全杀了，以消货主之恨。此类事，已屡见不鲜。

姚大榜杀人不少，血债固然很多，遇人总是产生疑惧心理，恐遭不测。他的双枪，总是放在衣袋里，与人说话，手不离枪。一次与一客商在一店内谈话，对方由于感冒，打了个喷

噤，伸手到口袋里取手帕，而姚则以为他心怀不轨，顿时掏枪，叭的一声，将其擦倒在地。其他人拥进店，问其事端，他气愤地说：“你们不看，他的手在口袋里掏枪，我不打死他，他必打死我。”众人扶起死者，抽出衣袋内的手，捏着一张手帕，无不为之愕然。甚至吃饭时，姚也端着饭碗蹲在屋角，靠近无人过往的地方，以防万一。

姚大榜年过花甲，仍能步履如飞。有一次他和随从数人从芷江回晃县途中，看见一条狗在前面跑，便问随从，谁能前去把狗抓来，随从们个个摇头，奈其不何。姚见罢，卷起衣袖，三步并两步地赶向前去，一会，就将狗抓回，旁人见了惊愕不已。

### 恩 将 仇 报

在晃县，有一人使姚大榜大伤脑筋，即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任过国民党正规部队团长、旅长的张本清（又名张文英，外号张老虎或张大炮），晃县大湾罗毛溪人。早年，得到蒋介石的器重，曾任蒋的警卫团长。后因联名反蒋，遭到蒋的遗弃，回到家乡晃县，担任省参议员。他在晃县参议会第一局一次会议上说：“我不允许恶势力发展，我要保境安民，最低限度上至鲇鱼铺（酒店塘），下至门楼坳，即在晃县境内，我是不允许土匪们作乱，谁要作乱，我就杀了谁。”由此，晃县土匪一时不敢放肆作乱，匪势没有多大发展。对张本清，县府官员、地方绅士都不敢得罪他，势力之大，望而生畏。

姚大榜视张本清如眼中钉，但不敢在虎口拔牙，表面上还是合睦相处。1939年，他们联合击败了经营晃县酒店塘汞矿的张平刚，合伙经营汞矿，来往甚密。不久，姚因在晃县为匪作恶，又支持龙溪口商号纱布走私，遭国民党独立团的围剿。姚虽化装逃脱，但他全家被抓入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姚请

张本清出面说情。独立团得罪姚大榜，可得罪不了张本清。张以他的威望和能量，救了姚一家大小。此后，姚多次宴请，感谢张本清，并口口声声对张说：“张旅长，多亏你的搭救，我今生来世也不忘你的救命之恩。”张本清开玩笑说：“杀人算你的，打官司算我的。”姚大榜回答：“我杀了人，就是打赢官司，我的比你的快。”两人同欢而散。过后不久，二人共同经营汞矿因瓜分不匀，姚派姚锡昌当汞矿管办，而张本清又派一秀山人杨洪当管办，姚大榜暗地将杨洪杀了，开始埋下无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张本清因要娶其堂妹张善芝（又叫张学英）为妻，其前妻郭顺清愤而出走。张之举被其家族视为败坏家规门风，遭到家族的责骂和社会舆论的谴责。对此，姚大榜也进行讽刺。在姚、张二人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姚针对张娶其堂妹之事，当着众人说：“牛栏立在田坎上，粪水不落外人田。”张面红耳赤，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心里忌恨着姚大榜。

除外，加上胡积善（又名胡惠卿）在从中挑拨，使姚、张二人矛盾更加激化。胡被称为当时晃县的“文人”，善给人做状纸，赋诗作对等，与姚很要好。胡虽与张也有往来，但远远不如和姚的关系。一次，胡到张家里，因写状纸而发生是非口舌，被秉性耿直的张本清拿着茶杯往其脸上砸去，把脸砸伤了一大块，由此，受到莫大委屈。胡为出这口气，要其崽胡厚彪去找姚大榜帮忙。第二天还没亮，大雾蒙蒙，胡厚彪摸到姚的屋门口，老早起床的姚大榜，见胡厚彪，便问：“彪彪，你来这样早，有么子事？”“老辈子，你不晓得，我爹昨天到张本清那里，为几句话，被他用茶杯砸到脸上，把脸给砸伤了。”还讲：“我爹和你是一伙，都算不了什么，只有那么大的气候。”听胡厚彪说完，历来不甘受人欺，容不得别人讲他半点小话的姚大榜，顿时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带着几个随从和胡

厚彪下山，一起去找张本清。见了张，姚开口便道：“张本清，你不要欺人太甚，有本事我俩出去走一趟”。此后，两人关系分崩离析，晃县呈现出一个在城里称霸，一个在乡下称雄的局面。

张回晃县后，为发其家业，在龙溪口开了一个公司叫本善公司。公司占用了江西帮之房子，江西帮要求归还，张不允。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加上张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税。这样，如同夺了江西帮等各商号之财。对张怀恨在心，敢怒而不敢言。要摆脱这种状况，只有除掉张本清。可谁来干此事呢？姚大榜爱财如命，早为他们所掌握，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惜重金，暗给姚送去白纱布数十匹，银元数千块。芷江匪首杨永清趁火打劫，极力支持姚大榜剪除张本清，并为他出谋划策。

1949年古历2月14日，正逢龙溪口赶场，人多拥挤，姚大榜派了手下得力亲信，在其匪部任分队长的吴玉清（外号叫吴麻子或斗鸡麻子，其人在张本清手下做过事，后暗投姚大榜），带吴本军、吴本众、姚应林以及姚大榜的舅佬龙永安、彭秀才等人化装潜入龙溪口。姚大榜还派人在进出龙溪口的必经之地——杨家桥的土地坳、龙溪口的场上等地接应。没过多久，张本清带着一个警卫到江西街，张指使其去办一件事，剩张一人来到斌星街口，往一小摊买烟，等候在这里的吴玉清，向前喊到：“张旅长，你买烟。”张刚回头，身着长袍的吴玉清，从内肘下拔出枪对准张的太阳穴就是“叭”的一枪，张当即倒地，紧接着又窜出两个随从，在张的后脑勺和腰部又各开一枪，张顿时毙命。随即街上一片混乱，吵吵嚷嚷，人群中叫喊：“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吴玉清等人趁混乱，慌忙逃脱。颇想干一番事业的张本清——姚大榜的救命恩人，就这样死在姚大榜的手下。

张一死，姚实现了称霸晃县的美梦。不久，在一些绅士、商人的簇拥下，带其匪部进驻龙溪口，以壮声威。随即成立晃县保安第二团，自任团长，并兼晃县治安委员会副主任、晃县警备第一大队长等职。可谁想到，姚这个狡诈阴险的老狐狸，竟连跟随他的多年的亲信吴玉清、姚国安也不放过。吴受姚大榜的指使，带人刺杀了张本清，排除了其心头之患，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可他不曾想到，正是为了这个招来杀身之祸。姚借吴之手刺杀张后，心里时刻思忖着吴玉清这个人胆大包天，连他的顶头上司张本清也敢杀，说不定迟早我也会遭他毒手，此人不除，终为后患。便借故生端，以吴占人妻女之罪名将他杀了。姚国安因在外抢了别人的东西，当着众匪把他杀在玉屏的白马山。真是鸟尽弓藏，兔走狗烹。

### 可 耻 下 场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进入晃县剿匪，敲响了土匪灭亡的丧钟。在解放军的追剿下，土匪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然而，为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湘西，芷江警备司令、“复兴楚汉宫”的双龙头杨永清于1949年8月、10月先后两次窜到晃县同姚大榜策划，扩大“楚汉帮会”，发展其匪势。姚以晃县“楚汉帮”龙头大爷、开山主之身份相迎，杨、姚二匪密谋拼凑“芷晃剿共游击总队”，姚任副总指挥。率其匪部隐藏在贵州玉屏的樟寨，以及玉屏、万山和晃县的交界地——六龙山，伺机反扑。

在此之时，我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姚进行政治争取，利用进步人士、晃中教员胡秀琰（姚是胡的救命恩人）去劝其投诚，要其认清形势，靠拢人民。姚也看到不利处境，曾作过回心转意的打算。一次，经做工作，姚愿意吃罢早饭，就动身，抬他的滑竿也准备好了。因姚素来爱吃鲤鱼，村里人的鲤鱼都要送给他。正在这时，一乡里人给姚送来两条活鲤鱼，每条约有

二、三斤重。送鱼人喊：“姚公，鲤鱼。”狡诈多疑的姚大榜，一见到鲤鱼，脸色突变：“妈的，鲤鱼上钩，歹的兆头。去不得，去不得。”就这样，他对解放军的政治争取和多次派人劝说，加以拒绝。为劝其投诚，其长子姚应科早先就读贵阳大学，接受进步思想，看到解放军进入湘西以来，各地土匪纷纷落网。数次劝说姚不要再平下去了，放下武器，以求人民的宽大处理。而刚愎自用的姚大榜，一旦认准的事，谁也说服不了他，相反，还会遭殃。姚见姚应科放次规劝，他眉毛一竖，瞪圆双眼，大骂姚应科是逆子，其发火便是不详之兆，暴露出杀人魔主的狰狞面目。说：“虎不食虎子，今天我就吃了你。”姚掏枪便打姚应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一喽啰忙抬高放握枪之手，“叭”的一声，子弹朝天飞去，而姚应科一看势头不对，慌忙跳下两根放丈高的田坎逃命。此后，父子分道扬镳。姚应科暗地将国民党晃县县党部给姚大榜的24条大小枪支交给解放军，逃到贵州任教去了。

1950年春，姚放人民解放军驻晃部队主办往怀化支援中心区重点剿匪之机，联合肖宗淮、蒲老翠、杨国政等匪首率匪众600多人攻打晃县县城。被解放军四一九团副团长王清昌率领守城部队击溃。

1950年秋，姚主要活动在玉屏的板山、黑岩场等地，有一次，县大队抓到一名叫黄东生的土匪，供出姚藏在板山、黑岩场，并带路去捉拿。县大队会同民兵百多人，连夜奔袭，快到那里，得知姚头一天率部从酒店塘过河，地往扶罗、新寨、凉伞等地。

8月30日，湘黔边界5000多名土匪聚集凉伞，姚被封为“湘黔边区反共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妄图在凉伞（土匪称为小台湾）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乌合之众，哪经得解放军一击，“雪凉合围”一役，放千名土匪被擒被歼，姚从驻

地新寨的龙寨带匪逃往壕庆湾。解放军勇追穷寇。壕庆湾战斗，姚的人马几乎丧尽，家当输光。其崽，匪营长、机枪射手姚应金被击毙。姚的老婆彭氏和女婿杨宗振、勇佬龙永安等被活捉，姚仅带几十名匪徒临阵逃脱，窜往中寨，后过禾滩，逃到渡洲上面的十家坪，在此又集结了一些散匪，妄图在此偷渡潯水河，回到六龙山老巢继续作恶。由于解放军和地方部队跟踪追剿，土匪疲于奔命，日夜溃逃，几天没吃上东西，一个个狼狈不堪。12月25日，土匪逃到十家坪的当晚，姚召开匪支队长、连长以上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对策。声嘶力竭地在会上说：“我们好……好、坏、死、活就在这一夜，如能过河到六龙山，就有安身之所，大家要同心协力，成败就在此一举。”说罢，预感到末日来临，威风一世的姚大榜，从眼角里掉下串串泪珠。

土匪们按吩咐，作渡河准备。晚12点，开始偷渡。姚自以为高明，神不知，鬼不觉的举动即可得逞，可他渡河的消息事先被我方得知，在中共晃县县委书记杨建培的指挥下，十家坪的对河岸上埋伏了堵截姚的部队和民兵。当两船土匪渡到河中时，堵截的队伍开枪射击，道道光线划破了沉寂的夜空。船上的土匪慌作一团。一只船调头回逃，姚乘的那只船被踩翻，船上的人都掉入河里。第二天，民兵从河里打捞出十多具尸体，其中，有一尸体上还夹着一支快慢机，经辨认，此人就是姚大榜，是被淹死的。

姚大榜一死，标志着晃县百年匪患的清除。人们知道姚大榜淹死的消息后，奔走相告，将他的尸体悬挂在县体育场旁边的一颗大柳树上，观看的群众络绎不绝，有吐唾沫的，有用木棒打的，还有拿石头扔的等等，以解心头之恨，好几天才收尸。

# 潇湘崛起电缆城

黄仲民

湘潭电缆厂是一座大型综合性电线电缆生产厂家，拥有职工六千余人，年生产能力可达四个亿，是机构电子工业部重点厂家之一，被列为国家“七五”期间重点技术改造大型骨干企业。

工厂创建于1951年。作为中南电工厂的配套厂家，电缆厂的开创者利用原中央资源委员会遗留的破旧厂房，用简陋的生产设备在湘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如今，湘缆正以其绰约的风姿和独具的魅力，雄踞于中南腹地的湘江之滨，被人们称誉为全国电线电缆行业镶嵌在江南半壁的一颗明珠。

目前，工厂拥有固定资产1.07亿元，有九个生产分厂，两个辅助生产分厂，两个附属分厂。厂区占地面积86万平方米。拥有主要生产设备三千余台套，工程技术人员900余人。厂内设有中南地区最大的电线电缆研究所和测试中心，还设有电子计算机、电传、质量管理检测、职工培训等中心。

工厂生产“金凤”牌——架空导线，双金属导线，各种电工用铜、铝型材，各种电磁线，中、低压橡皮、塑料绝缘电力电缆，矿用电缆，船用电缆，各种电器装置用电缆，高温导线及特控电缆等，一大类、五小类、三十八个系列、一百五十四个品种、一万三千种规格的电线电缆产品。还可根据用户的要求生产特殊规格电线电缆，按IEC、BS、ASTM、JIS等国外标准制造出口电线电缆。

1984年以来，工厂投资七千余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先后从西德引进了著名的克虏伯公司生产三万五千吨优质光亮大长度低氧铜杆的连铸连轧生产线，从美国引进交联电缆生产设备，从日本引进高速拉丝机等设备。这些设备的引进，给产品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飞跃。

工厂根据机电部工艺管理要求，建立了标准化工作室，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生产产品，获得可喜成就。目前，已有电工圆铜杆、电工用圆铜线（TY、TR）、聚酯漆包圆铜线、钢芯铝绞线、铜扁线、船用电力电缆、船用一般仪表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等十四个产品采用IEC国际标准。其中船用电力电缆、船用一般仪表控制和通讯电缆，1985年分别得到中国电工产品认证委员会、中国武汉船检局同时颁发的认可证。

工厂自行设计制造的铝包钢生产线，铝杆连铸连轧生产线曾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水乳性漆包线、大跨越钢芯铝包铜导线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裸铜线1980年获国家产品银质奖；防冰导线获一机部科研成果奖；柱型同轴电缆荣获1983年国家“金龙奖”；HJ—8制导线在军工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受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嘉奖。

工厂十分重视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和新产品的开发，仅1987、1988两年，新产品产值就达四千余万元。1984年以来，共研制新产品四十二个，其中：自阻尼导线、载流承力索、NOMEX纸包线填补了我国电线电缆行业空白。五百千伏特强大跨越导线和地线，铝包钢——钢铝绞线载流承力索获湖南省经委1985年新产品奖；三十五千伏导线柱型同轴架空电缆获水电部二等奖；铜电车线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一举夺标。新产品的积极开发和研制，为企业广泛占领国内市场，发入国际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设在厂内的湖南电线电缆研究所，技术力量雄厚，有较为

先进的研究和检测设备一百五十余台，担负着原材料和产品型式试验、产品升标、新产品研制重任，建立了橡塑、电气、金相、油漆等试验室和情报资料室。

1979年以来，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建立了三级质量管理体系。全厂十三道重点工序，设立了三级质量管理点。这些网点，经湖南省连续三次检查验收，均达到合格要求。分布全厂的九个产品检查站和电磁线、电缆、理化试验室，担负全厂产品质量检测任务。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的推行及强大的质量检测系统，使企业产品质量达到新的高度，多项产品先后被评为国家、部、省优质产品，为给用户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产品的信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全厂有专职计量人员七十余名，广泛开展长、热、力、电及无线电等方面的计量工作。严格执行计量法规，开展量值传递工作。1986年，经省、市计量局验收，获国家二级计量合格证，能源计量工作也同时验收合格，为进一步实行高标准计量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产品竞争能力的提高，给工厂外贸工作带来巨大的变化。产品远销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尼泊尔、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1989年出口产品产值六千万元。出口创汇与技术引进，使生产效益形成了良性循环状态，外贸出口基地的建成指日可待。

厂内两条铁路专线接通京广、湘黔、湘赣三条铁路大动脉，工厂生产的电线电缆产品通过它们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和国际市场。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给湘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生产经营飞速发展。1984年到1988年五年间，工业总产值累计达八点七亿元，为1983年的六点三四倍；上缴利税相当于1983年前十六年的总和，可建成四个半1980年时的湘潭电缆厂，在

同行业中由第八位一跃而居第三位，出口创汇在全省机械行业中名列前茅。

工厂决策中心制定的“把湘缆办成外向型企业”的宏伟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广泛开展横向联合，安乡分厂、吉首分厂相继建立。

以总厂为大本营，以深圳、海南分厂为窗口，以香港、美国分厂为据点，四点一线，八方辐射，两头在外（进口材料加工产品出口），大进大出，参加国际大循环的外贸经营渠道已开通。

适应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需要，用投资联营和友好协作等形式，在国内建立了较稳固的铜、铝原材料供应基地，以确保企业在任何时候、任何风险中均可立于不败之地。

为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工厂广泛引入竞争机制，变厂长一人风险承包为大家共同承担风险，全方位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保持信息灵、决策快、高效率。对各分厂和主要经营处室，实行全员风险承包，采取企业和保行联营办法，扩大自主权，搞活流通。

工厂在1984年迈出改革第一步——实行厂长负责制，党、政有了明确分工。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积极支持厂长工作，并集中精力抓好党的建设，对各项工作认真实行保证和监督。

工厂十分重视职工文化、业务素质的提高，把人才开发作为企业发展战略重点，除广泛引进各类技术人才，还办起了职工学校、技工学校、职工大学。职工学校在“六五”期间完成了青壮年职工初级技术、初级文化的教育，又在实施中、高级技术和专业知识培训。中级技术工人占全厂生产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职工大学培育的电线电缆技术专业人才，占全厂工程技术人员三分之一。这些技术骨干，朝气蓬勃，活跃在生产指挥和企业管理工作第一线。

企业的不断发展，职工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1988年，职工人均收入比1983年增长三倍。职工人平住房面积达八平方米。职工福利设施不断改善，尤其是新建的有现代化设施的职工文化娱乐中心，给人们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发挥专长，施展才华，你可以获得美的享受，你的思想、情操可以得到陶冶和净化。

当你漫步厂区林荫大道，当你徜徉在鹿鸣呦呦，绿草如茵的厂区草坪，当你行走在花团锦簇，四季飘荡着沁人心脾清香的花圃小道，你简直不会相信，你正置身在机器轰鸣的工厂之中。花园式工厂的建设，为职工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湘缆的迅速崛起，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有力扶持和帮助。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委负责人乔石、陈慕华、王丙乾、吕东、周建南等同志曾亲临湘缆视察。省长熊清泉、原省委书记毛致用、万达等同志多次来厂检查指导工作。他们给湘缆的建设和发展以很大的鼓励。

## 对《湖南文史》第32辑的 订正、补充、建议

黎 丰

《湖南文史》第35辑为湖南和平解放专辑，内容丰富，并发表了一批珍贵文献资料。该辑发表的资料（不包括回忆文章）中，也有若干差错，需订正和补充。现提出数则供参考。

### 《湖南和平解放大事记》订正、补充

（一）中兵长沙特别支部成立时间是1948年8月，不是1949年1月。长沙特支成立时负责人为陈克东。1949年1月，刘晴波接任长沙特支书记。

（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于1949年2月从武汉调到湖南后，没有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

（三）1949年6月程星龄从香港回长沙时，并没有带章士钊写给程潜的赞扬毛泽东，并转达毛泽东对程潜起义期望甚殷和对陈明仁既往不咎等内容的信。程星龄的回忆文章中曾写了章士钊托他带交程潜上述内容的信，系误记。以后他说过没有带上述内容的信，上述内容是口头转告程潜的。

### 程潜《备忘录》的订正：

“桂系大军退湘境”，应为“桂系大军退压湖境”。

“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应为“

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将更大或至一筹莫展。”

“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王永康……”，“王永康”应为“黄康永”，系原稿错误。

“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应为“军政机构几乎置身事外”。

“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应为“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

“尚能镇定俟。”应为“尚能镇定以俟”。

### 程潜复电孙科电文的订正

“则和谈将无所谈起”，应为“则和谈将无从谈起”。

“所谓康除亦不过修改之标志”，应为“所谓废除，亦不过为修改之极致”。

“改编军队事如有必要”，应为“改编军队，事有必至”。

“至如召开政务会议”，应为“至（于）召开政协会议”。

“仍当应先商讨”，应为“仍当妥先商讨”。

“承询、特覆、弟程潜叩。”应为“承询特复。弟程潜叩。”（复电日期为1月22日。而“巧”为18日，也与复电日期不符）

行政院孙科征询对中共所提和平八项条件的意见电，也不是“总统二十一日退休后”发出的，而是1月17日（子葆秘电）发出的。

### 程潜呼吁和平通电电文的订正

“不惜皆亡之怨”，应为“不惜偕亡之怨”。

“此而不忍，孰不可忍！”应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系我袍泽”，应为“絮我袍泽”。

“尚望常道仁贤”，应为“尚望当道仁贤”。

“固可立即恢复”，应为“固可立时恢复”。

“川、康、滇、黔”，应为“川、康、滇、黔。”

“务望一致惊呼”，应为“务望一致奋呼”。

以上电文系转载当时报纸，有的是当时报纸有错误，有的是抄写和校对中的错误。

以上电文订正参阅当时长沙《中央日报》。

标题也应力求准确。如“毛主席答陈明仁电”（1949年8月13日），应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答陈明仁电”。

### 《湖南和平谈判》资料的订正、补充

（一）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13人，应有肖劲光、王首道、唐生智。

（二）周里（现名）当时为周礼。

（三）金明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副政委。他当时的职务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

（四）刘公武在程潜任省主席期间没有担任过民政厅长，当时报纸公布为民主人士代表。

（五）刘云楷是国民党第一军参谋长，不代表陈明仁，而是第一兵团在长沙部队代表。

### 几点建议

一、刊载历史文献资料，应尽可能核对档案原件和其他已刊资料，防止抄写、校对错误，以免误传。对原文不要随便修改。如原件有错误之处，也应改正并说明。

二、引用回忆录资料时，需注意核实。如有疑问，亦可向作者提出。如程潜起义事关重大，决不可事先泄露，而程星龄

当时又被蒋介石、白崇禧认为有“通共”之嫌，章士钊是否会给程潜写赞扬毛泽东，并转达毛泽东对程潜起义期望甚殷和对陈明仁既往不咎等内容的信，托程星龄带交程潜呢？程星龄就是以后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明确说当时章士钊和他谈这些事，是托他转告程潜的。

三、编写资料时，需注意核对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并可参考已整理的党史、文史资料。

